



冼恒汉简介

冼恒汉（1911年—1991年），壮族，广西田阳县四那村塘凭屯人。

冼恒汉于1929年11月在田阳县立师范学校就读时，和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红军，担任红十九师宣传队宣传员，1931年，红十九师宣传队解散，被分配到军官训练所当学兵，193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红军第七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

1931年12月，他担任湘赣红军独立第三师一连政治指导员，1933年7月任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政治处总支部书记，1934年4月奉调担任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政委，10月调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六团政委，1935年9月担任红二军团第四师政委，参加长征。

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进入中央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被分配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教导团担任政治部主任，11月，升任教导团政委。1940年，担任晋西北军区高干读书班政委。1943年，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八五旅政委。1946年11月，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他担任第一兵团第一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1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委。1952年8月，调任为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升任主任。

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后升任第一政委。

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兼任兰州军区政委。

1977年6月，他被免去一切职务。1982年12月5日，中央军委宣布他退出现役，降为地、师级待遇，每月发200元生活费。1984年6月，中央指示，改变以前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

离职后他撰写约十多万字回忆录，1991年在兰州去世。

目录

冼恒汉简介.....	2
目录.....	3
第一部：南征北战.....	6
第一章：百色举义旗.....	7
家.....	7
投笔从戎.....	9
浴血隆安.....	10
离开右江.....	15
第二章：战斗在湘赣.....	19
河西教导队.....	19
转战湘赣.....	20
战略转移.....	21
第三章：会师南腰界.....	23
初见贺老总.....	23
调任二军团.....	26
负伤板栗园.....	27
第四章：长征二万五.....	32
突围.....	32
金沙江.....	34
雪山草地.....	36
红军大学.....	41
第五章：在抗日前线.....	45
接受改编.....	45
冀中平原.....	46
又返西北.....	48
吴杰同志.....	49

第六章：保卫陕甘宁.....	52
内战风云.....	52
调赴延安.....	53
转战陕北.....	56
家属支队.....	60
第七章：解放大西北.....	63
新式整军.....	63
打出去.....	68
进军大西北.....	72
乘胜追击.....	74
第二部：十年文革.....	78
第一章：官罢西山.....	79
这总是一段历史吧.....	79
乌纱帽扔在了西山.....	80
一年翻了两次烧饼.....	85
我戴上了“代理人”的帽子.....	90
第二章：军内“四大”.....	96
不理解也得理解：这就是“文革”？.....	96
拉起大喇叭广播的“常委会”.....	98
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103
毛主席说“张、冼是老实人”.....	104
第三章：十年“支左”.....	106
奉命“支左”.....	106
初识“造反派”.....	108
“三个文件”.....	109
复工复课“闹革命”.....	111
脱贫之水黄河来.....	114
放不下的牵挂.....	118
第四章：须要说清的一些问题.....	122

“油沙豆”及其他.....	122
庄则栋河西行.....	128
王洪文到房间来看我.....	129
赵永夫事件.....	131
青铜峡事件.....	136
钱信莎事件.....	138
是否有一个“冼家帮”？	141
第五章：矛盾由来.....	147
来了新搭档.....	147
上书毛主席.....	150
“谈心会”始末.....	151
中央派来了萧华.....	153

第一部：南征北战

第一章：百色举义旗

家

我于一九一一年农历八月初九日出生在广西右江奉议县（也称田州，现改为田阳县）四那村塘凭屯一个壮族农民的家庭，乳名“亚华”，学名冼恒汉。

冼氏家族的祖先，据说是从广东南海来的，同本地一个姓黄的壮族妇女成婚后，在那里就地落户了。一个广东人为什么到广西来落户，我们的老前辈谁也说不上来。我们村子除一家黄姓的以外，三十多户都是姓冼的，可见年代已经很久了。

我弟兄三人。哥哥九岁，我六岁，弟弟三岁就丧父了。父亲逝世后，丢下三个孩子，由年纪已到花甲的老奶奶和二十多岁就守寡的母亲，靠经营二亩多地抚养我们。但是困难很多，我们还小，奶奶老了，母亲虽然年纪还轻，但耕地、耙田都是重活，干不了。怎么办呢？就是每年春耕和秋收时，靠我姑父、姑母来帮忙。

随着时间的推移，哥哥也慢慢地能够参加农活了。我八岁时，奶奶让我读书，到近邻的录端村私人办的初小上学。我奶奶带我去，一进学校的门，首先给“孔圣人”磕三个头，转身过来又向老师鞠躬，老师给我指定座位，这就成为学校的正式学生了。

学生都是走读，回家吃饭、睡觉，但每天必须按时到校，迟到的要打手板或罚立正，老师要求十分严格。我小的时候怕挨老师打手板，宁愿在家里放牛。再就是希望下雨，盼河水涨得大大的，好不去上学。我的奶奶很厉害，坚持冼家要出一个“识字”的人，否则孤儿寡母经常受骗被人欺负。如果我贪玩，奶奶就会拿手指弹我的脑门，或是拿烟袋锅敲我的头。就这样，在奶奶的严厉督促下，我三年上完初小，又到田州县城投考“县立维新第一高小”，考上了又继续读三年。我们那里小学不花什么钱，睡觉铺板及食饭粮食，都是自己背去的。

高小毕业后，我瞒着奶奶和母亲投考师范。因为我奶奶原想我高小毕业后，就不要再升学了，家里缺乏劳力。考试以后，大约过一个星期，我约邻村的同学一起去看榜，我被录取了。出乎我的预料，名字还很靠前哩，列为第七名，我当时高兴得跳了起来。回来后，把情况告诉奶奶、母亲和哥哥。奶奶不吭声，妈妈

是个中间人，平时就不多说话，家里大小事都是奶奶说了算，升学不升学她都无所谓，但是哥哥坚决支持我继续升学，他说地里的活他宁愿一人包了也要我读书，我奶奶也无可奈何，这样，升学问题就算解决了。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我上师范时，奉议地区在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下，农民掀起了反贪官污吏、抗租抗税的运动。我们奉议（田阳）县是右江地区中共党组织活动最早的一个县，也是右江农民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主要县份。当时地方衙门的苛捐杂税太多太重，农民们叫苦连天。我们那个地方本来就穷，结果辛辛苦苦一年，三分之二的粮食被名目繁多的各种税拿走了，再加上土匪打劫，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样，在地下党的活动下，在当时“大革命”的影响下，我们县二七、二八年间农民抗租抗税斗争一浪接着一浪，没有间断过。当时的奉议县长曾伯龙这个人很坏，欺压百姓，强行摊派，谁不交租、交税就抓去坐班房、受酷刑。我们放假回家，同村里人一样，白天派人到山头上放哨，晚上妇女、老小及牲畜离村一、二十里到野外过夜。我们村年青人都组织起来轮流放游动哨，害怕衙门派兵包围村子抓人和防止土匪乘机抢劫。

在师范上学的时候，我知道了用功，学得很努力，成绩也很好。这时我开始接触到同学中流传的一些进步书刊，再加上知识的增长，我对回乡务农已没有兴趣，也不满足于毕业后当个乡村教员了。我想到社会上去闯闯，为社会服务，为穷人做点事。

一九二八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已在农民中和学校里传开，黄治峰、潘宪甫、黄进才、冼志刚等农民运动领导者已加紧活动。张云逸同志的警备第四大队（属进步桂系将领李明瑞所辖）也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陆续开到百色、奉议、平马，地下党也开始半公开活动，组织人到平马领枪。到了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形势有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好象要发生什么事情，一些地主老财出身的学生，有的已悄悄地离开学校。县长曾伯龙也被张云逸以右江督办专员的名义，把他抓起来解押到省城南宁（当时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喻作柏省主席同情共产党），这一下大得人心，农民欢天喜地。

当时，我们师范的不少同学都加入到农民运动中去。白天，我们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政治主张，晚上参加农民会议，还和农民一起冲进地主恶霸家院抗租抗税。

大约十月，警备第四大队同时在百色、田州、平马把反动的第三大队消灭了。田州战斗就在新街我们学校附近，战斗持续了两天，打得很激烈，学校也停了课。

战斗结束后，有五、六个荷枪的宣传员到我们学校来演讲，说他们的军队是革命的，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当时还未打出红旗），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剥削阶级，实行土地革命。还讲到了马列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等等，有些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们还号召我们参军，为穷人打天下。

听这个宣传队讲演以后，学校明显地分成了两派。剩下未走的地主老财子弟，也悄悄地溜走了，我们受曾伯龙及地主老财欺诈压迫的学生，个个喜笑颜开，向宣传队鼓掌致意，并送他们到校外。

投笔从戎

宣传队走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在右江边上（我们学校就在新街右江边上）议论开了。大家都说，现在的形势，学校近期不可能恢复上课，就是能上学，毕业出去当个教员也没多大意思，不能解决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问题。我说，出路在于“当兵去”。宣传队不是讲得清楚吗，他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要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剥削阶级、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的，这不是比我们谈的“三民主义”好得多嘛！有的同学说当兵可以，就是病了怎么办？谁管我们。我说，那些宣传队员他们病了怎么办呢？一个人病总是有的，别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怕什么？这样经过七嘴八舌地议论，大家都决定去参军了。为了表示我们的决心，大家面对右江发誓：“壮士此一去，不成功便成仁。别了，右江！别了，母校……”

第二天，我们都各自回家告诉自己的家里，有的家里不同意，但经说服也就同意了。经过几天简单准备，我们告别家人，一路高唱当时流行的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精神饱满地走上革命道路。

到田州后找到宣传队，我们象见到亲人，大伙争着说，听你们的宣传后，我们都很高兴，经过家庭同意来当兵，你们看我们够格吗？他们讲白话：“嗨（好）呀！嗨（好）呀！欢迎，欢迎！”我们把自己的情况作了介绍，他们把我们带到队部。由于我们几个都是学生，因此就把我们分配到驻在田州新街的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当了宣传员，负责刷标语、发传单、作宣传，并担任壮话翻译。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驻百色、奉议、平马的部队

举行了百色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部队打出了镰刀斧头的红旗，我们的军长为张云逸，政委邓斌（邓小平），下属三个纵队，共计两千八百多人。我所在的部队成为第七军第一纵队，我们每人都发了一条象征起义的红领带。

此后，在我党的影响下，李明瑞（国民党军第四编遣分区主任）、俞作豫（共产党员、国民党军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队长）在左江龙州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斌任政委。李明瑞为七、八两军的总指挥。

浴血隆安

右江和左江两岸先后竖起了两面红旗——红七军和红八军，桂系军阀大惊失色，他们调兵遣将，竭尽全力镇压。终因敌强我弱，红八军经战多日不支退守河池，后来与红七军合编，统称红七军。

一九三零年初，善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挑拨粤系军阀与桂系军阀在粤北江和桂北一带发生了战争。桂系军阀吕焕炎在梧州打出了反桂旗帜，造成桂系内部分裂。

当时桂系主力集中于平乐、荔浦一带，吕焕炎部又分散于玉林至贵县、南宁一线。红七军的领导同志从情报中得知，南宁守敌只有蒙志仁、张贯之等部不过1500多人，且张部战斗力甚弱，因而认为敌人在南宁的力量极为薄弱。又估计到桂系主力原在柳州、桂林一带因受到粤军及梧州吕部的钳制，无力顾及南宁。当时红七军士气高涨，一般干部和士兵对攻打南宁的呼声很高。在这种形势下，红七军的个别领导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对桂系军阀的不利因素看的过重，认为红军进攻南宁胜利在握，于是决定攻打南宁，进一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当时的具体部署是：以左右江为后方，留二纵队的两个营守百色，赤卫军守平马，军部率特务营、教导队、山炮连及一纵队、二纵队一营、三纵队两个营和赤卫军千余人从右江向南江进攻。原红八军余部从左江向南宁进攻，预定二月八日在南宁附近会师。进攻前，红军以政治口号的形式公开宣布了这一军事行动，这样，敌人受惊，加强了南宁的戒备，增兵驰援，以对付红军。

打仗，就要善于扑捉稍纵即逝的战机方能获胜。当时担任主攻的三纵队，因战前准备的时间过长，贻误了战机。结果敌人乘机聚集力量，主动向红军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攻打南宁落空。

当然，攻打南宁的计划“婴死母胎”，除当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部队政治素质太差。总指挥部原拟定红七军与红八军协同作战，两个军务必于八日到达南宁郊外会合。可是，红八军于二月一日宣布起义后，部队还来不及进行整顿，部队官兵的思想还没有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方面来。例如，当时士兵和下级军官留恋“月薪二十元(银元)”，军官打骂体罚士兵等等。但是，因军情急、战事紧，这些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结果，有的官兵对暴动起义当红军理解了，有的仍有疑虑，有的甚至持反对态度。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如一九三零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信中所说的那样：“中央现在最大的顾虑仍是你们部队中兵士群众的基础不稳固，随时都可以发生问题，所以你们现在应用最大的努力，在士兵群众中去工作，加强士兵群众的政治训练……，渐次做到废除薪饷制度，使士兵为本阶级利益而斗争。”

可惜，当时主要领导同志没有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未能适时开展政治教育。所以，当部队由龙州向南宁进军时，才抵宁明，后卫部队第三营在连长郑超的策动下，300多人哗变；收编的土匪编为第二、第四游击大队，也全部调转枪口哗变了。这样，红八军不得不回师围攻靖西，消灭叛军和土匪。结果，关键时刻分兵两路，两军联合攻打南宁的计划落空了。

这时，广西政局也发生了新变化。桂系军阀一部在张发奎部的支持下，由黄绍雄率领进攻吕焕炎。结果，吕部听命于桂系，玉林至南宁一带重归新桂系统治。新桂系军阀夺得南宁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和控制左江、右江两岸的广大地区，急忙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革命力量，决心将红军斩尽杀绝、永除后患。桂系军阀头目之一的李宗仁点将让其亲信李琪担任总指挥，出动了四个团共3000多人的兵力，在“围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同时，着令杨骏昌团、覃兴团、蒙志仁警卫第二团和岑建英的第八独立营，从贵县出发，经宾阳，过武鸣，兵临隆安城下。

那个时候打仗，不象现在侦察技术和手段先进，敌军情报来源主要靠步兵、坐探侦知。因此，侦察兵是指挥员的“耳朵”和“眼睛”。如果眼不明、耳不灵，提供敌情真真假假或真假难辨，是很要命的事。恰恰当时红七军在这方面出了纰漏。

二月三日，第一纵队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南宁城内无敌军，实际上侦察

情报不准确。第二天中午，隆安城内的“详和堂”老板向纵队报告，说三日夜里丁当村（离隆安县城东六十华里）来了一批军队，似有进攻隆安模样。纵队领导思想麻痹，没有再派人核实情报，也未采取应变措施严加防范，结果红军吃了大亏。

二月四日，敌军在隆安城东二十华里的小林村渡过右江，分两路从城东连安村和城南的南迂街向县城发起攻击。下午三时许，敌覃兴团两个连逼近城东，其余部队抢占了城东南的高地。

敌军兵临城下、枪声四起，纵队指挥员才觉得事态严重，忙率部仓促应战。一纵队司令李谦冒着枪林弹雨观察敌情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后送，部队由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继续指挥。红军官兵为保卫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奋勇还击，以死相拼。一营营长何莽是员猛将，指挥得力，很快率队将攻城敌兵击退，打开城门追敌至连安村附近。因城内兵力空虚，怕有闪失，这才停止追击，带领战士回到城中。这一仗除击退敌兵外还夺枪百余支、缴获机枪一挺。

第二天，敌我双方在城南山坳上激战，敌岑建英营伤亡过半，敌团长蒙志仁受伤。我军一营营长何莽负伤，但他不下火线，仍指挥战斗。

当天下午，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率部分红军以及二纵队、三纵队共二十一个连队和百色、思林、果德、平马等县的地方武装从龙州火速驰援隆安，三个纵队同时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攻击。由于双方投入兵力多，战斗规模较大，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官兵发扬了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打得勇敢、打得艰苦，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

部队起义、打出红旗只有两三个月，由于大批农民参加红军，使得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还缺乏战火锤炼。虽然有勇、不怕死，但机动灵活运用战术还欠不足。加上激战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以至阵地不稳、险象环生。如：预备队擅自过早出击，战场后备兵源不足；守城部队从雁江押送弹药的船在城西被国民党县长黄晓东率领的民团阻击，弹药未及时上送，阵地告罄。守城红军只有用石头、瓦块、木垒与手持真枪实弹的敌军厮杀拼搏。

七日凌晨，敌人一个连占领了城西高地，红军浴血奋战，击退敌人五次疯狂冲击，给敌军以重大杀伤。战斗一直持续到上午九时许，敌人援兵赶到，我军不支，全线溃退。撤退时，城内红军和城外红军失去联系，他们孤军奋战，与敌人

展开巷战，损失惨重。

隆安战役，红七军在张云逸、李明瑞的指挥下，以不足两个团队的兵力抗击敌军四个团，毙伤敌军 500 余人，红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达 300 多人。十时左右，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率 20 余名战士突围出城，因连续作战四昼夜，泅过右江到震东村体力不支，被民团俘虏杀害，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红七军兵败隆安，即向恩隆、平马撤退，在这一带的山区村庄驻扎。原想在此地等待从百色方向撤退出来的红七军军部直属队及二纵队，会合以后攻打平马，但这时敌人已追至并攻占恩龙县城。二月十二日，据情报获悉平马之敌大部已去百色，城内只有一营兵力。于是，红七军领导决定以军教导队担任主攻，地方赤卫队配合，向平马发起攻击，恢复右江沿岸红色政权。

我军与敌一接触，发现又吃了侦察不准的亏，原来平马守敌是覃兴的一个团。双方激战一日，红军进入了平马的牛行街。当夜，红军向扼守牛行街的敌人发动了数次进攻，未果。因怕敌人援兵赶来夹击，我军大部撤退，小部因未得到通知，仍在街里与敌交战两昼夜，后撤退。

战后才得知，从百色方向增援平马的一团敌军行至奉议，因见兄弟部队溃退，又闻平马被红军占领，便不敢南进。此时若我军主力不撤，猛攻平马，收复平马是有把握的。

此后敌军杨骏昌团从南岸渡河想包抄红军，军长张云逸即令部队撤出战斗，向恩隆县北部七里区山地转移。与此同时，敌军另一支兵马从恩隆、奉议向红七军后路迂回，企图阻拦红军进入东（兰）风（山）根据地。二月底，红七军匆忙经东兰进到恩隆县城北部的燕峒、亭泗地区（今巴马县境），以便与袁任远率领的留守百色撤退出来的红七军二纵队二营会合。二月二十八日，在亭泗与敌蒙志仁团遭遇，双方混战一天，两败俱伤，各自罢兵。敌退至奉议、百色，红军则经盘阳急奔东兰、风山一带。几仗下来，部队辎重、物资损失严重，人员伤亡 500 多人，红军中的失败情绪蔓延开来，各项工作也随之停顿下来，红七军陷入了困境。

红七军主力撤出亭泗后，经两天两夜的强行军到达风山县的盘阳区赐福乡驻扎。盘阳山多、石头多，周围几百里都是深山老林，地势险峻、山势陡峭、道路崎岖。这个地方原是个老革命根据地，穷人多，富豪少。地主被打倒，农民分了

田，农民武装和乡村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了，因此敌人也不敢贸然进兵骚扰。红七军主要领导同志决定在盘阳进行休整，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但因这里山地贫瘠，物产不丰，供粮困难，部队的整训工作进度非常缓慢。红军官兵普遍感到困在穷山僻壤没有出路，要生存，要发展，应该向外进击，扩大游击区，争取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样，解决当前部队的给养和弹药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三月初，中共红七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研究今后部队的行动方针。会议认为，南宁一带敌人兵力强大，是敌人反动统治力量的中心，红七军向南宁方面发展是不现实的。会议根据右江地区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状况，认为必须转为游击战争，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活动。会上，对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和今后红七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要进行长期作战，红七军就需要补充给养和弹药，因而主张摆脱敌人主力，跳到白区去寻找机会多打几个胜仗，以解决红军的给养和弹药问题。用这种方法可以扩大红军的影响，分散和减轻桂系军阀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以便红七军能在适当的时机收复被敌人占去的根据地。

另一种意见认为：红七军不应远离根据地去进行无后方的作战，应该在右江根据地周围开展游击战争。这样既可以保住和相机扩大根据地，又可以用就地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给养问题。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红七军应向贵州、云南边界发展，把部队拉到外线去作战。

会议经过严肃认真地研究，决定三纵队留守东兰、风山地区，继续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一纵队和二纵队的 3000 多人在张云逸、李明瑞的率领下，从河池出发，占怀远、陷宜北，向贵州进军。

一九三零年四月卅日，一、二纵队转战黔桂边界攻占贵州榕江县，这一仗缴获很多东西，解决了部队暂时困难。红七军在这里宣传发动群众，筹款筹粮，扩大红军。我们宣传队也活跃在各村各寨，向群众广泛宣传红军的主张。我那个时候除了提个浆糊桶和队友们到处刷贴标语外，还向群众作演讲，演出自己编排的活报话剧。我装扮成一个女的，队友扮成男的，一问一答，有唱有念，把革命的道理灌输给当地群众，这种形式十分受欢迎。而后红七军于五月上旬挥师回右江，六月初重新收复了百色、奉议、平马。

一纵队回到田州后，我向宣传队负责人请几天假回家看看，到家后看到我们

全村已被烧成平地。就是在红军转战黔桂边界作战时，民团及地主武装乘虚反攻倒算，乱杀乱烧，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右江。

我回到家后，群众都哭哭啼啼地向我诉说……看到家园变成一片废墟，乡亲们扶老携幼，无处安身，我对反动派更加痛恨了。我向乡亲们宣传说，哭没有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推翻了，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了，天下才能太平。现在这样蹲在树底下不行，应立即行动起来，互相帮助，每家修建一个草棚，这样下雨才有栖身之地。另外还需要站岗，防止地主民团再来倒算。

这时我的嫂嫂快要生育了，我帮助我的哥哥和弟弟一起修建了一个草棚，让我嫂嫂有个生育的地方。乡亲们也都行动起来，有的去割茅草，有的去找木头，有的搬运被烧了的碎砖、瓦片和灰渣，等大家都有了安身之处我才归队。

离开右江

一九三〇年，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阀反对蒋介石，六月混战在湖南，蒋介石命令云南军阀龙云派兵袭击南宁，企图直捣桂系军阀的老窝。龙云利用同李明瑞的旧关系，派人给李明瑞送信，要红军让出百色。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集中主力一、二纵队，于果化地区伏击滇军，激战数昼夜，双方都毫无进展而退出战斗。我红七军仍回恩隆（平马）、奉议（田州）、百色休整。九月整顿右江各县赤卫队，在田州将各县赤卫队编为第四纵队，黄治峰同志任司令。

十月上旬，第一、四纵队集合在田州新街后面大草坪开誓师大会。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下午部队准时到达，大家席地而坐，都静静地等待张军长、邓政委亲自来动员讲话。

不一会儿，首长们到了。会场指挥员高喊：“全体起立！立正！”而后跑步向军长、政委报告：“部队已全部到齐。”张军长和邓政委叫部队坐下后，开始讲话。讲话大意，是要到外线（根据地以外）作战，寻找机会消灭敌人，扩大苏区和红军。誓师大会第二天，第一、四纵队就从田州出发了。

就在部队集合，正准备出发时，我的妈妈和嫂嫂赶到，给我送来两双鞋子。当时家已被地主民团烧光了，家里什么都没有，这两双鞋子还是嫂嫂做给哥哥的，因我要出远门，便让我带上备用。这一来可解决了我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两双鞋，虽然是小事，但可见妈妈和全家人对我的关怀和支

持！

我的妈妈还拉着我的手呜咽着问：“你们这一走，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呢？……”我安慰妈妈：“用不了多久就会见面。”

谁知这次离家，竟一直到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一年我才又得以重返家园，整整二十二年我与家人音讯皆无、生死不知，只有这双鞋，唯系着我对家乡时时地思念……后来听说，就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一九四八年，妈妈叫着我的乳名离开了人世，她盼这个一去不复返的儿子见最后一面，死都没有闭上双眼……五一年我回家，还特地从青海给妈妈带了一件皮筒子，好让她老人家冬天过得暖和些，结果看到的却是荒墓一座……愿妈妈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一、四纵队从田州出发，经凌云，凌云有几百民团，稍打一下就被消灭了，我军在那里休息一天，第二天继续行动。经乐业、凤山、天峨、南丹，到河池同军部和二、三纵队会师。十一月五日在河池整编，三纵队大部、四纵队全部编入一、二纵队。纵队改为师，一纵队改为十九师，二纵队改为二十师，三纵队仍保留番号，改为二十一师，韦拔群同志任师长，带领该师少部分仍在东兰，继续坚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整编后，在河池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军长、政委的讲话和喊的口号，同在田州一、四纵队的誓师大会大不相同，讲话和口号大致都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配合全国红军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听军长、政委讲话后，部队情绪饱满。我们宣传队也照此写标语作宣传。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日，我军从河池出发，到三防休息几天，十二月四日猛攻长安，因为这是攻打柳州的必经之路。激战持续了四天三夜，我军伤亡惨重，我们宣传队也参加抢救伤员，冒着枪林弹雨背战友、抬伤员，不少的同志背在背上时还能感觉到微弱的呼吸和喘气，等到了临时卫生所放下一看，人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牺牲了。由于仗打得残酷，时间耗得太久，我军难以坚持。加之桂系军阀白崇禧打败滇军后，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不断派兵增援，并坐阵指挥，我军攻打不下，不得不向北撤退。

十二月十一日退至福祿（黔桂边），休息时间很短，大概一、两天，部队又向三江、龙胜前进。因为我们是宣传员，不知道行动意图，只听传说去攻打桂林，我们宣传队就议论开了，长安都攻不下，桂林能打下？十五日，部队到三江龙

胜，知道敌人已有准备，这样就放弃原攻打桂林的计划了，部队又转向北行动。十二月二十二日进驻湖南绥宁，二十六日猛攻武岗，经六昼夜恶战攻打不下，五十五团团长沙莽牺牲。湖南军阀何健派兵增援，部队撤出战斗，并向南转移。

一九三一年元月六日，红七军攻占广西全州，休息四天，精简机关，我们宣传队解散。我被分配到军部“军官训练所”当学兵。

元月十六日进驻湖南道州。湖南军阀分几路围攻我们，我们连夜撤退，敌人尾追。我们又向南翻过苗山进入广西，元月二十二日到达广西贺县的桂岑，这时部队经过三个月的连续作战，伤亡、掉队、开小差的不少，严重减员，只剩三、四千人。有的连队一仗下来死、伤、逃跑，只剩下几个人，战斗之隙我们还要分头挨家动员老百姓参加红军，作开小差战士的工作，动员他们归队。鉴于部队情况，红七军前委决定进行整编，把师缩编为团。十九师编为五十五团、二十师编为五十八团。

从桂岑出发后，部队进驻广东连县，休息了七天。广东军阀纠集了八个团向连县扑来，我军撤出连县，转到乐昌县的梅花村，第二天粤军四个团又尾追至梅花村，我军不得不奋起抗击，激战两昼夜，敌伤亡一千多人，我军也伤亡七百多人，原二十师师长李谦同志不幸牺牲。

部队撤出战斗后，绕过乐昌到乐昌以北渡河。当五十五团和指挥部及五十八团一部渡过河后，敌人正赶到，封锁渡口，雨点般的子弹落在河里。奉李总指挥、邓政委命令，没有过河的部队退回去，另找地方渡河。于是，没有过河的五十八团的一部份、军部和军官训练所沿江北上。进至石坪，把未过河的五十八团编为五个连，番号仍叫五十八团。这样五十八团、军部、军官训练所为另一路，辗转地渡过了禾昌河，进入湖南，经郴州境内，向酃县前进，于三月底至四月上旬到达酃县湘赣革命根据地黄泥塘。在当地游击队与群众的配合下击退地主武装及民团的进攻，俘敌数十人，我无一人伤亡。在黄泥塘休息几天后，继续向酃县前进。在酃县的水口镇与王震同志率领的独立一师三团，打了一个误会仗，以后得知独立一师三团是来接我们的。

与湘赣独立师的会师使部队情绪大振，大家都兴高采烈，觉得与朱、毛红军会师已实现了。那些打柳州、桂林没有实现，沿途又到处碰壁，同朱、毛红军会师无期的诸多悲观失望情绪，被会师的兴奋所代替了，大家顿感斗志倍增，觉得

革命大有前途，大有希望。

张云逸军长率领的五十八团与王震政委率领的独立一师第三团，继续向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前进。到茶陵附近时，湖南军阀陶广率两个团尾追而来，红七军战士与红独一师三团密切配合，将优势的敌人击溃，俘敌团长和士兵一百余人。四月二十日，我军至永新城。休息时间不长，张云逸军长率领五十八团（实际五个连）、军官训练所和红独一师、红二十军从永新出发，攻打吉安永阳镇守敌罗林旅，打垮了敌人，解放了永阳。

在这次战斗中，军官训练所开始作预备队，后来部队攻一个山头不下（敌背水而战，打得很顽强），张军长命令，由军官训练所去攻。结果我们攻下来了，并紧紧追击敌人至永阳赣江边。赣江水深，敌人无路可逃，只有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我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一支德国造的双筒枪，这支枪我一直背到河西教导队毕业。

李明瑞总指挥和代政委许卓（据说邓小平到上海去了）于五月中旬率领五十五团、五十八团一部分，从崇义赶到永新，和张云逸军长率领的从永阳胜利归来的部队汇合，从此，红七军结束了从广西到江西数千里路的辗转长征。

红七军两部分会合不久，便同二十军、独立一师统一行动，归李明瑞指挥，攻打盘踞安福之敌韩德勤旅，消灭该旅一个团，俘敌数百人，缴枪、炮约千支，其余敌人窜回安福城，闭门据守，我们没有再攻打安福城。

红七军回永新后，召开党代表大会，清算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从此，我们才清楚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致使部队损失惨重，是执行立三“左倾”路线的结果。

关于这一时期的“左倾”错误，毛主席一九三六年底还专题在“红大”作过讲演。他反复讲解了所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的严重错误估计和军事冒险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主席也作过精辟分析：“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章：战斗在湘赣

河西教导队

一九三一年五月，部队胜利凯旋永新后，红七军军官训练所与红二十军教导队合并，成立河西教导队（第二期改为红大分校）。河西教导队是为红军培养初级指挥员的学校，冯达飞任校长，李卜任政委，杨茂任训练部长，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

我在河西教导队学习五个月，校长，特别是训练部长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在军事指挥课上我们学习初级战术，每次野外演习结束后，都要讲评，全体都是立正听讲，谁稍微动一下，都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就是炮打下来，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动。我从单个教练到排、连的指挥都搞过。

在河西教导队，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政治课上，教员们讲得很认真，对我们要求也很严。王首道（省委书记）、甘泗淇（军区政委）当时都兼任我们的教员。有一次王首道书记问我们：“我们不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吗？”指名要我回答：“什么是帝国主义？”我答：“对外实行侵略政策，对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就是帝国主义。”还有一次，甘政委问：“我们不是要搞苏维埃根据地经济建设吗？什么是‘经济’？”我答：“‘生产’就是经济。”两位首长都觉得我回答的可以，很客气地叫我坐下。有些同志回答不上来的，就立正不准坐下。

要说以前参军打仗的思想动机在很大成份上是出来闯世界，为穷人打天下，那么从河西教导队开始，我便自觉地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从那时起，我成为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职业革命者。在河西教导队期间我所受到的从军事到政治的一整套基础训练和有关革命斗争的基本知识学习，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同年十月，我调省委党务学习班，教务主任是张子意。主要学习党的性质、任务和党的建设。经两个月的学习后，十二月分配我到独立三师任连政治委员（即指导员），我说我是共青团员，还没有转党呢。张子意同志说，我介绍你转党，你准备好后就上去上任。我说，我没什么准备的，只一个夹被，一个布垫，几本书，

什么时候去都行。张子意同志说“那你就明天走吧，明天有人到独三师。”当晚军区就给我送来委任状，署名司令员张启龙，政委甘泗淇。独三师驻关背镇，师部分配我到一连，师没有团，只有五、六个连。师长谭家述，政委袁任远。从此，我就走上了从来没有搞过的领导工作岗位了。

转战湘赣

任弼时、萧克同志到湘赣工作后，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成立红军第八军，独一师改为二十二师。独三师改为二十四师，我仍任二十四师一连指导员。因害疟疾病，到后方医院治疗，出院后，分配到二十二师任重机枪连指导员，参加打高陇（茶陵县属）、九渡冲（莲花县属）战斗。这两次战斗都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缴获不少枪支弹药，特别是九渡冲战斗，缴获几千套夏服，解决了部队夏装问题。

不久，红八军又与湘赣根据地调来的红十八师组成红六军团，原红八军的二十二师改为十七师四十九团，二十四师改为五十一团。这时，我调四十九团政治处任总支部书记，做党的工作。那时，团政治处的编制很小，政治主任之下，一个党总支书记，一个俱乐部主任，一个特派员（保卫工作），一个青年干事，一个技术书记（做秘书工作），总共6个人。

一九三三年秋末，敌纵队司令刘建绪为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发动了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猖狂进攻。红六军团全力还击进犯之敌，在永新、茶陵交界的梅花山歼敌近千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一九三四年一月，我们红十七师奉中央军委命令北上，与红十六师会合，任务是破坏九江至南昌铁路，牵制赣江以东敌人，配合中央五次反“围剿”。

部队从湘赣出发，在宜春县和分宜县之间渡过袁水，经万载县与宜丰县境，到湘鄂赣苏区赤白交界地黄沙镇，给尾追之敌湘军陶、李旅以严重打击。在古市岭、侵江同堵击我们去路之敌又打两仗。特别是完成破击南浔铁路后，回师湘赣时被敌人在龙门厂伏击，这一次打得很苦，团政委胡祖父、政治主任曾杰阵亡。这次北上，由于没有同十六师会合，造不成很大声势，没有完成配合中央五次反“围剿”的任务。五次反“围剿”，由于还是在王明路线的领导下，因此“围剿”也难以粉碎。

一九三四年三月初，部队回师湘赣，红十七、十八两师集中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四月五日在永新县之沙市伏击湘敌第十五师，全歼四十三旅，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滇均被虏。这次战斗结束后，我奉军团首长的命令，调任五十一团政委。任五十一团政治委员后，参加松山战斗（安福至永新之间）、安福至莲花之间的伏击战（地名记不得了）、永新石桥攻坚战斗等。石桥战斗只攻克数个碉堡，俘虏一部分敌人，因碉堡太多，无法全歼敌人。尔后，奉军团首长的命令，停止攻击。我团的任务，改为掩护全军到壁岗州集结，休整待机。

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敌人又在加紧封锁和收缩包围，粮食和物资都成为极端困难。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并创建新的苏区，一九三四年七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进入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设法与活动在黔、湘、鄂、川一带的贺龙的红三军会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八月七日，在任弼时（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军团长）、王震（军团政委）等同志的率领下，红六军团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开始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

红六军团的西征，可以说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前奏和序幕，应该看作全国红军伟大长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开始大家都不大理解西征意图，结果我们接命令，让能带的东西都带上，搞了个大搬家，负重行军。加上一路山高路窄，曲折崎岖，行军负担重，打仗顾虑多，走得很苦，后来进入贵州东西也就扔得差不多了。

敌人一路围追堵截，我军每前进一步都困难重重，经过全军指战员的艰苦奋战，我们进入湖南。渡湘江时，由于敌刘建绪调重兵阻防及桂军堵截，第一次没有成功，当天，全军转回湖南著名的阳明山，露营休息一天一晚，第二天下午五时左右下山。我们五十一团奉军团首长的命令作前卫，到了白果市，从四倍于我的湘桂军包围中突围出来。经几天的急行军，过宁远、嘉禾、蓝山、江华等县，胜利地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潇水，并一举歼敌企图阻我西渡湘江的八个团，于9月4日顺利渡过湘江，击溃了桂军的堵击，并追击其二、三十里，敌人沿途丢盔卸甲，狼狈不堪。五十一团掩护全军渡江后，我们沿广西、湖南边界向贵州进发。

进入贵州后，经黎平、剑河又渡清水江，攻施秉，占黄平，继续向石阡前进。由于通讯中断，各部队之间无法联络，我们不知红三军的确切位置，只是在施秉时听当地老乡讲贺龙的部队在这一带活动过，我们继续向北。这一段时间，又打了几仗，特别是甘溪战斗。

那天是十月七日，五十一团奉军团命令担任前卫。中午我团到甘溪大休息，我们正在吃自带的米饭团子，侦察排带回两个俘虏，送到团部，说是语言不通，听不懂在讲些什么。果然，询问他们时咕咕碌碌，讲的话谁也听不懂，只有我懂啦，因为他们不会普通话，讲的是广西白话。俘虏交待大意是说广西军阀十九师廖垒部正向我们这里逼近。我听后饭也顾不上吃了，一面和团长一起紧急布置战斗，一面迅速派人向军团首长任弼时、萧克、王震报告。

不一会儿敌人果真开了上来，战斗打响了。这时敌我之间仅隔着一小块开阔地，敌人向我多次发起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战斗持续到下午五点左右，军团首长考虑到我团抗击时间已久，部队伤亡也大，就派李达参谋长带四十九团来接替我们，换我们下来休息。正在交接过程当中，敌人就攻上来了。这时，四十九团还没有全部接替我们的阵地，而我团团长金承忠同志又负伤后送。敌人乘虚冲上来，我们的阵地一下乱了，李参谋长率四十九团就向甘溪以北大山上撤退，五十一团也有一少部分跟着爬上去，桂军尾追不放，敌强我弱，情况十分危险！

在这一紧急关头，我立即集合五十一团和四十九团部分剩余人员，保护着军团直属队边打边撤。当晚，我们就在军团直属队附近露营，军团首长任弼时、萧克同志来看我们，对我们团争取到抗击时间、打得顽强主动给予了表扬和鼓励，然后说，四十九团回来的少部分编入五十一团，统归五十一团领导和指挥。

贵州山大沟深，我们在群山中盘旋，到处都是悬崖峭壁，有的只靠一个独木桥通行，骡马很难通过，只有忍痛丢弃。从湘赣根据地突围出来，我们已经走了三个多月，且边走边打，人枪损失极大，出发时的九千多人这时只剩下三千多人，其中还有几百伤病员。部队在连续行军作战中，衣服挂烂了，鞋子磨穿了，骡马丢弃了，行李辎重被迫烧掉了。我们在极度的困难下，在约几百平方公里的大山中，辗转一个多星期才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十五日，李达参谋长率领的四十九团在沿河县的铅厂坝和红三军会合了，这时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贺龙军长率红三军主力亲自南下向甘溪方向寻找、迎接我们来了！

第三章：会师南腰界

初见贺老总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当时我们早有耳闻，在黔、湘、鄂、川一带，贺龙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听到贺龙和红三军要来迎接我们的消息，大家真象是大大地开了一顿“牙祭”，兴奋极了。因为在我们看来，贺龙的到来就意味着大胜利的到来！

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师，我们见到了盼望已久的贺龙的部队。他们身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头戴不同形式的帽子，有的还缠着川贵人的帕子，真是百花齐放。我们两军会师，群情振奋，欢欣若狂，大家互相握手、拥抱、跳跃，激动的泪水止不住流了满颈满脸。“向兄弟部队学习！”“团结万岁！”激昂的口号声震动着山谷，在群山中久久徊荡……

由于这一带仍属游击区，敌军又跟了上来。两军首长研究决定，此地不宜久留，全军速到川黔边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再休息。

二十六日，两军抵达南腰界。第二天下午，两支红军在南腰界正式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南腰界，是一个约有百来户人家的村庄，位于四川、贵州两省交界处，周围有一些稀稀落落的小庄子，象众星拱月，这里是红三军（红二军团）新开辟的根据地。二、六军团在这里会师，使这个庄子从此成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地方。

大会的会场，设在离庄子约三、四里路的一个不大的田坪上。会场的布置极其简单，除了一张桌子和几张压在田埂边的标语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它给人们的感觉，却很庄严、隆重。因为这次会师，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胜利。

离开会时间大约还有两个多钟头，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部队，都已一队一队的唱着歌，喊着口号，从四面八方到了会场。我们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因为驻地离会场较远，来得迟了一点。进入会场时，二、六军团的部队正此起彼落唱着歌子，呼喊：“团结互助、互相学习、争取新的胜利！”的口号。

小司号员们组成的军乐队显得格外活跃，他们在会场一边的田埂上，嘟嘟哒

哒尽情吹奏，有的还把自己的军号和不相识的同行调换着吹，会场里，充满着团结、友爱和胜利的气氛。

战士们都喜气洋洋，互相招呼着、拍打着，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由于通讯阻断、消息闭塞，大家都希望能从对方那里听到一些新情况。两军的干部们，过去虽然不认识，现在却象老战友久别重逢，三五成群地围成一个个圆圈，互相谈笑着。

我和金团长在会场东边认识了二军团六师十六团团长沙德善同志。他是山东人，满口北方话，我们虽是初次相识，但彼此问好后，便愉快地畅谈开了。

“你们辛苦啦！”常德善同志首先热情地说。

“你们也同样辛苦啊！”

“你们走了几个月？打了很多仗吧？”

“三个来月，仗是打了不少，别的都顺利，就是甘溪一仗打得苦些。桂系军阀打算在甘溪消灭掉我们呢，可我们却在这里跟你们会师了！”

“我们进到黄平、施秉时，就听老乡们说，贺龙的部队是‘神兵’！”金团长说。

“老乡们说我们是神兵，恐怕是说我们跑得快，打得猛吧？我们走路确实是快呀！常常瞅准了敌人，一夜走百十里，狠狠把敌人敲一顿，然后又走。等到了宿营地，再打一双草鞋天还不亮哩。”常德善同志满有风趣地说，把金团长和我全逗笑了。

我们红六军团，自八月由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出来，经过三个多月的行军作战，已经十分疲劳了，可是由于二军团的同志们热情欢迎和鼓励，我们的疲劳一下烟消云散了。每个人心里，都在为两军的胜利会师和即将到来的新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

司号长发出了预备号音，这说明军团首长快要到了，全场立即肃静下来。我们和常德善同志道别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不一会儿，首长们来了，全场都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欢迎。我们六军团的同志，都用尊敬的目光，注视着贺总指挥，因为他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显赫人物。他身材魁梧、健壮，手里拿着一个烟袋锅，笑容满面。想着今后他将直接指挥我们作战，心里顿时涌上一阵激动！

首长们来到了部队跟前，看了看部队，并亲切地和干部们握了手。

“你们都很年青呀，”贺总握着我的手问：“你多大？”

我说：“二十二岁。”

首长们同我们握手后，就到主席台上去了，确切地说，就是那张桌子跟前。

奏了一阵军乐之后，主席宣布开会了。第一个讲话的是任弼时政委。他的身体还是那样瘦弱，但精神却非常充沛。他首先宣布中央决定，红三军正式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接着宣读了党中央给红二、六军团会师发来的贺电，跟着又讲述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最后，宣布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并组织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的决定。他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贺龙总指挥也讲了话。他上来就说：

“六军团的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一路上跋山涉水，打了不少的胜仗，战胜了敌人，来到了这里，我们表示热烈地欢迎。”接着他又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到这里后，想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不让我们休息。这里的根据地是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现在……，”他拉长声音说：“可靠的根据地是在我们的脚板上！”

他讲到这里，大家哄然大笑！是呵，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有多少民族的精英在过着风餐露宿、天天搬家的战斗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走路也是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当贺总讲到可靠的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板上”时，大家会心地笑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表达了大家和贺总心心相印的感情。

紧接着他勉励我们英勇奋斗、再接再厉创造新的更大的局面！最后，贺总提高嗓子说：“这次二、六军团的会师，是模范的会师！”顿时全场沸腾，掌声和口号声经久不息。

任、贺首长的讲话，深深地刻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它给了我们胜利的信心，给了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从此以后，我们两支部队在贺、任、关、肖、王等首长的领导下，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并肩战斗，再也没有分开过。我们两军团的干部，也互相信任、亲密无间，成为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战友。

太阳慢慢地落山，天渐渐地黑下去，大会结束了。我们满怀信心和喜悦，回

到了宿营地。

会师庆祝大会后，我们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尔后，同红二军团的同志们一起，离开了南腰界——这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在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的率领下，继续踏上征程，向湘西进军。

调任二军团

在行军的路上，我接到贺、任首长的命令，免去我五十一团政委的职务，调任红二军团十六团任政治委员。

我接过命令后心情十分激动和喜悦，红二军团有不少的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军事上很强，能走善战，长于打硬仗。这次两军团会师，二军团将自己也很穷薄的家底，尽其所有支持我们六军团，抽调骡马、配置物资、送粮、送肉、承担警戒……使我们深深感到革命同志的兄弟情意。在当时十分严峻的形势面前，我们两军团都已清醒地认识到，从此我们将生死与共。

由于两军统一行动，所以总指挥部对干部也作了全面统一调整安排，大体上说就是二军团的军事干部抽调部分支持六军团，而六军团的政治干部抽调部分到二军团工作。

到达宿营地后，我同金团长嘟叨了几句，说我来不及交代工作了，部队的一切情况，你都一清二楚，谁来接替我的工作，由你介绍就行了。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同金团长握手告别后飞也似地赶到总指挥部政治部报到，因天色已很晚，当夜就在政治部住宿。

第二天一早，部队还未出发，我就赶到十六团的驻地。把命令交给常德善团长后，他高兴地抓住我的手一股劲地摇：“在庆祝大会上我们就象老战友一样无话不谈，现在你到我们团上来了，这太好了！欢迎，欢迎！”我说：“我初来人生地不熟，希望你多多帮助，我们共同努力工作，一定不辜负贺、任首长的信任和期望。”部队集合后，常团长就把贺、任首长的命令向全团宣布，全团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尔后部队按命令的行军序列，开始了新的征途。

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十一月初，我军进入湘西，攻占了永顺县城，守敌民团数百人大部被歼。二、六军团就在永顺城及其周围休息几天。

湘西军阀陈渠珍纠集三个旅一万多人向我军逼进，我两军团除留侦察部队保

持同敌人接触外，全部撤到龙家寨，摆下口袋式的伏击圈，我们十六团则作口袋底。

保持同敌人接触的侦察部队，则边打边撤，引诱敌人到龙家寨我伏击圈内。十一月十六日，当傲慢的敌人宿营弄饭时，总指挥部贺、任首长一声令下，部队就四面八方地吹起了冲锋号，各部队按既定的歼敌命令，猛烈冲杀，敌人蒙头转向、措手不及。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只几个小时，除陈渠珍和几个旅长、团长化装与一些很少数的残余部队乘混乱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灭，俘敌旅参谋长以下两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

这次战斗提高了部队士气，初次显示了二、六军团并肩作战的巨大威力，是打开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关键的一仗。战后乘胜再度占领永顺县城，继而进军攻占大庸。大庸攻占后，十六团奉命攻打桑植（几百民团早已逃跑）。占领桑植后，我们就在桑植发动群众，扩大部队、肃清土匪、巩固后方、寻找地下党、公开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等，时间长达半年。

在桑植清匪，我们曾遇到扮成“神兵”的匪徒，这些人有的是打家劫舍的土匪，有的是逃进深山的地主民团，他们勾结到一起，将脸画成五颜六色，假扮“神兵”，扬言“刀枪不入”。我们个别战士也有迷信思想，怕“神兵”有神符保护，产生了畏惧情绪。针对部队存在的这种情况，我和常德善团长召集会议，耐心地给大家讲“神兵也是人，也是娘胎里出来的，哪有枪打不进的道理！”一次，部队又与一股“神兵”相遇，我和常团长如此这般部署了一番，然后命侦察排与“神兵”接触，并边打边撤。“神兵”不知是计，很快进入部队的伏击圈，霎时，我们的轻、重机枪和步枪一起开火，直打的“神兵”哭爹喊娘，死的死，伤的伤，后面的见势不妙，也都争相落荒而逃，“神兵”瞬间溃散。战斗结束后，我和常团长组织部队打扫战场，战士们亲眼看到这些“神兵”也是人，消除了心中疑点。我们十六团很快肃清了根据地内的土匪，稳定了根据地的社会治安。

负伤板栗园

早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已退出苏区，突围长征。原打算继我们六军团之后，也来湘西会合。后中央改变了路线，挥师向西，而后向北进入贵州。由于通讯中断，我们无法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位置，但二、六军团几个月来的湘西

攻势，迫使敌人从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中硬是抽调出十多个师，这样一来便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有效配合、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在鄂西忠堡截击援敌的战斗中，又一举歼敌第四十一师和一个旅零一个营，活捉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忠堡战斗胜利后，我红二、六军团主力回龙山以东地区待机。

我们十六团这时也奉命由桑植归建。走前，我们同县委老赵同志（外号称赵拐子）商量，把已经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给我团补充一部分，留下的人作为骨干，原地坚持斗争，不断发展壮大。我还鼓励老赵说：“你是本地人，情况熟悉，这里又是贺总指挥的家乡，群众基础好，他们常向部队打听贺总指挥近况，有的还说去玩（本地方言，意思是看望）贺总去，我们相信县委和游击队是能站得住脚的。”老赵同意我的意见，也这么做了。

我们归建后，六师奉命围攻龙山县城，我军主力仍在龙山以东地区待机，以逸待劳。根据师部的指示，围城的部署是：我团担负城西南并派出部队向来凤县警戒，十七、十八团在城北和城东，师指挥部设在城东。

起初，上级命令我们攻城部队只是“围而不攻”，后来又叫我们“攻攻停停或停停攻攻”。这样围攻了二十多天，我们很难猜透上级的意图。城内守敌，久被围困，粮食和弹药难以持久，只好向上求援。有一天，总指挥部截获并破译了守敌向其上级要求派兵增援和空投粮食、弹药的电报，该电报的内容也向我们团作了传达。

围城将近一个月，我团指战员们等得实在不耐烦了，有的连队还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大敌当前，战斗情绪松懈、自傲轻敌，实是兵家之大忌，于是我同常团长商量，召开了连营干部会，进行思想动员。会上，我向干部们讲，上级命令我们围城，大家要坚决执行，各项准备工作不能放松，听候命令，不得自作主张。从今天起，各营和各连都要按照团部预定的作战方案，重新侦察地形，选择爬城地点，选择火力掩护阵地等。要加强登城、扩大突破口、巷战的训练，还要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多找一些登城的梯子。我讲完话，常团长又强调一定要抓好部队的战斗作风、纪律培养和当前应克服的部队情绪松懈等问题。

会后的那天晚上，天黑得似倒扣的锅，我和常团长带领作战参谋，摸到城墙边上又勘察了一番。龙山县城西南，一片小小的开阔地，没有露岩、铁丝网、明

碉堡之类的障碍物，但城墙高而厚，敌易守，我难攻。

翌日清晨，我们接到了师部转来总指挥部的敌情通报说，蒋介石为解龙山县城之危，敌第八十五师从江西调到鄂西，加强来凤至宣恩的封锁线。该敌刚到鄂西，人地生疏，缺少作战经验。当他们由小关向李家河前进时，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除留侦察部队监视龙山守敌外，围城部队全部撤走。红二、六军团再次进入鄂西，埋伏于板栗园地区，一举消灭该敌。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总指挥部的意图是：围城的目的，是为了引诱敌人来援，在运动中打其援兵。我向常团长说：“这就是同敌人斗智呀！我们头脑太简单了，只知斗武，不知斗智，这回又增长了一门知识。”

我军隐蔽埋伏在板栗园地区，板栗园两边都是山，但山不太高，山上到处是矮矮的树林和茅草。两山中间有一条浅浅的河，经来凤流入西水，李家河至来凤的大道就沿这一条小河南去。八月三日，当敌人大摇大摆地向湖北来凤行进时，我隐蔽埋伏在板栗园的部队突然对敌发起猛攻，将其截成几段，采取砍头（即敌前卫）、斩腰（本队）、割尾（即敌后卫）的战术，迫敌首尾不能相顾。我则大胆穿插、分割、包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我团攻击敌人的阵地是敌八十五师特务营，是敌师长谢彬指挥的阵地。我团战士英勇冲击，敌军则拼命顽抗，战斗激烈而残酷。

为了尽快歼灭这股顽敌，常团长告诉我，把团预备队（一营）拉上去，我补充说：“参谋长和政处主任留在原地团指挥所，以便同师部取得联系。并派通讯员告诉第一梯队（二营和三营），继续向敌发起攻击，团预备队从第一梯队右边迂回过去，这样会动摇正面敌人顽抗的决心。”接着常团长和我带领一营，迂回到敌人阵地右侧，组织部队冲锋。突然，我的右胸似被人猛击了一下，因为经常行军打仗，负伤的事见得多了，我没有在乎，仍然和团长指挥战斗。

“呀！政委你挂花啦！”多嘴的警卫员大声喊了起来。

“你喊啥，滚开！”我喝斥道。

战场上往往有这种情景，一个人当他高度精神集中与敌人拼杀的时候，尽管负了伤，但不会感到疼痛，仍然会冲锋厮杀的。这时如果谁喊：“你负伤了！”他的精神因受刺激，人就瘫了，痛也来了。正是这个原因，我向警卫员发了脾气。

由于条件反射，我觉察到了有一股热乎乎、粘叽叽的东西从胸部流出，伤口

象撒了一把辣子面，疼痛难受。

重伤不喊痛，轻伤不下火线。战前，我向指战员做思想动员的时候，不知说了多少遍。再说，战斗打得这么激烈，那能顾得上痛不痛呢？我把身体紧靠在一块大石头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和团长一起继续指挥战斗。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眼冒金花，大脑轰的一下，便昏倒在地。

后来听人说，我负了伤，常团长让警卫员和一个通讯员把我背下山，找来担架把我护送到救护所。抬担架的在通过一个开阔地时，被敌人重机枪手发现了，“哒哒哒”机枪扫射过来，吓得两名担架兵拔腿跑了，还是护送担架的警卫员和通讯员把我迅速背到田坎下隐蔽起来，十多分钟后，部队拿下了阵地，枪声渐稀，机枪也哑了，那两名担架兵才跑回来把我抬到救护所。

不一会儿，常团长因被敌人手榴弹炸伤，也被抬到了救护所。后来，我们都被转到“总指”卫生部坐担架随军治疗。

第二天，据总指挥部通报：板栗园战斗，我军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另一个特务营，击毙敌师师长谢彬。

好玄呀！据当时的卫生部长贺彪讲，差一点儿我这百十斤的人就报销啦！这一枪打进去，子弹从右胸上部斜插进去，贴心脏和肺部的边，由左背穿出，当时涌出的鲜血把我上衣都浸透了一大片。战争年代，我军医疗条件十分简陋，药品更奇缺，谁要是挂了花，敷药、包扎、止血便算不错了，奇痛袭上，只好咬紧牙关硬挺。一段时间，我的伤感染化浓，当时的卫生员就用一根铁丝顶端扎上纱布，再蘸上红药水，然后穿透伤口，象拉锯似的把里面的污血和浓水拉出来。说也怪，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伤口也痊愈了。

在以后的战斗中，我又负过几次小伤，记得一次是在腿上，一次是被弹片擦掉了一大块头皮。因为都没有伤着骨头，无大碍，都是我自己用尿拌合些泥巴敷在伤口上，倒也愈合了。

在卫生部治疗了一个多月，常团长也能下地活动了。一天，他突然问我：“政委，你是广西人，怎么到湘赣红六军团来了？”

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便转问：“老常，你这个山东人，怎么跑到南方来了？”

老常嘿嘿一笑，幽默地说道：“政委，你别笑，我这个人象飞萤，哪亮往哪

飞。贺龙是颗星，我就飞他这儿来了。”

“你飞对方向了么！”

“哈哈！”我俩开怀大笑。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遗憾的是，我的战友常德善同志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了。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在这里我写下他的英名，并告慰他的英灵：你为之奋斗而诞生的新中国象一颗灿烂的巨星照耀在世界的东方，国富民强，笑声海处。愿你含笑安息！

板栗园歼敌八十五师胜利之后，我军即返回根据地，于八月八日在芭蕉坨一带击溃陶广纵队十个团，我军军威大大提高，敌军不敢妄动，被迫处于防御。八月下旬我红二、六军团展开攻势行动，红二军团六师攻占澧州，四师攻占津市。六军团攻占石门、临澧等。再一次大大地调动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同时我军乘机就地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大红军。

我军这一攻势，出于敌人预料之外，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我红二、六军团也逐步靠拢，在大堰挡与新调来的二十六路军樊松甫纵队打了一天，歼敌一部，其余溃散。我军亦逐步进入山区休息，补充新兵和训练等。蒋介石每天都以三五架飞机轮流轰炸。这时，我奉命调到四师任政委，师长是卢冬生。

第四章：长征二万五

突围

一九三五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一百三十余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敌人的堡垒封锁越来越紧，红二、六军团已收缩到苏区中心。针对这一情况，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总指挥部在分析敌情后，认为我军回旋余地小，粉碎敌人的碉堡政策非常困难，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跳到外线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由于和中央失去联系，自南腰界会师以来便再没有得到过有关中央的消息。只知道三四年的十月，中央红军已离开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并不知道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到了陕北。和川陕根据地的四方面军更无法联系，也不知他们实际已于三五年三月转移到四川西康两省的边境地区。面对蒋介石疯狂“围剿”革命，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省委和总指挥部在湘西桑植县刘家坪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贺总、任弼时政委亲自下达突围命令。

十九日，我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纵队开始突围。当时，敌人沿澧水、沅江构置了两道堡垒封锁线，并出动飞机来回轰炸、扫射。我们四师担任二军团前卫，二十日胜利突破澧水敌人封锁线，并乘胜占领辰溪，六师占溆浦，六军团渡沅江占领湘中新化。各军在原地休息，筹集粮款，并观察我军渡过澧水、沅江后敌人的动态。尔后，六军团逐步向溆浦、辰溪二军团靠拢，至此，我们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突围成功。

二、六军团跳出封锁线，打破了敌人企图将我围歼消灭在苏区的部署。敌人发现上当，由湘西尾追至湘中，这时，我两军团却逐步向湘、黔边界转移。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各部队在原地过新年。二日，我四师经便水渡河占晃县，五日奉总指挥部命令，四、六师和六军团向我尾追之敌湘军李觉纵队进行反击，四师奉命首先向敌先头部队发起突击。战斗一整天，无进展。四师及参战部队黄昏时奉命撤出战斗，敌人也龟缩在原地不敢冒动。这次战斗四师参谋长金承忠同志阵亡。

由于便水一仗未能有效阻住敌人，红二、六军团放弃原准备在湘黔边建立根

据地的打算，继续西征。十一日，四师占领贵州省石阡县城，两军团在石阡城及其周围取得了七、八天的休息。

贵州，用“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来形容，已基本概括。本来已是很穷，又加上吸食鸦片，使这些赤贫如洗的人更是雪上加霜、凄惨困苦。转战贵州期间，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贵州的“双枪兵”，每人一支步枪，一杆烟枪，打起仗来，宁交步枪不交烟“枪”。

一月二十日，二军团由石阡出发，二十一日突破敌人河坝至龙溪碉堡封锁线，继续向黔西、大方、毕节进军。黔西高原更穷，此时正值春节，然而我们却处处看到饥民，衣不遮体、瘦骨嶙峋、目光呆滞……

二十四日我四师袭占瓮安县城，二十五日指挥部命令四师附六师十八团于当晚十二时出发，二十六日早晨占领平越，继续向马场坪前进。马场坪敌九十九师的一个营向平越增援，被我击溃，俘敌七十余人，平越县长被我击毙。三十一日五师袭占修文。

二、六军团攻占修文，使得贵阳吃紧。敌人恐慌，怕我沿中央红军老路渡乌江、取遵义，便在乌江北岸设部队严密防范。我军却出其不意，渡鸭池河进军黔西北。二月三日六师占领黔西县城，五师三日占大方城，七日成立川、滇、黔省委，开展地方工作。我们二、六军团在黔、大、毕驻扎二十多天，发动群众打土豪，把土豪的浮财分给群众，号召群众参加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准备在黔、大、毕创建新的临时根据地。

二、六军团除少数分散做群众工作外，集中主力准备消灭围剿之敌，打开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局面。但是敌人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李觉纵队、万耀煌纵队、郝梦龄纵队、樊松甫纵队、郭汝栋纵队，兵分几路，齐头并进。无论你打哪一路，都不能解决问题，都会形成僵局，打消耗仗，对我们十分不利。

在黔、大、毕搞了不到一个月，二、六军团同敌人只零星地打了一些小仗，没有打开局面。二月二十五日省委和总指挥部决定结束后方工作，放弃在黔西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准备新的转移。三月二日正式决定向滇东转移，三月二十三日进到宣威地区，敌孙渡纵队、刘旅四个团，由宣威城出击，被我四师和六军团将其击溃，后因敌增援六个团，我军未能取得全胜。战斗结束后，缴获枪支三、四百支，轻机枪数挺。此次战斗四师十二团团长钟子廷、十一团政委黄文榜阵亡，

十团团长刘开锡负伤。

三月二十四日，我军向东南转移。二十八日，四师占领贵州省盘县，二军团和六军团陆续到达盘县及其周围休整。三十日总指挥部接红军“总部”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命义发来的电报命令，并向各师主要领导传达，要求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一、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总指”表示坚决执行红军“总部”的命令。

金沙江

四月一日，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开始从贵州盘县出发，进入云南。经几天急行军，四师按“总指”的行军命令，在昆明以北强渡普渡河。普渡河是个峡谷，水不深可徒涉，当时四师大部分部队已过了河。过河后还得爬一座大山，山上有滇军一个工兵团在堵截，我们的十团经激战，已占领敌人一部分阵地，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还没有全部击溃敌人。我们打算使用二梯队十二团从突破口进去，配合十团全歼该敌，掩护全师渡河。

当时六军团在我们的右翼、普渡河的下游渡河。我们听到他们打得很激烈，派侦察部队去和他们联系。侦察部队还未回来，我们就接到“总指”命令，已过普渡河的部队全部撤回。后来才知道，六军团在河东与敌孙渡纵队遭遇，敌人追剿部队主力已逼近，距我只几十里路程，如不及时撤回，便有被敌包围歼灭在普渡河的危险。因此“总指”改变原计划，沿金沙江上游北上，抢在敌人前面渡江。在这次强渡普渡河战斗中，师政治部主任肖令彬阵亡。

我四师从普渡河撤回柯渡街集结休息，六军团政委王震在柯渡街等我们。王震政委向师长卢冬生和我当面传达“总指”贺、任等首长的指示：“明天拂晓前，你们要离开柯渡街，滇军孙渡纵队十二个团明天拂晓要包围这里。朱总司令、张国涛总政委派九军团南下策应我们渡金沙江，我们要在九军团未到之前全部渡过江。”

王震政委走后，我们立即把各团团长、政委叫来，原原本本地将王政委传达的内容告诉他们，并要他们督促各营连立即弄饭，下半夜三时按“总指”指定行军路线出发。行军顺序：没有过河的十一团为前卫，师直、十二团为本队，十团为后卫。我们除留骑兵侦察连一个班观察敌情外，拂晓前全部撤离柯渡街。在我

们四师行军沿途都有群众在路边卖茶水。

我们一路经寻甸及昆明以北，并派骑兵侦察连向昆明附近游击，据侦察连报告，昆明城内非常恐慌，因为他们的正规部队，已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经过几天的行程，十三日，到达富民县属的中村。十四日下午五时，我们奉命由现地出发，走昆明到楚雄的公路行进。为缩短行军距离，各部队都是以两路或三路纵队并行。经一夜和半天的急行军，行程一百八十里，于十五日下午三时，部队陆续到达楚雄附近，稍微休整后，开始分几个地方攻城。

主攻方向在东门，我们集中炮火掩护东门部队攻城，一小时左右，部队就爬上了城墙。上城墙的部队，一面打开城门，让城外的部队一拥而进；一面向两翼发展攻势，其他助攻部队也都爬上了城墙。我们四师指挥所设在东门附近的一个小山坡的旧碉堡内，两架敌机一直在我们上空轮番轰炸。经两小时的战斗，一千多民团全部被歼。

入城后，我们打开一家大地主的仓库，嘿！整整一个大殿，严严实密、满满当当挂满了腊肉！我们发动战士每人尽可能多背，以作干粮，其余分给当地饥民和老百姓。我们在楚雄休息了一天。

这时接“总指”通知：各部队要尽可能地准备防寒的东西，如酒、姜、辣子之类等，准备在必要时用。

十七日，四师奉命继续向北急进，二十日攻占宾川县城，击毙守城民团一百余人，俘敌三、四百人，活捉伪县长。二军团直属队和五、六师也于当天到达宾川附近宿营。“总指”在城内县政府住宿，师长卢冬生和我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首长汇报部队情况，总的来说，部队疲劳，但情绪高，士气旺盛。

二十一日继续北进，二十二日占鹤庆县城，沿途凡经过的村庄和镇子，群众都摆着桌子烧香，桌子两边都备有开水，老百姓一群一群挤在一起，好奇地看我们，我们部队也向群众招手致意。对摆桌子烧香，部队很感兴趣，都说这大概是少数民族的习俗吧。

二十四日，四师顺利占领丽江城，天黑后骑兵侦察连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进，当夜就占领石鼓镇金沙江渡口，并掌握五条船。江边也还有不少木头，可以做木排。我们从楚雄起就一直调查并动员部队的水手（洪湖的同志一般都会摆渡），计划渡江时轮换摆渡，人休息船不休息。

二十五日，我们四师到石鼓，冬生师长和我简短布置后，十二团接着就上船过江。五只船和一个木排，一次可过一个营，骡马游浮渡过，昼夜摆渡。开始是船主摆渡（给报酬），他们劳累了，由部队挑选出来的水手替换。冬生师长先过江，在江那边指挥，我留在江这边组织部队渡江。二十六日，全师渡过金沙江。关向应政委为了了解情况，同我一起乘最后一只船过江。

当大批敌军气喘吁吁赶到金沙江边时，我们红二、六军团已经进入雪山藏区，敌人只有望江兴叹……

雪山草地

四月二十七日，作为前卫，我四师奉命向中甸前进。翻第一座大雪山时，十二团政委朱辉照同志被藏民反动武装伏击负伤。我们爬这座大约海拔五千米的高山，走了大半天才到山顶。我们二、六军团的干部战士，几乎清一色来自南方炎热而潮湿的地方，有些人甚至没有见过雪，刚才在山下时还天气晴朗，野花盛开，茂密的原始森林郁郁葱葱，现在却大雪纷飞，山顶积雪约两尺多深。我们都是夏装草鞋，而且经一路征战，已是衣衫褴褛，在山下时，由于人烟稀少，无法作充分的防寒准备，现在骤冷加上空气稀薄，许多人倒下了。后来，我们传下命令，过雪山时，不能停，不能坐下休息，后面的人看前边的人走的脚印，不要东张西望，因为不注意可能陷到雪里去。同时，一望无际的白雪，对眼睛有刺激，搞不好就会害雪盲。大家要互相鼓励，互相搀扶，最大限度地减少死亡和掉队，为后续大部队翻越大雪山取得经验。

那样高的雪山，我们下山时却只走二、三百米就下来了，再走一段平川地，就到宿营地——格罗湾了。二十九日到小中甸，三十日占领中甸县城。中甸城内有一个大寺院，还有几十户汉人商店，城外是藏民，周围是一片荒野。

群众和寺院的喇嘛都没有跑。我们同寺院的大活佛说，我们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的政策信教自由。因为这里房子太少，部队多，想借你们寺院一部分房子住。懂司（翻译）把我们的话向他翻译后，大活佛说：“雅木雅木的”（好的意思）。这样，师部就住在寺院里。当晚，大活佛还请冬生师长和我吃一顿饭，在吃饭时我们请寺院捐助一部分粮食，他们也同意了。

五月一日，二军团直属队、五、六师全部到达中甸城及其附近，我们调整各团住房，给五、六师让房子。师部搬出寺院，给“总指”住。贺、任、关首长在中甸召开两军团干部会议，会上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分别宣讲了全国形势和党中央关于在西北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会上“总指”提出了红二、六军团目前的任务是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接着动员过雪山、对少数民族政策、同四方面军会师等问题。

我师在中甸休整四天，“总指”敌情通报说，我二、六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后，滇敌孙渡纵队才到石鼓，无奈只好向江北胡乱打枪打炮。我们看通报后，都讥笑他们是一群饭桶，慢的象乌龟爬，还想把我们当石达开打呢！

五月五日，我们奉命出发。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二军团为左路，在西，走德荣、巴塘、白玉。我们一直沿金沙江北上，有时走山路，有时沿江边，走了七、八十里不见一个村庄，当天晚上就在原始森林的树下露营，半夜下雨，但树高枝多叶密，小雨下不透。

六日继续行动，沿途同样不见房子，只见茂密的原始森林。到宿营地也只有三、五栋房子，部队还是露营。七日在行军中，师骑兵侦察连在桥头被藏民反动武装袭击，从山上滚下石头、木头并放枪，骑兵连三分之一的马被石头、木头压死压伤，人员也有伤亡。随骑兵连行动的师参谋长汤福林同志也被乱石、乱木压砸而阵亡。敌人并不多，只有二、三十人，我们派一个连上山去，敌人早就跑了。我们把拦路的石头、木头搬开后，部队继续前进。到达宿营地汤堆，这里也只有几间房子，部队还是在树下露营。

十日我师占领西康省德荣县城，这里只有几栋房子。县长是一个湖南人，早就逃跑了。第二天（十一日），军团直也到达德荣，全部露营。

十二日，四师继续沿金沙江北进，一路同样看不到村子，反正走三、四天休息一天。在云南筹的粮食虽然节省再节省，也快食完了。

六月三日，好不容易才到达巴塘城东北休息。六日军团直属队与五师也同时到达，冬生师长和我把部队粮食情况向贺、任、关首长汇报后，建议打巴塘城，但侦察结果，城周围碉堡太多，要攻城代价太大，只好罢休。“总指”首长决定除派一个营向巴塘城警戒外，全军团都在城东北露营休息。

六月七日，四师奉命出发，向白玉前进。十九日占领白玉县城。城内城外都

有房子，我们在这里筹到一部分粮食。军团直属队二十一日到达白玉，我们筹到的粮食，给军团直属队分了一部分。

六月三十日，四师和军团直属队向东翻了一座大山。山上积雪一尺多厚，山下却象春天，森林茂密，野草丛中开出鲜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下了山后又走了一段路就到绒坝岔，在这里我们受到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和当地藏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一路上经过千难万险、千辛万苦的部队指战员们见到前来迎接的四方面军的同志和藏族群众，都非常兴奋，情绪十分高涨。我们也同他们团的干部一一握手，向群众挥手致意。绒坝岔位于甘孜以西四十多公里，周围是一片荒凉的草地，据“总指”首长说，六军团走插城，他们早已同九军团会师了。

晚上宿营时，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给我们送来《干部必读》和《文化课本》，我们翻开一看，内容都是反毛、周、张（闻天）、博（古）的。这时，我们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一、四方面军之间发生了问题。我对冬生师长说：“先压下不发。”第二天，二六三团为了给我们腾出房子，他们出发回甘孜去了。我们把他们送来的所谓《干部必读》和《文化课本》向贺、任、关首长汇报怎样处理，首长们异口同声地说：“烧掉！”我们四师在绒坝岔休息一天。

到这里后我们才知道张国涛搞分裂，中央红军已于去年到达陕北了。张国涛还企图控制二、六军团，派他的人换掉我和廖汉生等几个师政委，但被贺、任、关首长拒绝了，派来的人也没有让他们回去，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七月三日，四师及“总指”直属队到达甘孜，四日至五日原地休息准备北上。到甘孜后，“总指”接到中央命令：原二军团、六军团总指挥部，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指挥二军团、六军团及三十二军。

这时张国涛迫于二方面军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压力，被迫同意共同北上。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合，我们遵照上级命令，向部队进行了团结北上的正面教育，维护红军的团结，一切以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大局为重。

七月六日，四师及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队从甘孜出发北上。这是一段艰险漫长的路程，横在我们前面的是茫茫千里的水草地。这里人迹罕至，连鸟都见不到一只，数百里的范围内看不到一处房屋。

经过二十天的行军（包括路上休息几天），我们到达阿坝。从甘孜出发就下

令，每人每天只能食二两千粮，不够的找野菜。可有时连野菜也没有，因为走在前面的是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前卫是六军团，依次是四师、二方面军“总指”直属队、五、六师及三十二军。这样多的部队都走一条路，别的也无路可走，沿途野菜都被扯光了。

在二十天的行军中，我们翻了好几座大山，有时遇到狂风暴雪，下到山下露营，根本看不到一个村子，草地连一棵树也没有。有时遇到大雨，大家把被子当帐篷也不行，还是漏雨，全身湿得精透，根本不能睡觉。

阿坝，人们称它为“草地上海”，大家都希望到阿坝能补充一些粮食，没有粮食，羊也可以，结果希望变成泡影。卢冬生师长和我及警卫班全部出马，找了一天粮，根本没有找到粮食、野菜和牛羊，只猎获一只野狗。回来后野狗一煮熟，连盐都没有，大家先喝汤，最后吃肉，吃完后，大家都说会了一顿美餐。

七月三十日，六军团从阿坝出发。四师三十一日也从阿坝出发，本来应该多休息几天，因为部队的体力确实很弱了。但阿坝既无粮食也无野菜，牛、羊早已被藏民赶走，周围几十里路之内，根本找不到一只牲畜。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走也不行。

七月三十一日从阿坝出发，部队进入草地深处，向巴西和包座行进。阿坝到包座，十二天中走了九天的水草地。绿茵如毡的草地，气候却象魔鬼的恶作剧，忽儿烈日，忽儿冰雹，时儿下雨，时儿大雾，更多的时候则是风雪交加，狂风怒吼。没有路，沼泽软得象豆腐，积水常常漫过胯骨，要看着前面的人走，稍不注意人和骡马都可能陷进泥潭，而且越陷越深，倾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路上没有树木和房子，部队都是露营，就是在水草中间凸出的小土坡露宿。

部队在白玉、甘孜筹到的一点粮食也吃完了，野菜被前面的部队扯光了，各团领导同志都来师部汇报情况，部队因体力太弱，牺牲、掉队的不少。怎么办？我和冬生师长研究后命令把骡马杀了，救人要紧呀！师骑兵连到包座就没有剩几匹马了。

本来可以早出草地，但遇到噶曲河水涨了，等了两天才过河。

过噶曲河的时候，附近有不少的小水洼，我们发现水洼里有很多鱼，这些鱼没见过人，我们抓它也不躲。有了鱼吃，饥饿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无盐无油，吃的多了便反胃，弄得我几十年对鱼都没有食欲。

草地的最后几天，我病倒了，患了痢疾，发着高烧，两腿象灌了铅，浑身虚软，大汗淋漓，一点力气也没有，最后只好躺在担架上被抬出了草地。

到草地的边缘包座后，部队休息几天，我们用高价收买群众的青稞，群众不卖也不行。因开始有的战士到地里烧青稞吃，怎样动员都不走，我们也理解战士的心情，确实饿得不行。群众要多少钱，我们都一一付清。同时，我们和群众商量也筹集到一部分粮食。

八月中旬，终于走出了草地，我们靠着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走出了这片没有人烟、没有生气、无边无际浸在污水中的腐烂的沼泽地。在这艰难的长征路上，我曾经写下了整整十本的“长征日记”，记录了长征中大大小小的战斗及各种会议，记载了英雄的战士和感人的事迹。和吴杰同志结婚后，我曾请她用正规笔记本工工整整地重新抄录了一遍，我视为珍宝，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转战陕北期间，一次敌机轰炸，骡马受惊，行李失散，我丢失了这份宝贵的资料，一直遗憾至今……

四师和方面军“总指”直属队从包座出发，沿途经过洼藏寺、莫牙寺、腊子口、大拉山、大拉寺、蔡公里坝等地，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到达甘肃哈达铺。二日至五日二军团五师、六师及三十二军也陆续到达。哈达铺是回族同胞聚居的地区，这里人家较多，有几条街道，也有些店铺。我们的干部、战士来到这里象进了天堂，吃了几顿饱饭，换洗缝补好破烂的军装，理去满头乱发和胡须，有的还找到水擦洗了身子。因为长时间无法洗澡，身上长满了疥疮，我的警卫员在城边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石灰坑，里面还有些浑浊的石灰水，我们就用这些石灰水擦洗身子，还真把疥疮给治好了。经过几天休息后，大家都精神振奋起来了。

二方面军“总指”召开干部大会，讨论研究执行中央战略方针：东进甘陕边，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争取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合。休会后，我们三、五成群，激动地在一起议论：在金沙江以南，蒋介石动用他所能动用的兵力，天上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大军围追堵截，想把我们当作石达开，在金沙江消灭掉，但他的部下全是一群蠢货、饭桶，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我们胜利了，终于胜利了！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象红军这样意志坚强。事实证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些从万水千山走过来的人，

如今已是两鬓霜雪，暮如残阳。回首往事，我依然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饥饿、困乏、伤病、牺牲……在以后的战斗岁月中又伴随了我们很久，但我终生无悔，我始终为我今生能参加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红军大学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方面军全军到达甘肃哈达铺，在哈达铺进行短时间的整顿，并讨论执行军委新的战略任务，即乘陕甘两省敌人分散的弱点，夺取文县、武都、成县、康县等城市，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

还在草地途中我就请示并经贺、任、关首长批准出草地后，让我到四方面军“红大”学习。在紧张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我虽然对党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断提高，也逐步积累到一些部队政治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在政治理论、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方面急需系统地学习、总结和提高。在哈达铺休息几天后，我和萧克、谭家述同志一起，从哈达铺经两天行军到达岷县附近四方面军“红大”。我去“红大”后，四师政委是李井泉。

四方面军“红大”是训练中级干部的，学校要我当政治教员。还有一方面军的同志在学校当干部和教员，如张宗逊、曹理怀是干部，黄志勇、陈志芳、庄田是教员，我们在一起说话都比较随便和投机。

萧克同志原拟接替刘伯承同志任校长的，但没有任校长而到三十一军当军长去了。

四方面军总部和没有过黄河的部队同一方面军会师，到甘肃洪德后（红大随总部行动），我直接去找朱总司令。见到朱老总，我兴奋地连话也说不出。朱总对我十分热情，待我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后，我把来意和自己的情况向朱总作了介绍，朱老总笑呵呵地说：“中国革命路程很长，还要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哩。你们年轻人是革命的栋梁，要努力学习，用革命思想武装自己头脑。恒汉同志，咱们穷山沟有马列主义……”说完，他亲自给我写去中央红大学习的介绍信，我拿到介绍信后，向朱总敬礼、握手告别，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我学习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策马赶回学校，把情况告诉我的同事和学校首长，同时办理党的介绍信，并打问这里到保安的路线（这里已是陕甘苏区，群

众条件比较好)。第二天我就向校首长告别，同我带来的警卫员、马夫和一匹骡子开始上路了。

我们三个人走了三天到达保安（现改志丹）中央和中央红大所在地。我把朱总的介绍信交学校后，教育长罗瑞卿同志把我分到一科一组，杨成武同志是组长。学校校长是林彪。

在保安我听毛主席上一堂课，讲“战略学”，他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总结性地讲中央红军几次反“围剿”和红军为什么“长征”等。

毛主席用生动的例子说：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正确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外一方面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动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我们小组听毛主席讲这一堂课后，讨论很热烈，都说长征是王明路线造成的。我也发言说，红七军那样快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离开右江，沿途又打不少恶仗，有的战斗一打就是几天几夜，使部队损失惨重，这都是执行立三路线造成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把延安让出来，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都搬到延安。外面有抗日爱国之心的男女知识青年，经党在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一批一批地来到延安，中央为了适应新的情况，“红大”改为“抗大”。师以上干部都编为一队，许世友是我的同组同学，他经常在早操时练功夫，我戏称他为“师傅”。

在“红大”学习期间，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桌子、板凳，石头就是板凳，自己的膝盖就是桌子，但却学到了许多东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林彪等中

央领导同志都经常亲临学校为我们作讲演。指导中国革命的一批重要文献，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等，也都是在“红大”期间系统地学习讨论过的。可以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信仰、执着探索和毕生崇敬之情，是在“红大”时期逐渐形成并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得以根深蒂固的。

除了学习外，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打球、下棋、文娱联欢。邓颖超大姐还给我们上“生理卫生”课，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土包子逐渐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红大”的生活真正体现出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当时陕北的很多女青年呀，把我们经过长征的人看成最可爱的人，都以各种方式向我们求爱，我们也以各种方式回绝。因为我们的心在前方战场上，我们盼着回前方打仗，你结了婚就等于进了坟墓，有个家拉扯着，一切想法都会变成泡影，大家决心向前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我们原来红军的干部，除留校当干部的外，都毕业上前线去了。毕业的人都发了毕业证书，毕业证书背面是毛主席提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八月初，西安办事处有一辆大卡车正巧从延安回西安，我搭乘这一辆车到耀县下车，等了两天我的马夫骡子才赶到耀县。第二天我到庄里镇报到，这时红二方面军已与陕北红军一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主任关向应。又要和老首长、老战友一同并肩战斗了，我心里不由一阵激动。乘还没有分配工作，我回原四师看望我的老战友、同事卢冬生师长。

老战友见面，无话不谈。冬生师长向我叙述了部队反军阀主义的事，他说名义上批判他，实际上是反贺老总的。我说，贺老总有什么军阀主义？他那样的平易近人，特别是同六军团会师前，夏曦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抓、杀那样多的人，因为夏是中央派来的，贺老总党性很强，还是尊重他，这说明贺老总是遵守党纪的模范！

冬生同志含着热泪说，他要离开四师了，要到延安去学习。他舍不得四师，向往着前线生活……到延安后不久，他又被送去苏联学习，日本投降后回国，在

哈尔滨被人暗杀了。一军抗美援朝回到东北，罗坤山同志给我送来他的墓地的照片，我看后十分悲痛。在这里深切悼念我的战友卢冬生同志，愿他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第五章：在抗日前线

接受改编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爆发了。

八月，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结束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了八路军各师、各旅的序列和指挥员。

由于国民党当局限制八路军的力量，我们的编制被压得很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零师，师长是贺老总。原红二军团编为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原四师编为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六师与陕北红二十八军合编为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原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辖七一七团、七一八团。此外多出人员，大部编入一二零师教导团。我由“抗大”毕业回到一二零师，分配到教导团工作，开始当主任，后当政委。团长是彭绍辉。

编队工作完成后，随之是更换军装。打了多年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又戴起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帽，思想上一时还真别扭，感情上实难接受。当然，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自己要戴，还要作部队的思想工作。

九月二日，一二零师全体将士在庄里镇举行庄严的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同志出席了大会。大会动员过后，朱老总和贺龙师长都分别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说，国民党的帽子过去也戴过，今天国难当头，为了一致抗日，再戴戴也没有什么。别看帽徽是白的，我们八路军的心永远是红的！最后，我们全体将士在两位老总的带领下，庄严宣誓：“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

会后，我把红五星帽徽珍藏起来。

誓师大会第二天，一二零师雄纠纠气昂昂地在陕西芝川镇跨过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

我奉贺老总和关向应同志命令，带教导团一部分人，去五寨做群众工作。我

们在侯马坐阎锡山的小火车，到太原休息一天，第二天继续坐火车北上，到宁武下车，然后徒步行军到五寨。

当时的晋西北，是在阎锡山的手里，我们虽然通过阎锡山组织了一些抗日团体，如“牺盟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和一些抗日武装力量，但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独立的抗日政权，县以上政权基本是阎锡山委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五寨只能利用阎老西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的口号，发动当地群众，宣传我党的“减租减息”政策，组织人力物力，筹粮、筹款，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

那个时候，由于国共合作，我们的干部和阎锡山的人都在一起工作，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是处处宣传和贯彻我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而阎锡山却明中暗里跟我们作对。有一次，在兴县开一个大会，部队和群众都参加，有一个国民党的县长在台上讲话，对我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不满。他讲完后，我立刻上台，就他的发言针锋相对、据理争辩，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即批判了他的错误言论，又宣传了群众，捍卫了党在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这一基本政策。

三七年十一月，我调回兴县，升任教导团政委。分散做群众工作的各队也逐步收拢进行训练。在兴县训练不到半年，三八年四、五月又搬到岚县明村。教导团培养的对象是营、连干部。

冀中平原

一九三八年秋，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到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回到晋西北，在岚县师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一二零师将肩负“攻固冀中、帮助三纵队、壮大自己”的使命，挺进冀中战场，与冀中抗日军民一道，粉碎日军的围攻扫荡，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三八年冬贺关首长亲率师部和三五八旅及教导团通过同蒲路、平汉路敌人封锁线，挺进冀中。其他各路纵队除留一部在晋西北坚持斗争外，也由各自战地开赴冀中，同吕正操的三纵队会师。三纵队是我党领导的东北军一个团，国民党军队南撤时，他们没有随国民党南撤，而是到冀中同各抗日武装力量组织成三纵队，建立起冀中根据地。除了三纵队外，还有不少地方武装，既归又不归三纵队领导和指挥。一二零师到冀中的任务主要是帮助三纵队巩固和纯洁其队伍，整顿各色

各样抗日武装力量，壮大一二零师自身。

从晋西北到冀中，要进行数百公里的长途行军，中间还要通过两条铁路线和敌伪的许多据点。时值岁末年尾，天寒地冻，大雪纷扬，我们顶风冒雪，沿着连绵的山峦一路东进，于一九三九年元旦前赶到晋察冀边区。

冀中是个美丽富饶的好地方，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兵源众多。开始我们不习惯平原作战，在这样一马平川、望不到边的地方，一无山包二无沟谷，既无法伏击又无法隐蔽，在这里打仗，开始心里还真没底。但村子密，一村连着一村，群众条件很好，村同村之间都挖了沟互相联系。我们对日本的“扫荡”作战，完全依靠村落，以后也习惯了。

冀中的群众基础好，老百姓抗日觉悟高，给我们一二零师每个干部战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论是打仗还是寄养伤病员，老百姓从来没二话，他们直朴、热情、勇敢，由于饱受日寇侵略之苦，抗日积极性非常高。可以说，我们一二零师在冀中战场使日寇频频惨败，离不开冀中老百姓的支持、配合和无私帮助。

在冀中打了几个漂亮仗后，一二零师名声传开了，“亚五”、“亚六”（七一五团、七一六团代号）也声威大振，百姓闻之欢欣，敌伪闻之丧胆。老乡们都说“这些南方人真能打仗呢！”不久，一二零师又对冀中原有的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了合编、整理。

这些部队，即有我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和民众自发组织的自卫队，也有国民党部队下来的散兵游勇以及地主乡绅的民团。其中不少队伍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纪律松弛、战斗力弱，当地老百姓对这些队伍很有意见。

三九年春季，贺、关首长应三纵吕正操的提议，将高士一的部队编为一二零师独一旅，魏大光的部队编为独二旅，以后编到部队，取消了这个番号。津南自卫军编入三五九旅。

我们教导团，本来是到抗日前线阵地办学，为第一线输送干部，但因为在冀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行军打仗，除协助七一五、七一六团作战外，还担负师指挥机关的安全保卫任务。期间一二零师在冀中几次大的反日寇“围攻”、“扫荡”战斗，我们都参加了，因此没有机会训练。一九三九年三月，奉师首长命令，教导团开回冀西东岔头一带训练。不久，彭绍辉同志调回晋西北任八旅旅长，叫“彭八旅”，喻楚杰接替彭绍辉任团长。为什么已有三五八旅（简称八旅）还有另外一个八旅

呢？因为国民党害怕我们扩大部队，所以不得不用重复的番号。

又返西北

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反共，磨擦斗争不时发生，阎锡山进攻我八路军在晋西北建立的根据地，一二零师参加晋察冀反“扫荡”后就回晋西北了，打退了阎锡山的进攻。教导团没有随师部回晋西北，仍在东西岔头进行训练。

我是七大代表，师首长要我同晋察冀的代表一同回晋西北，以便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可是中央在七大召开之前，先进行整风，肃清王明路线的影响。所以，七大何时召开没有确定时间。这样，我就被分配到师里组织的“高干读书班”任政委，高士一任班主任。高士一原是河北任丘县一个有名的大地主，“七、七”事变后拉起队伍抗日，这次在冀中整编，他的队伍编进了一二零师。

“高干读书班”是师里组织的团以上干部短期轮训班，主要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由延安马列学院的教员讲授。我们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即无教室又无课桌，连个固定的地方都没有，常常是随便找个地方，不管教员学员，大家席地而坐，但同志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讨论发言都非常热烈。

一九四零年，晋西北非常困难，为了解决读书班的吃饭问题，我经常和学员一起到当地老乡家买黑豆，别的也没有，只有黑豆，因此天天吃黑豆。后来连黑豆也吃不到了，又天天吃山药蛋（土豆），煮上一盆，几个人一围，又当饭又当菜。读书班学习两个月也就结束了，我又调到军区（师）政治部当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春，我奉命调独立一旅代理政委，旅长是王尚荣。期间参加了晋西北反日寇“扫荡”的每一次战斗。

四一年下半年，独立一旅调陕甘宁边区绥德，接替三五九防线，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荒种地。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仅停发了根据国共协议应拨的微薄军饷，还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扬言要困死、饿死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经济极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抗战，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亲自带领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不仅是三五九旅开荒种地，边区各部队和延安所有机关都一样，开荒生产、养猪种菜、捻毛线、织毛衣。我也学会了捻毛线，一有空就捻，手艺还不错呢。我们还包产到人，每个人必须完成定额。和吴杰同志结婚后，我们俩人捻的毛线

除超额交够定额外，吴杰还将余下的线给我和我的战友织了毛背心和毛袜子，结果国民党没卡死我们，我们的生活反而一天一天好起来。

吴杰同志

驻防绥德后，部队相对稳定下来，除边防外，我们日常主要工作是训练、学习、整风、生产。这时，我们这些长征过来的人，很多都三十多岁了，忙中偷闲，不少人解决了个人生活问题。

一九四三年，我三十二岁，在革命队伍里已经南征北战了十四个年头。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这里，有我敬重的首长，有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也有共同出生入死的广大部队的同志们。我们俨然象个大家庭，虽然都是离乡背井，远离亲人，但在这革命的集体里却倍感家庭的温馨和手足的情谊。

那些年生活虽然清苦，但也多姿多彩，我们在闲暇的时间，经常打打篮球，跳跳舞，有时也组织晚会，由地方的群众文艺剧社向部队作慰问演出，有些水平还满高呢。环境稳定了，我的老首长和同志们都不断地催促我尽快成个家。

初春，边区一片融融暖意。王尚荣、高士一、袁任远、彭绍辉……等一帮子约上我一同去看望冀中“老乡”。

这是一批冀中的地方干部，千里迢迢刚从敌后过来，他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风尘仆仆赶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抗战初期我们一二零师到冀中打过仗，对冀中的干部印象很好。由于绥德是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又是我们一二零师驻地，来往干部大都先经过这里，因此，大家便吆喊着说去看看“老乡”。

从四二年开始，党中央便决定利用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机，对全党进行一次集中整风，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专题作了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四月，延安整风在全党普遍展开。

四三年初，由于各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我党在敌后的干部暂时多了出来，党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这样在四三年的春天，数千名干部便从各个根据地长途跋涉穿越封锁线，汇集到陕甘宁边区。

我们一行骑着马，一路说说笑笑，来到冀中同志们临时休息的地方，那是几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土窑洞。下马后，我们鱼贯而入。

进了窑洞，只觉眼前一亮，十几个年青的女同志，精干利落，浑身透着青春的朝气。带队的同志是我们的老相识刘亚球，他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她们大多是城市里的学生，“七、七”事变后在我党的指引下，跑到冀中去参加抗日工作，经过在根据地几年对敌斗争的锻炼，已经成长为我党县级以上的基层干部。

我这个人平时就不多说，在女同志面前更没什么话。听着王尚荣、高士一他们大声地谈笑着“亚五”、“亚六”的趣事，我只下意识地往人堆里扫了一眼：只见其中一位女同志，齐耳短发、干净利索、中等身材、白净秀气，说是抗日干部，倒更象是一位书卷气十足的大家闺秀。她不主动说话，只是问到才答一句，大多数时间只是靠在炕沿看自己的布鞋。

窑洞不大，人多了便显得有点挤。我坐在人群后面一角，没参与大家的闲聊，因此我肯定她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

后来知道，她叫吴杰，是保定女师的学生。她的祖上是蒙古族，曾经当过清王朝的大官，后来家道败落了。“七、七”事变后，她在姐姐的影响下到冀中敌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来延安前是武强县妇救会主任兼妇委书记。

听说她们休息几天后就动身去延安进党校，回去的路上，王尚荣等人开我的玩笑，问有没有看上一个合适的对象？如果看上了，他们负责给她作工作。已经成家的同志拿我们几个单身逗着乐子，我也半真半假，打着哈哈：“可以嘛。”

结果大家认了真，还搞到贺老总那里去，贺老总亲自出马找吴杰同志谈，大家轮番作工作，结果，吴杰同志没有去党校而是留在了一二零师独一旅报社工作。对于没有进中央党校学习，吴杰遗憾了多少年，后来贺老总还开她的玩笑说：“我给你找了个老师，比上党校还好呢！”

五月二十二日，我和吴杰同志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正好师里开干部会，大家起哄，贺老总也说：“赶快办，速战速决！”结果贺老总、徐向前、习仲勋、王尚荣……等都自告奋勇当起了我们的证婚人，李贞同志和黄克同志还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盘瓜子、一碗大枣，我们就算结了婚。那个时候年轻，大家在一块儿都好开玩笑，晚上王尚荣、彭绍辉、高士一、张宗逊他们搞恶作剧，冒着漂泼大雨扒在窗口听房，结果第二天一个个都又打喷嚏又流鼻涕。

从那个时候至今，吴杰同志和我同甘苦、共患难，已将近半个世纪了。我对吴杰同志始终充满感激之情，感谢她几十年来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和生活上无微不

至地照顾。

一九四三年秋，我又调到晋绥陕甘宁五省联防军下属的三八五旅任旅政委。旅长是王维舟同志。

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参加“七大”后，没有再回三八五旅。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贺老总上前线，我奉贺总的命令随他同行，组织晋绥野战军。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我任副主任。

第六章：保卫陕甘宁

内战风云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刚刚投降，蒋介石便忙于“摘桃子”，打着“收复失地”和“受降”的旗号，到处与我军争夺战略要地、抢占地盘、进攻我解放区，内战的阴云又压向中国人民头上。

中国究竟何去何从？两种命运、两个前途面临选择。

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方针。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指出，在新的和平建设的历史时期中，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等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乘专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谈判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反复学习中央精神，搞清楚：谈判也是一种斗争，使每个干部都懂得和平谈判的必要性，同时，也不对和谈抱有过高的希望，产生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对部队，我们一面抓形势教育，保持高度警惕；一面抓训练，随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犯。

十月十日，蒋介石与毛主席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不久，蒋介石便故伎重演，撕毁协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把大批兵力从空、海运往东北、华东、华北，伺机对我各根据地大举进攻。同时，国民党军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我方的进犯。

由于傅作义的部队在北线绥东一带骚扰进犯我边区，刚刚由三五八旅、独立第一、二、三旅组成的晋绥野战军，奉命开赴绥远（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我们在卓子山打第一仗，激战一夜，消灭何文鼎一个师的大部，其余溃散。战斗结束后，晋察冀野战军也来了，我们在卓子山稍休息，晋察冀野战军继续前进，包围旧绥城（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他们围攻城东，我们围攻城西。围攻一个多

月，没有结果。晋绥野战军主力和晋察冀一个旅又二次去打包头，包头是傅作义的后方，他们一万多人全部武装起来，加上一些未放下武器的日本人。我们除打掉其外围的一些据点，俘虏一些朝鲜人外，包头也未攻下，教训就是逐渐增兵。第一次独一旅已打进去，并进行巷战，但敌众我寡，没有解决问题，只有撤出。这次战役我一旅二团付团长彭济民同志阵亡。

一九四五年冬，天寒得出奇，部队冬服供应困难，迟迟未发。晋绥野战军除独一旅在卓子山设防外，八旅，二旅、三旅、野战军总部都撤到凉城、左云、右玉、丰镇地区整训。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东北，准备在全国发动全面内战。六月，傅作义出动军队攻占我卓子山一旅防地，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晋绥野战军在绥东地区迎战傅军。我军拟在集宁消灭其一零一师，但由于友军没有很好配合，未能得胜。集宁撤退后，傅军继而进攻张家口，胡宗南也开始向陕甘宁边区进攻。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破裂。

调赴延安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七月，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八月，国民党出动八架飞机轰炸延安。

九月，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手令进攻张家口。张家口是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进攻张家口表明国民党决心实行最后破裂。我野战军奉命进行张家口保卫战，由于傅作义军队侵占了张家口，我军于十月初奉命撤出，由雁门关向太原方向挺进，于十一月一日收复了被阎锡山重占的崞县县城，二日围歼了原平之敌一个团，五日又攻占平社，全歼守敌，活捉了敌人一个团长。

由于蒋介石妄图从军事上摧毁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命胡宗南积极准备进攻延安。胡宗南集团是蒋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战略预备队。他们经过长期训练，武器装备精良，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调集了三十四旅，兵力大约二十五万左右，而当时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加上我们野战部队也才只有六个旅，两万余人。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上旬，为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晋绥野战军三五

八旅和独立一旅及原晋北野司机关合编，组成第一纵队（军），奉命开赴延安，保卫党中央。纵队司令张宗逊、贺炳炎（后），政委廖汉生，参谋长王绍南，政治部主任冼恒汉。陕北部队编为四纵队，新四旅、教导旅编为六纵队。不久，三纵队、二纵队（三五九旅）也由晋西北过来了，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战争开始，西北野战兵团就靠这六支纵队（军），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中同胡匪宗南十倍于我的兵力周旋。

十一月八日，一纵由山西崞县向西行军。早晨，我们从崞县崖底出发，一口气向西走了六十里才休息。由于究竟去哪里还暂时保密，我们政治部的一帮机关人员故意在我面前瞎猜测，想套出“谜底”，我也不加理睬，由他们去随意想象。

穿越了晋西北的云中山，跨过了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一路经静乐县、岚县、白文镇黑茶山、临县，我们以急行军日夜兼程。

脚下的这一片土地曾经被日寇侵占过，四零年以后，老百姓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计其数的无辜群众惨遭日本鬼子屠杀，被烧毁的房屋成村连片，惨不忍睹。去年，我军解放了这里，建立了民主政权，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建设家园，如今这一带已呈现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我们行军路过这里，看到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派饭时不管分到哪一家，都是热情款待，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给部队吃，真是军民鱼水情谊深。十一月十五日纵队到达黄河边上的三交镇磧口。

十六日早晨，贺龙司令员特地从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赶来亲自给一纵干部作动员，宣布任务。

会议在磧口村头大庙里召开，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整座庙院。贺龙司令员大声宣布：“今天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向大家讲清一件事情，把你们从晋北前线调过来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过黄河，去延安……”人群激动起来，突然暴发起一阵掌声。贺司令员接着说：“要去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又是一阵热烈掌声。

贺老总要求我们保持革命传统，发扬我们这支光荣部队的优良作风，努力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

由于这次行动保密，除了我们纵队干部外，基层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现在解开了“谜”，部队情绪激昂，恨不得飞过黄河，一步跨到延安。

第二天，我一纵由磧口乘船渡河。部队渡河过程中，蒋介石的飞机一直在头

顶盘旋，向下扔炸弹、扫射，子弹落在河里，溅起无数浪花和水柱。战士们义愤填膺，把机枪架在船上，一齐向天上打。河面上大小船只、木排在惊涛骇浪中接踵而进，傍晚时分，我纵渡河完毕。

踏上陕北的土地，有一种归家的亲切感。吴堡和绥德县境，群众起居劳动，赶集走街，生活井然有序。十一月二十日开始，部队全部走大路，行军很轻松。一路经田庄、石嘴驿、清涧、延川和甘谷驿，五天功夫就到了延安四十里铺。一路上，边区老百姓热情欢迎，都说，部队来了，延安就安全了。不知是谁在路边的土崖上写着：“长江里的轮船黄河里的水，苏联人的飞机八路军的腿。”是在形容我们走得快。到达延安东边的拐崾，我们休整待命。

十二月五日，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在延安东关飞机场接见由晋绥西渡黄河的我一纵全体指战员，号召大家英勇作战，保卫边区。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要来检阅一纵的消息，我们前一天就接到了通知，大家喜出望外，纵队干部立即开会研究布置，决定把这次检阅作为对部队最好的战斗动员。

下午五点许，一纵万名指战员集结延安机场，全体列队等待毛主席的来临。正是严冬季节，寒风刺骨。毛主席披一件灰布棉大衣，脚穿一双粗布鞋，脖子上围着一一条旧围巾，在朱总司令、林伯渠、刘少奇、陆定一、杨尚昆以及李鼎铭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健步走向队伍。

检阅完毕，纵队政委廖汉生同志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不远千里从晋绥赶来，保卫延安，保卫边区，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致意！”毛主席还提出了三年打败蒋介石。他说：“同志们！三年哪，三年！三年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

动员大会之后，部队情绪高涨。我纵队移驻延安城附近七里铺、柳树店。由于其他战场的压力，迫使胡宗南调兵回援、暂停对延安的进攻计划。延安形势缓和，我一纵利用这段时期整训、练兵。

在延安驻防两个月，我纵政治部抓紧时间落实部队的思想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我们成立了纵队宣传队，加强了宣传部的领导，出版了纵队自己的刊物《学习通讯》、《新闻摘要》和《前线生活》，这些都是油印的小册子，对教育部队起过不小的作用。

为配合形势教育，我纵宣传队排演了一批短剧，如《拜年》、《民兵》、《兄妹开荒》、《夫妇识字》等，很受部队欢迎。陕北的群众地方语言生动、形象、优美、新鲜，被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揉进作品，既有教育意义又相当生活化，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有些词到现在我还记得。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的那个冬天，寒风凛冽，刺骨钻心，皑皑白雪铺满山岭、田野，可正在训练的部队却生龙活虎、热气腾腾，有不少的战士练的满头大汗，把棉衣都脱掉了。整个部队的情绪非常饱满，大家随时准备歼灭胡匪的进犯。

转战陕北

一九四七年二月底，春节过后不久，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亲自布署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当天，胡部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部向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进犯。

三月十一日，彭老总在富县茶坊召集第一纵队旅以上干部会，传达中央军委作战指示和研究阻击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

三月十三日，胡宗南动用部队十五万，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地区进发；马鸿逵、马步芳向西面陇东、盐池、定边、安边等地挺进；而榆林邓宝珊部，则向西面绥德、米脂攻打。

审时度势，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与敌周旋，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三月十八日，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三月十九日早晨，我纵按命令规定时间全部撤离延安。中午，敌人占领延安。

我军放弃延安，敌人喜气洋洋，狂妄自大，忘乎所以，一面大吹大擂，一面急于找寻我党中央机关和我军主力。我纵按预定部署，主力向安塞转移，一部分沿公路向青化砭诱敌尾追，我主力则继续向安塞北，然后迅速向东至青化砭伏击。

二十四日凌晨，我纵进入伏击阵地，当时山上积雪还未消，战士们在雪地里整整爬了一天。日落渐黑，敌人还未来，我纵下山宿营。敌人未进伏击圈，有的同志就有些着急，想，不会来了吧？但彭老总根据分析，坚信敌人一定会来。结果，二十五日上午，敌三十一旅沿咸榆公路进至青化砭，大摇大摆落入我“口袋”。

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我军顿时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冲杀，敌军措手不及，象一群没头的苍蝇在狭窄的沟底乱作一团，眼睁睁束手待毙。战斗只一个多小时左右，敌军全部被歼，无一漏网。敌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等三千余人全部被俘，缴获近三十万发子弹，还有部分火炮和重机枪。这次战斗虽然只消灭一个旅部和一个团，但旗开得胜，意义十分重大，给边区军民以莫大的鼓舞。

四月十三日，西北野战兵团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一纵在蟠龙西北一带牵引敌人九个旅，以便二纵和教导旅、新四旅等部队在羊马河伏击从瓦窑堡南下的敌一三五旅。

四月十四日，我纵佯装主力，牢牢拖住敌人九个旅，使其紧追不舍，而我却打打退退、退退打打，死死牵制住敌人使其不得脱身。就在当天，敌整编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南进，在羊马河被二纵、教导旅、新四旅全歼。俘敌旅长麦宗禹和两个团长以下四千余人，残敌向南逃窜。我纵完成任务，迅速甩开敌主力进入群山。

四月十五日，毛主席提出“蘑菇”战术，指示要“磨”得他十分疲劳，“磨”、“打”结合，拖垮胡宗南。

由于和胡宗南“蘑菇”，部队天天在行军走路。在有的村子，我们看到的情况就和几年前在晋西北看到被日本人扫荡过的惨景一样：窑洞烧成了黑窟窿，死狗鸡毛、羊皮牛腿满地都是，破盆烂碗、麦秆谷草乱七八糟，庄稼地里长出了半人高的蒿草。那些逃不动的老年人，颤兢兢躲在草丛中，见了我们，拦住就哭，叫我们一定给报仇。

四月底，陕北渐暖，中午的太阳烤在身上象贴了块热膏药。部队无足够夏装，许多战士还裹着一身老棉袄在烈日下行军。我们动员机关和直属部队把新发下的单衣交回，送到单衣不够的作战部队，大家毫无怨言。

五月一日，突然下起了大雨，我纵正在行军路上，人滑马跌，不时有人摔倒。但战士们却十分开心，他们说，贺龙的部队，有雨就打胜仗。果然，下了一天雨，敌人的飞机飞不起来，天上少了讨厌的嗡嗡声。

五月二日至四日，我纵奉命参加蟠龙攻坚战。胡宗南北进绥德，蟠龙是其聚集物资的中间站，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镇内弹药、物资、军衣、白面堆积如山，我军决心攻取蟠龙。二日开始，我军各部队先扫除一些外围据点，逐渐逼近主阵地。四日黄昏各纵队由四周居高临下向蟠龙之敌猛攻，镇内守敌人慌马乱、

东奔西窜，至二十四时守敌全部被歼，攻占蟠龙镇。整编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建、参谋长柳屈春等以下六千余人无一漏网，缴获面粉一万两千袋、军装四万套、子弹上百万发、骡马千余匹，以及药品、望远镜等大量物资补充我军急需，更重要的是我军取得了攻坚战的经验。

从三月十九日我军撤离延安到五月四日蟠龙大捷，只一个半月时间，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余人，俘虏三个旅长，敌人那种狂妄自大的气焰被打下去了。五月十四日下午，陕甘宁边区五万军民于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出席并讲话。会上，周恩来副主席首次宣告毛主席留在陕北亲自指挥我军作战，这个消息，使会场一片欢腾，大家兴奋极了，不断欢呼：“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祝捷大会后，周副主席和彭总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总结三战三捷的胜利，研究下一阶段工作。我们一纵也利用在安塞休整对部队进行了总结、表彰及检查群众纪律和烈士追悼活动。

正值春耕，我们纵政下发了《关于协助群众春耕生产的指示》，部队、机关和直属队纷纷行动，帮助老百姓送粪、翻地、下种，宣传队的女同志们则拾柴、推磨，干得很积极。

由于“青马”、“宁马”进犯我陇东、三边地区，五月二十一日，一纵、二纵、教导旅、新四旅西进陇东。我因参加晋绥军区建军会议赶赴山西兴县，见到分别数月的贺老总，贺老总非常关心一纵的工作，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汇报并亲自带我去看了看几个月来解放区的建设，看到短短几个月解放区又有大的成就，我真为晋绥人民的繁荣昌盛高兴。六月初，我回到部队。

这些日子雨水不断，有的地方引起山洪暴发，给我们行军造成极大困难。在山上行进，风雨更大，虽然披着雨布骑在马上，但半截身子都湿透了。有时夜里行军遇上下雨，天漆黑，黄土粘泥的路更难走，脚都拔不起来，战士们跌跌撞撞地行进，滚得一身烂泥。说也奇怪，白天雨过天晴，太阳又格外灼人，路硬泥干，这就是黄土高原沙土结构的特点。

我军连克蒋台（一纵）、合水（二纵）、悦乐、环县（一、六纵），而后继续北进，收复盐池、定边、安边、靖边等地，之后，我一纵进驻宁条梁休整。

进入七月，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央前

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我军战略进攻开始阶段全国各解放区配合作战问题。会议决定组织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并决定由西北战场部队出击榆林，诱敌北上，寻机歼敌有生力量。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野战军。

八月一日，西北野战军开始集结北上，不分昼夜向长城边上的榆林前线进发。艰难的沙漠行军，常常是走一步，退半步，鞋里灌满了沙子，消耗了体力却走不出速度来。太阳猛烈地喷火，沙漠被烤得滚烫。没有一滴水，战士们渴得嘴唇干裂，很多人流鼻血。沙漠的天气，说变就变，一会的功夫又刮起了狂风，黄烟似的沙暴裹住了队伍，砂石没头没脑打得人脸生疼，眼都睁不开。

八月六日到十二日我军攻打榆林。榆林邓宝珊凭借坚固城墙和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加之榆林城外一片沙漠开阔地，我军武器装备简陋，很难接近城墙。我军是夜间攻击，白天留少数部队坚守已经夺取的城郊阵地，监视敌人。连续攻了几晚后，没有奏效，敌人还抓了好多老百姓在城墙上往下扔手榴弹，并不断打出照明弹，搞得城下通亮如白昼。

由于敌大批援兵逼近，我军撤出榆林进至佳县、米脂、榆林三角地带隐蔽待机，和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中央留在陕北的精干机关挤在一起。无粮，天天吃南瓜和南瓜叶子，有时吃黑豆、粗粮、野菜熬成的“钱钱饭”，部队人多，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吃饱。敌以为我过黄河，胡宗南派整编三十六师向佳县追击我军，不料八月十八日在米脂东北沙家店被我一纵、二纵和新四旅、教导旅伏击，除敌师长锺松等少数人逃跑外，歼敌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全部及一六五旅大部共六千余人，俘虏少将旅长刘子奇。

沙家店大捷是西北战场的伟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我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阶段。此后，我西北野战军沿咸榆公路两侧一路追击，而敌人却象决了堤的水，顺咸榆公路向南溃流。

进入九月，我军乘敌人累吃败仗、士气低落之机，野司率一纵、三纵和教导旅、新四旅在延安东北进行内线作战，发动延清战役，肃清驻守延长、延川、清涧之敌，将敌四个旅击溃在延川一带，迫使敌军龟缩在延安地区无法行动。是役，敌师长廖昂、旅长张新等全部被歼。

延清战役后，野司决定第二次攻打榆林，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六日，我

军围攻榆林半月多未拿下。当时十二月冬临，陕北气候寒冷，北风呼叫，夹带着沙石往怀里钻，穿着棉衣都不顶事。部队已经连续作战半年多，疲惫加上人员伤亡，急需休整恢复，且“宁马”又来增援，这样，我军除一部监视榆林守敌外，主力撤出，迎击“宁马”增援部队。在给“宁马”以很大杀伤后，撤回绥德以南进行冬季整训。一纵队撤至青涧至瓦窑堡之间折家坪进行冬季整训。

家属支队

就在我们一纵驰骋陕甘宁，与志大才疏的胡宗南纵横作战的时候，我们的后面大约一两天路程的地方，跟着一支特殊的队伍，这就是我们第一纵队的妇女学校，即家属支队。

当时，我们纵队团以上干部基本都是老红军，年龄都不小了，大部分都已结婚成家，爱人有的在纵队工作，还有不少是随军家属。部队转战陕甘宁与胡宗南周旋，需精干、轻装，女同志和娃娃随大部队一起行动既累赘又不安全。但是又无法将她们留在某一固定地区，因为胡匪大举进攻解放区，到处都是敌人，连当地老百姓都坚壁清野，撤离转移了。

纵队领导研究后，决定组织一纵留守处妇女学校（实际是个家属支队），将团以上所有家属（包括在纵队工作的女同志）及小孩三百多人集中起来，组成一支特殊的队伍，与大部队保持一、两天的距离。部队前进，她们前进；部队后退，她们后退；部队休整，她们停下休息。除了行军外，她们还要作鞋、作衣服，支援前线……

为什么叫妇女学校呢？因为当时女同志都不愿被称作家属，你叫个家属队，谁都不愿意去。开始这支队伍的带队是个团长，是贺老总早先的马夫，后来他坚决不干了，说什么也要到前方去打胡宗南，“坚决不当婆娘娃娃头！”

谁来干呢？后来贺炳炎司令员和廖汉生政委找吴杰还有其他几个同志谈，作她们的工作，让她们带队。当时吴杰在纵队组织部工作，贺司令和廖政委给她们下达命令：第一，不能有一个娃娃和大人掉队、被俘、死伤，要保证前方安心打仗，不能有后顾之忧；第二，安排好三百多人的行军、吃饭、住宿、医疗、学习和支前工作。只能干好不能干坏，不准有半点差错。

开始吴杰有顾虑，怕搞不好，不想接这个任务，我给她做工作，鼓励她搞，

并且给她理出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二、三，后来吴杰和其他几个女同志一起，把家属队的工作搞了起来。

家属队的事情很麻烦，要行军与敌人周旋，还要安排生活：号房子、搞饭、娃娃生病、大人闹意见，有的家属丈夫在前方牺牲了，要作她们的安抚工作，还有不少的女同志正赶上生育期，有时敌人很近了，这边还正在分娩接生……但家属牵着前方的心，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一点问题都不能出。

往往一天的紧张行军过后，一住下来便赶紧拾柴点火、烧水作饭。大人们可以坚持，娃娃们却早已饥肠碌碌了。村子里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天黑以后才三三两两地回来看看。由于胡匪的骚扰，老百姓整日在恐怖中过日子，他们得不到确切的消息，到处都是谣传。一会儿说敌人到了这里，一会儿说敌人到了那里，看到部队的家属娃娃们，心里才安定下来。

早晨出发前，要检查群众纪律，用过的东西要及时归还，住过的房屋要打扫干净，暂借的牛车、骡马要打条子，并补发边币。老百姓都很满意，纷纷说：“还是咱自己的部队，连婆姨娃娃们吃顿饭，烧些柴火还又打条子又给钱，要是胡儿们，又吃又抢还要烧房子……”

胡宗南找不到我军主力，象个疯子一样到处转。有时敌人就在山那边过，队伍在山这边，一点响声都不能发出。听吴杰讲，我的小孩哭，被她紧紧捂在被子里，怕被敌人听到暴露目标。等敌人过去，娃娃的小脸都憋青了。很多小孩都被这样捂过。

家属队行军，娃娃都是放在筐子里，筐子驮在骡子的两边，中间还放些简单的行李。几百口子的队伍就是这样翻山、越沟、淌河，和敌人周旋。冷了，筐子上蒙床被子，下雨了，筐子上盖块油布，我的两个娃娃也是这样一边筐子里一个。有时吴杰怕小孩哭闹，拿一个小碗，里面放两块小石头，说是“鱼”，让拿在手里玩。有一次敌机轰炸惊了骡子，骡子驮着的两只装小孩的筐子翻下山去，吴杰紧追下去，两个娃娃摔的满脸是血，幸好山不高。我的儿子爬在地上，满脸满手是伤，一声不哭，手里还紧紧捏着一块石头说：“鱼！”

家属队行军，象一座迁徙的部落。丈夫们都在前方打仗，部队的胜败时刻牵动着她们的心。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后，部队奉命西进收复陇东。进入甘肃境内，家属队的女同志们也参加了伤员救护工作和俘虏宣传教育工作。临

时设置在老百姓场院的伤兵救护站，人流不息，接送不断，这些家属同志就象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地护理着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同志，为我一纵前方将士作了很多工作。

在我军新解放的地区，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老百姓不了解情况，不敢接近我们，有时连家都不让进。我们的家属们以实际行动感化他们，忍着饥饿，把孩子放在一边，为老百姓打扫院落、垫土、担水，遇上农活还帮着一块干，很快打消了老百姓的顾虑，消除了他们害怕并怀疑我军的心理。

就这样差不多有两年半的时间，从转战陕北到解放大西北，吴杰她们几位女同志，加上炊事班几个老战士，整天枪不离身，带领着这支几百人的特殊队伍，跟在我们纵队的后面，在陕甘宁晋绥方圆几千公里的山峦、沟谷、大漠里与敌人转圈子，圆满完成了纵队首长交付的任务，不但无一人死伤、掉队、被俘，还增添了一批小“一纵战士”。

我的第二个孩子就出生在行军路上。那天前方失利，天上敌机在轰炸，地上是后撤的部队，骡马受了惊，吴杰被抛下马背，孩子七个月便早产了，生在荒郊野外。小孩很弱，奶都不会吃，哭起来没声音。我听说后，让警卫员去看看，回来讲象个小猫，可能活不了。孩子八个月时，部队休整，我去看了一下，小孩又胖又大，很好玩，一点不象早产的娃娃。后来说是靠输吴杰的血和吃陕甘宁老乡的面糊糊才长大。

西北的解放战争，是在敌我力量悬殊、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军在西北战场的胜利，充分证实了毛主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的无比正确，从此我军频频获胜，连续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使敌我双方力量发生根本变化。在迎接西北解放战争的大决战时，我又想起我的大女儿离开一纵去家属队前与我的对话，她问我：“爸爸，你干什么去？”我说：“爸爸去打胡宗南。”“爸爸，等打完了胡宗南，你给我带一个回来玩好吧？”孩子天真的话使我忍俊不禁。大反攻的高潮就要来了，胡宗南就要彻底被打败了，蒋家王朝二十年的反动统治最后灭亡的日子就要到了，全国解放为时不远了，为了孩子们的明天，我们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夺取全国的胜利！

第七章：解放大西北

新式整军

一九四七年冬季，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整军运动，这是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创造。由于我们第一纵队的诉苦三查搞得比较早，也比较普遍和深入，得到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的肯定，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被毛主席誉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将这次运动肯定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同志也称赞诉苦三查是“壮大军队”的法宝，“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法。”

有关这一段的内容，我想，四十多年以前我作为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时写给野战军前委的关于运动的工作总结材料更能具体地再现当时的整军实况。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但那是我亲手撰写的“马背之作”，现在找出来读一读，自己还感亲切。以下便是摘要。

冬季整训。纵队党委召开团以上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整训以什么为主。到会同志热烈发言，多数同志认为部队“解放兵”比例相当大（占部队兵员总数的80%），觉悟也比较低，他们认为参加解放军，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之间、新老兵之间，感情融洽、精神愉快。在国民党部队，虽然吃得好、穿得好一点，但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欺辱新兵，他们恨国民党部队，但有很多糊涂认识。他们有的暴露出“打仗和在国民党那边一样，还是为官长们打的仗”。这样，大家一致认为通过诉苦，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教育对象主要是“解放兵”。

发动士兵们诉苦，并不是象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大会一开无人发言，各连都有类似情况。为了找其原因，我们暂时不开大会，而是开展谈心活动。谈心活动中，发现有的战士不愿暴露家庭的事，如有的曾经讨过饭，有的母亲给恶霸地主当过老妈子，有的还不起债，姐姐被迫给债主当丫头等。他们说，这些是“丑事”，“家丑不可外扬”。有的还说，他给地主当长工是两厢情愿的，他给我钱，我给他做工，怎么是剥削呢？他们不懂剥削，干部和党员慢慢疏导他们，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如你父亲辛苦一年，才得三十块白洋，这合理吗？一年的辛苦创造的价

值，不止三十块白洋，比三十块白洋多得多，多的部分被地主装到腰包里去了，这不是剥削吗？又如井水、河水是流动的，河边的石头是无用的东西，你把水挑上来倒在地主水缸里，把石头背上来，给地主修这修那。本来这些无用的东西，经过劳动，变成了价值。而享受了你们的劳动价值，却一分钱也不给你，这是不是剥削呢？经过这样反复疏导，他们才恍然大悟，对压迫剥削他们的地主豪绅更加仇恨，发誓一定要报仇雪耻。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并鼓励他们把这些苦诉出来，既教育自己，又教育大家我们通过谈心和疏导，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以后，诉苦运动就迅速展开了，那些所谓“丑”事都痛哭流涕地讲出来了。会场一片沉默，有的低声哭泣，有的高呼口号“要报仇雪耻！”围观的群众，也参加进来了，形成军民同诉旧社会的苦。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边区文工团来慰问我们，演出《白毛女》，当见到黄世仁奸污喜儿的场面时，有一个战士上了刺刀，要上台捅那个黄世仁，坐在这个战士旁边的同志把他拉住说，这是演戏。他说，这个戏好象演他家的事。

诉苦运动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之后，我们适时地诱导大家挖苦根。苦从何来？讨论很热烈，但都局限在同自己有冤仇的地主恶霸身上。我们也表示同情，但“苦”不是你一个人呀！全国千千万万穷人都同你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热烈讨论之后，大家脑子想得宽了，有的说，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又互相勾结，这三个东西毛主席称之为“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的总代表是蒋介石，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公敌。只有打倒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全国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当家作主，这样大仇报了，小仇也就自然报了。过去那些认为在解放军里打仗同在国民党军队里打仗一样，是为官长打仗的也觉得认识太低了。这种办法基本上是士兵教育士兵的方法。干部是疏导诱导。这个方法比灌输式的教育不知要好多少倍。

查阶级。这是与地方进行土改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在晋绥解放区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地方上的这个运动，无疑是要反映到部队中来的。解放区的战士都给家里写信，问他家是什么成分，分得多少土地，有的就问他家里的土地被分了没有。“解放兵”亦有反映，想知道他家是什么阶级，全国解放后，他应分得土地呢？还是土地被分走呢？总之，“土地改革”运动，

在部队中反映强烈。我们虽然在平时特别是诉苦运动中，对每一个人的阶级成分都了解一些，但总不能对每一个人都了解的那么全面、深刻。同时，我们也想通过查阶级，清查“解放兵”中有没有混过来的国民党特务和伪装士兵潜伏下来的军官，以纯洁部队的组织。

查阶级，原来我们想走群众路线，每个连队分为若干组，每个人自己介绍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即你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来源，然后由大家评议。大家听了后，就议论开了，说谁属于什么阶级，根据什么条件来衡量。要求领导先讲一讲，使每个人都掌握一把“尺子”，有这把“尺子”就好衡量了。这个问题反映到纵队政治部来了（当时我任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我们同纵队首长研究，决定按毛泽东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统一去讲，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关于阶级划分的材料，《土地法大纲》我们还没有看到。

根据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各单位都照书本去讲了。讲了什么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及游民无产者等。讲完后，让大家讨论，有的说心里有底了，有的说了解的还不透。同时，我们又根据在延安时中央领导同志讲过的“重在表现”，就是说，阶级出身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的政治表现，例如：我们的党员也有出身不好的，但他们革命很坚决，这一点大家很感兴趣。

在分组自我介绍家庭经济情况、由大家评议时，大家都说，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我们都不够格，我们大家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即中农）、半无产阶级（贫农）、无产阶级（雇农）。“解放兵”说，我们当兵是抓来的，有钱人上学去了，上学的不当兵，不上学的也进城藏起来了，就是被抓了，他也有办法用钱赎回去。被抓来当兵的，都是我们这些穷汉子。经过清查，也有个别坦白说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在这里当兵比在国民党那里当排长还痛快。不是重在表现吗？我打仗也不比别人差呀！我们也没有调动他，当兵还是继续当兵，主要是搞清其政治面目。他们原来怕坦白交代后就不要他们了，我们这样处理后，他们很高兴，说共产党的政策好。

查阶级结束后，各连都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因为大家都是阶级兄弟，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团结，为打倒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而奋斗。查斗志。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起，胡匪宗南以十倍于我的兵力进攻边区，

当时我军只有两万余人，物资供应特别是粮食供应十分困难。边区人口不多，生产的粮食敌人抢、自己吃、解放军亦吃，加上战争，群众不能安定地生产，这样我们能否打持久战，能否打败胡匪宗南，收复失地，有些干部、战士抱着怀疑态度。

十月我二次攻打榆林，“宁马”增援，我军除留少数部队监视榆林守敌外，集中主力西进迎击“宁马”。十三日下午，我一纵队先头部队在元小滩附近与敌遭遇，由于没有高度的战斗准备，轻视敌人，结果七一五团一个营受挫。如果有高度的战斗准备，坚强的战斗意志，敢同敌人拼搏，这个损失是可以避免的。“宁马”战斗力果然很强，但我军十四日同他决战于元大滩，予敌以重大杀伤，敌死伤、被俘、逃散等在五千人以上，其余西逃。

纵队党委在部队休整中特别提出要“查斗志”的问题，通过群众路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接受教训，以提高部队的战斗意志，提高打败胡匪收复失地的信心和决心。

在讨论到物资供应困难能否坚持持久战和打败胡匪宗南的问题时，发言非常热烈，经过长征的同志（那时营团干部还有不少是长征的，旅、纵队都派人参加重点连队）说，红军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长征时，我们的困难和现在的条件根本不能比，一天三两千粮，还要走七、八十里路，如果没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对共产主义高度的信仰，我们能战胜各种困难、走出雪山草地吗？我们现在虽然困难一点，但同红军长征时比不知好出多少倍呀！我们第一次打榆林，撤到米脂、佳县三角地带，才吃几天南瓜，就议论纷纷，对打败胡匪、收复失地信心不足，有怀疑，这是没有根据的。有的就用算账的方法，来分析我们能否打败胡宗南，说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们撤出延安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就歼敌正规军三个整师师部、三个旅部、五个整旅、十一个整团，共六万一千余人，另非正规军万余人，俘、毙、伤、投诚起义的团以上军官三十六人，中将师长廖昂在清涧被我俘虏，除榆林外，延安以北广大地区已收复，同晋绥解放区联成了一片，那些怀疑能否打败胡匪、收复失地的论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现在胡宗南已处于被动的局面，我军已由被动转为主动。有人插话说，还要看一看各兄弟野战军，如东北、华北、华东、晋冀鲁豫野战军消灭敌人比我们多得多哩！蒋家王朝离倒台的时间不长了，现在我们已看到黎明前的曙光。问题讨论清楚了，大家就豁然开朗了，会场十分

活跃，有的叫喊快出击吧，不要再休整了。

查工作和推选干部。查“工作”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由于发现一个部队中连和连的工作比较相差很远，有的连伙食好、纪律好、团结好、作战好、走路不掉队，大小休息歌声四起，部队作风朝气蓬勃。有的连则相反，伙食很差，违犯纪律的多，内部不团结，经常互相吵嘴打架，行军稀稀拉拉，大小休息东倒西歪。这是为什么？

战士通过诉苦、查阶级、查斗志之后，觉悟提高了，为了使后进连赶上先进连，大家很尖锐地但又是善意地提出批评，说一些连队后进的原因不在于战士，而在于党团支部和连排干部，特别是党支部，没有起到战斗堡垒的作用。如伙食不好，为什么不去检查呢？有的连长爱喝酒，多吃多占，大家都是三钱油、五钱盐，你多吃多占，大家就有意见。连排干部不能同战士同甘苦，你说话就没人听，你对后进战士否定一切，人家有时也做了一些好事嘛，早晚点名，总是受批评，看不到人家一点优点，大家也觉得不公平，他自己也觉得无奔头，你说我落后，我便破罐破摔……党支部书记（一般是指导员当）和连排干部没有同战士谈心，特别是对后进战士的谈心，这样，工作就不能对症下药，一般化，说话说不到点子上。有的不愿听取意见和批评，害怕影响威信等，这是错误的。有一个连长，战士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铁匠”，爱喝酒，喝醉了乱打人，后因他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得到了战士的谅解。大家一致说，连长有一个好处，打仗是好样的，请求组织继续留任连长。我们表扬了这个连长，并将群众对他的态度通报全纵队，一方面对他个人是鼓励，另一方面也教育了那些怕批评、同群众对立的人，这样检查工作顺利的开展了。

通过诉苦、查阶级、查斗志和查工作之后，群众进一步了解了干部，干部也进一步了解了群众，这样推选干部（那时叫推荐）就好办多了。那时连排干部缺额太多，解决方法，每一个职务，都推选二至三人，最后群众评议从中择优录用，报上级审批后正式任命。本连如实在没有合适的，便从其他连调配，经过诉苦三查后，缺额的干部均补齐了。

运动中群众提出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纵队决定，连队连、排长一定要到班上参加战士食堂，连里每天要派两人帮厨，月底公布伙食账目。机关按标准吃大锅饭，不准另开小灶。战争年代，平均主义和与群众同甘苦是非常需要的。

诉苦三查后，接着进行军事训练。训练的方法与过去有不同，过去都是连、排长从头到尾教战士，但是连、排长有些动作还不如战士熟练。现在采取了“官教兵，兵教官，兵兵互教”的方法，结果这个方法效果很好，训练成绩提高很快。

以上是关于诉苦三查运动（即新式整军运动）工作总结的部分内容。

四八年元月，针对“三查”中查出的阶级异己分子，纵队组织“人民革命军事法庭”公开审理。大会成立“审判委员会”，推选我为主审人，下有陪审员十人。被审的都是罪行严重的我军基层干部中的败类。

第一人是我纵二支队七连一个排长，叫侯玉柱，冀中人，家庭地主成分，本人混入我军后一贯腐败堕落，在米脂强奸一个十三岁小女孩，文水战斗中贪污大烟一百二十两，此次“三查”被揭出，竟抢了十多颗手榴弹公开抵抗，打伤哨兵，企图逃跑；

第二人和第三人都是连级干部，在元小滩战役中放弃指挥，临阵逃脱，造成部队重大伤亡，而自己一个人跑回来；

第四人是五支队一营机炮连连长，湖南人，佃农，一九三四年入伍，跟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西北。由于放松思想改造，在侦察敌情时与另一个人轮奸一民女。

对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审判委员会根据其罪行和群众意见宣判，有的判了死刑，有的判了有期徒刑，对整个部队教育很大。

诉苦三查运动结束后，部队士气进一步高涨，各连队纷纷制定杀敌立功竞赛计划。春节一过，野司即决定开始宜川战役，由此揭开了一九四八年西北战场的序幕。

打出去

西北野战军要打出去，开展外线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怎么个打法？首先打哪里呢？

一九四八年一月底，彭总在吕家沟野司驻地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提出南下作战方案。

宜川，西临洛川，东接黄河，北通延安，形成了咸榆公路上的三角地带，是战略上的要地。彭总说：“先打宜川，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围宜川，敌军

必援，这样我军以逸待劳，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彭总分析了敌人必来增援的可能性，同时也作了不来的方案准备。我们与会干部都纷纷表示，决心打好南下第一仗。

我军经过了两个半月的诉苦三查和军事训练，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分别由绥德、米脂、安塞南进。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司令员也配和行动，从千里之外送来了粮食、药品、被服和刚刚经过土改翻身的青年参军农民。

为了不暴露战役意图，野司命令第一、三、四、六纵队于十六日到达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一带隐蔽。彭总分别找各纵队领导同志到他住处授领任务，彭总摊开地图，指点三、六纵队围攻宜川，六纵队除一部参加围攻宜川外，主力向西抗击增援之敌，不能让其援兵窜入宜川城。一、二、四纵队集中全力歼其援兵，各纵队要按时到达伏击地区，并反复说明，宜川是胡宗南必救之地。

二月二十日，野司发出宜川战役“一号令”，第三、六纵队开始肃清外围武装据点并包围宜川城。我第一、四纵队则向洛宜公路两侧隐蔽集结。

纵队冒雪向集结地出发，一路山大林深路滑，人滚马跌行进艰难，我们的纵队机关还带着文件、资料、油印机、纸张等，驮东西的小毛驴一滑一个四脚朝天，驮子翻了一地，结果机关的同志们不但自己负重，还要时时拉着小毛驴的尾巴让它站起来。到达宜川县境，部队休息。这里前两天刚被我军解放，全镇大多数人以买卖为生。开始他们对我们有戒心，不要边币，我们拿钱吃不到饭，后来我们给他们宣传我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政策，他们乐意要边币了，还说：“蒋贼快完蛋了，法币没用了！”

宜川被围后，胡宗南即令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五个旅十个团以轻装由洛、宜公路经瓦子街东进，增援宜川。我纵按野司命令在瓦子街断敌后路，并自西向东攻击。为了配合总攻，我纵在雪地、森林里埋伏了一天一夜。雪仍不断地下，且越下越大，变为鹅毛大雪，入夜，起了风，更是风雪交加，但干部战士毫无怨言。

三月一日晨，敌人全部通过我一纵队伏击阵地后，各旅即按纵队预定计划，沿洛宜公路两侧，由西向东攻击。敌人发现他的后尾打起来后，坚决攻击我正面抗击部队，妄图打开前进道路，窜入宜川城，然后依靠宜川城作为据点与我决战。但正面攻击未能得逞，遂改由向西和西南突围，向我三五八旅阵地反复冲锋不下

十次，而我军每次都以拼刺刀将敌击退。

七一四团在团长任世鸿的率领下，打得最艰苦。六连（后改为一师一团六连即硬骨头六连）阵地上，战士们同敌人短兵相刃，展开肉搏，几乎到了白热化。战士刘四虎只身冲入敌阵，一人刺死四个刺伤三个敌人，自己身负十一处重伤，纵队授予特等战斗英雄。七一四团自己伤亡也很大，团长任世鸿、参谋长武治安阵亡，六连只剩十三人，仍牢牢坚守阵地，战士称为“膏药”战术；三团战士陈润旺一人拿着手榴弹在敌群中大喊交枪不杀，吓得六十多个敌人乖乖投降。还有的战士怀抱机关枪和冲锋枪，站立起来向敌人集团冲锋扫射，阵地前一片死尸，战士称之为“低近射击”战术，战至黄昏各纵队才将敌全部聚歼于任家湾狭窄地区。宜瓦一战，仅用两天一夜，便获空前辉煌胜利，共歼敌一个军部、两个整编师另五个旅约三万余人，敌军长刘戡自毙，师长严明等被击毙。

战争结束后，满山遍野全是敌人的尸体和行李，山沟里到处堆满了枪炮子弹、车辆马匹，我纵战士欢天喜地打扫战场，庆祝胜利。

宜瓦战役，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证明诉苦及三查方法教育部队，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中央军委三月二日贺电）。毛主席在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中说：“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此后，西北野战军乘胜长驱直入，进军关中。

宜川、瓦子街战役后，由于延安、洛川敌人未撤退，敌人重兵集结铜川、耀县。延安、洛川不好打，铜川、耀县更不好打。只有挺进到蒋管区，才能把敌人牵出去。所以彭总在马栏镇野司驻地召集旅以上干部开会，决定打西府（宝鸡）陇东战役。宝鸡是陇海线上的重镇，也是胡宗南多年苦心经营的战略物资屯集之地。这里有庞大的军火武器库，储备着大量军用装备和武器弹药、物资器材，还有堆集如山的粮食、布匹、军服、被褥等，战斗胜利则会大大装备我军。这个战役从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二日打了整整一个月，战绩很大：延安、洛川的敌人全部撤走，坦克、战车等重武器被三纵队全部缴获；胡宗南后方补给基地——宝鸡的所有军用物资、弹药、粮食等，我军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带不走的全部烧毁；占领十多个县城，虽占了又弃，但起了宣传我党我军的作用，扩大了政治影响，取得群众的拥护。有些部队虽然受到一些挫折，但同战绩比较是微乎其微的。

我纵在出击西府、陇东的行动中共歼敌俘敌七千余人，敌人望风而逃，我则一路宣传，所到之处虽是新区，但群众对我们却很友好，有的老乡讲：“以前怕你们，现在亲眼见到你们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态度和蔼，还发放救济粮给我们，真是咱穷人的队伍。”

五月二十六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土基镇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西府、陇东战役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夏季整训计划，确定集中兵力，继续各个歼灭胡宗南、马步芳两集团，逐步扩大新的解放区。会议通过了《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的指示》。

会议结束后，我们按照前委的决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夏季整训。我们政治部机关，除了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开展评功评过运动外，还通过《前线生活》报宣讲西北战场和全国各兄弟战场的大好形势，使大家建立必胜的信心，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我们的各宣传队排演了一批优秀剧目，有《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刘四虎》等，在部队演出后，大家反映非常好，教育意义很大。机关全体干部和连队还在不妨碍练兵的原则下，积极帮助驻地群众收麦，老乡们拥护我军，都说：“割它一个地净场光，看他胡匪来吃什么？”

八月，西北野战军发动澄城，合阳战役。

野战军总部的作战意图：先消灭整编三十六师，得手后，歼击整编十七师、整编三十八师，以粉碎敌人封锁我出关中、威摄西安之目的。

八月八日战斗开始，十三日结束。这次战役，我纵协同兄弟部队在壶梯山、冯原镇、王庄镇共歼灭整编三十六师副师长朱侠、二十八旅旅长李规以下三千余人，俘虏敌整编三十六师参谋长张先觉、三十六师政工处长兼四九四团团团长陈定等以下近一万人。收复澄城、合阳两县城。

胡敌整编三十六师残部、六十五师、十七师、三十八师、九十师、十三师、二十七师等，在澄、合战役失败后，转入重点防御。八月中旬以大荔、蒲城为依托，西至咸阳，东至华阴，构成一条防我突入关中的防线。

我野战军经过将近两个多月的休整训练，并补充华北来的子弟兵和溶化“解放兵”，部队斗志旺盛。为配合晋中及中原友区部队的战斗，野战军总部决心集中全部兵力进行秋季攻势作战，破坏敌人防御带。

我一纵队以“挖心”战术，直插敌人心脏张家城，消灭一个旅部，并切断十

七师与四十八旅韦庄至酥酪的联系。整个战役前后共十四天，俘敌旅长万又麟以下一万一千余人，争取非正规军起义一千余人，合计毙、伤、俘及起义者共二万五千余人，打乱了敌人的防线。

此次荔北战役，我纵表现勇猛顽强、机智灵活，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圆满完成分割围歼敌人的任务，受到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通令嘉奖。

进军大西北

一九四九年元旦，新华社发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革命进行到底。

二日，边区《群众日报》发表贺龙撰写的《加紧战斗迎接胜利年》的文章。紧接着西北野战军于澄城北武庄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我们组织各级干部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同时在一月二十三日召开一纵首届英模大会，会上我们大力宣扬刘四虎、周黑子、硬骨头六连等英雄模范，树他们为全纵的旗帜，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在全纵队掀起学习和练兵的高潮。

二月一日，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称第一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部队进行了新的整编，我第一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参谋长陈外欧、我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我野战军开始春季攻势，目的是攻占蒲城县并相机歼灭铜川、耀县、富平县之守敌，即以实现解放渭河以北的目的。

为达此目的，野司集中一、二、三、六军攻歼蒲城之敌，四军向西行动，首先歼灭宜君（民团）之敌，得手后继续南进威逼耀县。这个战役到三月十八日结束，共解放与收复耀县、蒲城、富平、淳化、大荔等八座县城和临潼等六县部分地区，并俘敌二十师师长楮静亚、参谋长张凌汉以下七千余人，缴获各种枪炮四千余件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渭河以北地区全部为我解放。战役目的基本完成。

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机关某些干部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表现在集合动作慢，很长时间集合不起来，行动松散，拖拖拉拉，简直不像个军队的样子。晚上休息锁大门，睡觉时无戒备，总务行政管理差，事务主义作风严重等等。针对这些，我召集军政治部全体人员开会，反复跟大家讲：目前全国已经打了辽沈、平津、淮海三个大仗，敌人再组织这样的大战役是不可能了，但西北还没有打过大仗，

我们要积极准备迎接将来大的战斗。现在，我们要作的事很多，一定不能麻痹松懈，要拉紧思想上的弦，养成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战斗作风，迎接全国的解放。

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南京、太原相继解放，震撼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胡匪自知其迭次被我打击，败局已定，自四八年十二月起，将伪西安设署、眷属、物资、机关、学校等沿川陕公路向汉中、广元迁移，部队也逐步西移，西安城没有大部队设防。

五月四日，一野发起陕中战役。十四日，一军解放三原，胡匪向秦岭、宝鸡撤退。随即六军进攻西安，西安守敌南逃，六军于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我一、二、三、四军向西尾追敌人，四军解放麟游。二十一日一军解放永寿，二军解放岐山、扶风。三军配合六军占领西安后，继续南进追击逃敌。这次陕中战役，历时二十五天，共毙伤俘敌一六五师师长以下二万二千一百余人，解放西安市及县城二十四座。

六月，一野成立兵团，一、二、七军编为一兵团，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三、四、六军编为二兵团，兵团司令许光达，政委王世泰。

由于兵团的组建，一军领导班子作了加强，我被任命为军第一副政委，二师师长王尚荣任命为副军长。

这时华北的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已过黄河编入第一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这样西北的兵力就由五个军变成十二个军，部队素质和数量都超过胡宗南和青海、宁夏两马尚存的兵力。

我军四个兵团以西安为中心休息整顿，以逸待劳。我一军集结在户县。

七月一日，一野司、政向全军联合发出《关于消灭胡马匪军的战役指示》。二日，一军在户县涝店村外举行纪念“七一”、“七七”、欢迎三师归建及进军大西北誓师大会。

涝店村外红旗招展，人拥马挤，歌声如潮，枪杆如林，三万健儿汇集在一起。下午四时，大会开始，信号弹、照明弹腾空而起。除一野首长张宗逊、李井泉、甘泗淇，兵团首长王震及西北军区首长王维舟外，多日未见的老首长贺老总也驱车赶来并讲了话。贺总说：“我们这支部队是很老的部队，一军一师就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根子之一，我们有光荣的传统和作风，我们之所以英勇善战，基础就是政治工作……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进军命令，消灭胡马匪帮，解放大西北！”

七月六日，一野在咸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我军作战方针“籍马打胡，先胡后马”，进行扶眉战役，解决胡宗南主力，然后进军甘肃，歼灭青、宁二马。

针对胡宗南和“青马”“宁马”妄图在西安以西、宝鸡以东与我军决一死战，野司的战斗布署：以十九兵团（附骑二旅）进至干县、醴泉及其以北构筑工事阻击马匪。

二兵团（三、四、六军）由醴泉附近出发，经干县、武功间再经法门寺并向扶风及其以南之敌主动攻击。

十八兵团（欠六十一军两个师）守备西安及其以南地区。

一兵团（欠七军）由户县沿渭河南岸西进，歼灭敌九十军、三十六军，得手后，迅速进占益门镇，断宝鸡敌南逃之路，并策应河北岸作战。

从七月八日开始，各个兵团都按野司的布置开始行动。一军沿河南岸前进，午后攻占眉县，敌人还不知眉县已被我占领，都向眉溃逃，我共俘敌八千余人，至十四日占领宝鸡以南益门镇。至此，预定的扶眉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役共歼敌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此役，胡宗南主力基本被歼，胡马两敌被彻底分割，“青马”“宁马”退据陇东。

乘胜追击

扶眉战役后，一军进驻宝鸡休整，准备西进解放兰州、西宁。但此西去，沿途干旱，路上严重缺水，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部队。由于全西北解放指日可待了，部队情绪非常旺盛，干部、战士们都说，老百姓祖祖辈辈都能在那里，我们只是路过，顶多停一下，算什么困难呢？“青马”、“宁马”不是叫喊要同我们“决一死战”吗？希望部队快些行动。

野司对西进的布署：十九兵团为右路，二兵团中路，一兵团左路，十八兵团驻西安到宝鸡一线，防胡匪残部扰乱我后方。从七月二十四日开始行动，沿途各兵团都顺利地消灭或击溃拦阻我军前进的障碍，如六盘山、固关防线，不费大力就被突破。

固关防线打开后，我军乘胜追击，一军解放秦安，二军解放天水，其他部队也相继解放陇东大片土地。八月十二日，我右路（十九兵团）和中路（二兵团）已兵临兰州城下，并布署解放兰州。二兵团、十九兵团围攻兰州，一兵团经临桃、

临夏，直指西宁。兰州八月二十六日解放，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余人被歼，其余残敌向永登、西宁逃窜。

兰州战役刚刚结束，彭总便召集兵团和军以上干部会议。他浑身征尘和硝烟，但精神抖擞，两目放光。他说：“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只要把马步芳消灭了，西北就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认真研究一下，怎样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

彭总接着说：“西北有多大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少，荒凉贫困，因此，我们从今天起，即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我们要解放大西北，要担负驻区剿匪的任务，还要从现在开始搞建设。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从兰州落荒而逃的“青马”匪残部，沿路抢劫，马继援带着少数亲信窜回西宁，正值我第一兵团兵临城下，马继援惊惶失措，爬上飞机逃离老巢西宁。群众自发组织维持会维持秩序，并派代表迎接我一军入城。

九月五日西宁宣布解放，一军奉中央军委电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我任军管会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军管会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收降马匪残余武装，发布通告，安抚百姓，并命残敌立即到军管会报到登记，缴械投降。由于我军对来降敌官兵给予政策教育，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还发给路费遣散回家，校级以上军官集中学习改造，因此，前来登记受降的“青马”官兵很多。

九月十七日，党中央复电西北局：“同意青海省委以张仲良、廖汉生、冼恒汉、贺炳炎、王尚荣、张国声、傅子和、余秋里八人组成。并以张仲良为书记，仲良、汉生、恒汉三人为常委。”

九月十八日，西宁市各界人士、各族同胞三万多人和我军将士共同举行大会，隆重庆祝西宁解放。我军整队入城，战士们迈着雄健的步伐，骑兵们跨着高头大马，炮兵们牵引着蒋介石送来的一门门美式钢炮。队伍行进在西宁市的主要街道，道路两旁，挤满了回、汉、蒙、藏各族群众，大家喜笑颜开，争相观看，一片欢腾。

庆祝大会的会场设在东关的大教场，人流涌着部队，旌旗伴着阳光，在宣告胜利的礼炮声中，大会开始。兵团司令员王震首先讲话，接着青海省委书记张仲

良、一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我以及西宁市委书记刘枫和各族代表、战斗英雄等都讲了话。会后，军文工团和各族群众一起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几天以后，王震司令员率领一兵团部和二军、六军由青海继续西进，进军新疆，一军留驻青海，担负剿匪并建设人民青海的任务。

由于兰州的溃敌大部向河西走廊逃窜，我二兵团（附野炮团、战车营）继续沿兰新公路追击。一兵团二军也翻越祁连山与二兵团钳击西逃之敌，至九月二十五日，除少数逃散外，共歼敌合计四万余人（含投诚、起义的三万五千余人），至此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十九兵团也于九月二十五日先后进入银川，“宁马”全部被歼，起义、投降、被俘共三万三千余人，其余溃散。宁夏全部解放。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全部解放，新疆敌人完全陷于孤立。陶峙岳派和谈代表曾震五九月二十三日经酒泉到兰州，随后，陶峙岳及伪省主席鲍尔汉，接受毛主席八项和平条款，于九月二十五日发出起义通电。我一野二军及二野六军，由苏联帮助组织空运并汽车陆运进疆，起义的部队有正规军三个整编师、两个独立旅、以及边卡部队和联勤等直属机关共六万八千余人。

青海解放以后，我们遵照毛主席“把军队变成工作队”的指示，从部队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到地方工作，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九月底，根据形势的需要，我们组织市军管会所有派出代表进行学习。在中山堂，我跟大家讲：“敌人主力已经被消灭了，宁夏问题也解决了，新疆正在和平解决中，只剩下汉中的一点敌人，有我们的十八兵团和七军，很快就能解决。大西北解放了，战争终于结束了，新的生活，社会主义建设，从此将要开始。我们要长期留在青海，把青海当成自己的家，进行长期建设，这是一个光荣伟大的任务，大家一定要愉快地担负起来。

青海过去没有党的组织，连统战关系也没有，民族又复杂，这就是这个地区的特点。我们要保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工作，把青海的事情办好。”

西宁是青海省会，据湟水南岸，附近土地肥沃，宜耕宜牧，盛产皮革、羊毛、牲畜、药材等，街内市场密集，藏蒙回汉贸易极盛。但由于马家父子对青海各族人民长达四十年近乎洗劫似地残酷压榨、肆意掠夺，使我们接收下来的竟是一付烂摊子。

在清剿残余顽匪、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的同时，我们军管会设立了生产、财经、交通等部门，发动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清理战后创伤，修复机器，恢复生产，筑路架桥，修渠引灌，组织贸易，平易物价，遏制通货膨胀。为了帮助人民政府度过财政困难，我们部队自动停止开支，并继续承担部队调地方工作人员的供给，以减轻地方政府压力，支持地方建设。

这次，我们一军共抽调两千多名干部和党员老战士到地方工作，这些同志无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无愧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从此扎根青海，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那瑞安家落户，一干就是几十年，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生。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为准备在成都及其周围同裴昌会兵团决战，贺龙司令员奉命率十八兵团及一兵团七军进川配合二野歼灭该敌。我奉命调任七军政治委员，随军南下，军长是彭绍辉。七军刚进至文县，裴昌会即宣布起义，这样贺总命令，除十九师外，七军其余部队回天水改编起义的一一九军蒋云台部队。

十一月中旬，新疆各部队开始整编，整编前由陶峙岳将军发出《为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十二月中旬整编就绪，十二月二十九日于迪化（现改为乌鲁木齐）正式举行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成立典礼大会，至此，新疆正式宣告解放。整个大西北全部解放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了！

第二部：十年文革

第一章：官罢西山

这总是一段历史吧

从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西北工作，从没有离开过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对自己亲手参加解放的这块土地，我心里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有一种扯不开的眷恋。解放以后虽然也有几次调动工作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兰州军区工作。当然，这一方面是服从组织上最后的权衡考虑，另一方面彭总在解放大西北的征途中对我们发出的肺腑之言无时不在我的耳边回想。

那还是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枪炮声都还没有停息，彭总浑身征尘，布满血丝的疲惫的双眼放射出兴奋的光彩。他说：“我们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少，荒凉贫困……，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这些话跟了我一辈子。尤其是58年我响应军委号召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时驻地群众生活的艰辛、62年浮夸风甘肃死了那么多人、66年上半年我在天水农村搞社教时当地老百姓的贫困，这些事实总叫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军队的干部愧对解放这么多年的西北人民。所以几十年来我总想着为西北做些什么事，这实实在在是我在西北工作的由衷。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许是顺理成章地盖棺定论了。但是“文革”使我们这些奉命“支左”并被历史推向“文革”大混乱中第一批站出来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有争议的人。十几年来，尽管我为顾全大局保持沉默，尽管我为了协助组织上搞清问题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写材料，向上级申诉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经过多次考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作为一个受党培养教育考验六十多年的老党员、老红军战士，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任何委屈我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当我看到听到由于我的问题而使得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工作了多年的一批老西北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受到株连，至今还抬不起头，不被信任，蒙受冤屈，甚至仍然背着所谓“冼家帮”等政治包袱，我实

在于心不安，总觉得这是个事情，而且又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更觉得有必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能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以使其他同志的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

我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有着很严重的心脏病，风烛残年，日薄西山了。我从六十多岁等到现在，不可能再等一个十几年了。考虑再三，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应该写出来，一吐为快。当然，我只是讲事实，况且这是我的私人回忆录，并不打算公开发表。这是一段历史，等我们这些人都去见马克思了，也就无从考证了。写在纸上，记录下来，或许将来有一天，在不影响党和国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可以供他们去判断、去分析，总是个依据吧。至于孰是孰非，还是让历史去裁决吧！

乌纱帽扔在了西山

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和韩先楚、萧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我认为又是去接受什么任务，回来传达照办就是了，因此毫无思想准备。

后来知道，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6月7日、8日和9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我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我、韩先楚、萧华与宋平。

6月7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我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摘自1977年6月16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6月9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我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讲话。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根据我的记录，大致要点为：

华国锋：刚才，听了冼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

评就好。但冼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

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冼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冼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我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我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我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冼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冼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我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冼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萧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那一边？

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我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

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我注：这些我后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我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冼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冼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冼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冼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冼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当然，对冼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冼恒汉同志调动后，萧华同志为第一政委。

……冼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冼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我注：有什么根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但老帅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冼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

的。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

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我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的问题，冼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

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我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我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我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

很满意，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504厂”、“404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1976年4号、5号文件精神办（我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小平同志同“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冼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冼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汉同志，对冼恒汉同志是爱护的（我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说句老实话，从打我参加革命以来，几十年我还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厉的批评。对于批评的事实，平心而论，大部分我是不能接受的，这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要详述。这其中有些是有很大的出入，有些是无中生有，而有些则纯属执行问题。我作为党的一个地区工作干部，尤其又是一个长期做军队工作的军人，执行中央的命令是我的职责，尤其又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代，我无论是从党性、党纪以及个人感情还是从军人的思维考虑，都只有坚决执行。当然，中央犯了错误，我也必定犯了执行的错误，但我只是执行问题，不能把问题的全部都归结到我的头上，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看问题要尊重历史。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下面工作的人，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执行谁的指示？所以看问题要历史地看、唯物地

看，不要脱离开总的前提，不然说不清问题，解决不了矛盾。

对我作出的调动工作的处理，我是当时就表态拥护的，参加会议的各位都可以证明。这是因为：一，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来，我和韩先楚同志工作上合作的并不愉快，这在以往的工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和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都合作的很好）。由于工作上存在着分歧，致使兰州军区领导班子对一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影响到内部的工作和团结。因此，当叶剑英同志问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时，我表态“我调走”。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中央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是一棒子打死，严于批评，宽于处理，我当时是十分感动的。

由于我当时患病，瘦的很厉害（后查是甲亢），华国锋同志问我是留下还是回去时，我说想留下检查一下病，这样，我就住进了 301 医院，一方面看病，一方面也是等待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中央的一次全会，华国锋还对我讲：“你十一大还要参加（当时我是代表已选出），中央委员还要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央和地区对我的态度和处理竟与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意见大相径庭，以至于很快，就在我毫不知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并且还在 301 医院治病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况下，《甘肃日报》就已经把我作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放在头版头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了！以后的运动更是越搞越离谱，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材料、申诉也都写了不少，都是为了一件事：协助中央、兰州军区、甘肃省把问题搞清楚，一是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二也是解决一大批因我而被迫停止工作的同志们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些同志都比我年轻，有的从四十几岁已经拖到了六十几岁，到现在还生活在另册中，尝遍不被信任、不能工作、看不到政治前途的痛苦。我们党内的人为斗争何时終了？所谓的不能更改的历史遗留结论何时甄改？下面，根据我的记忆和材料，我将一些事件的发生以及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一年翻了两次烧饼

在兰州铁路局这个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但是我是个替罪羊。因为铁路局问题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决策处理的，我们则是完全按他的指示

执行。现在我觉得需要把这个历史事实讲清楚。

兰州铁路局与省委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在我没有出来支左前，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两家的矛盾就很突出、很尖锐。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为了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把裴孟飞和马继孔两个省委书记都撤职了。问题分歧的实质是：在兰州铁路局内部，省委支持一派，铁道部支持一派。我出来支左以后，省委又重蹈覆辙，支持所谓红三司一派，铁道部支持红联一派。这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在解决甘肃问题时发了三个文件，表态支持红三司，我也就支持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一派。但是，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从1968年1月省革委会成立到75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前，表面上铁路局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铁路运输基本上是正常的。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道部统管，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常委会上说过，同袁宝华同志也说过，“九号”文件好，我举双手拥护。宋平同志也知道嘛。我说，铁路就是要统一管理，不能一个省管一段，这样不行。《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央一类部就要管下面各个企业单位，铁道部就是一类部嘛。就是后来黎光同志工作组在那里出问题之后，我还说不是因为“九号”文件，而是工作问题。我的这些意见，宋平是知道的，我去看袁宝华同志，也说过我这个看法，宋平当时也在场。

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当时铁道部派黎光同志来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这样，原来表面上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当时，我对黎光同志的作法是有看法的、有意见的。但是，铁路局已交铁道部，我只好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当然，在某些场合，我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错话。

整顿不到半年，却又碰上中央开打招呼会议，在全党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被黎光同志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来了，黎光同志又来兰州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当时认为，铁路局的问题是铁道部管的，问题又是你整顿中搞出来的，我们不宜插手，所以当群众围斗他时，省委没有管这件事，而且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对发生的事情也不很清楚。

后来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我，叫我出面解决一下，我没有执行，顾虑有二，一、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并且铁路已不归甘肃省委管，我已无能为力，非中央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二、铁路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问题没有

得到解决，反而引起兰州出现王副总理的大字报，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状况。

兰州铁路局虽然归铁道部管，但该局又在兰州地区，对甘肃的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很大。这样，1976年2月，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我上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会上既没有让汇报，也没有让我们谈意见，就明确指示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等。并且把当时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查送来，让我看，并指示让我修改。我看最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又送回去，也没有提任何意见。

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我送来，说他们是搞了右侧翻案风，是“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叫我大胆修改。同时又让国务院联络员要我当晚写一个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并且说了要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同志的名）。

关于铁路局领导班子的问题，不是我提的，而是纪登奎同志和万里同志定的。开始他们两位说：“干部由甘肃解决。”我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我们解决不了，还是由铁道部派人。”他们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我说：“赵滔对铁道部一肚子意见，他已经被免了几次职了，柳州一次，兰州两次，恐怕不会干的。”

最后，把赵滔（还有张恒云、章良、陈平等同志）叫到北京，他们两位亲自同赵滔同志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又提出一个要求，要在省上挂一个职务，铁路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我向纪登奎同志汇报后，纪说：“可以同意这个要求。”这样，赵滔就在省上挂了个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铁路局的班子就是这样定下来了，最后写到我的意见中，并报毛主席批准的。

我向中央提的书面意见还特别强调说除了个别干部不称职可以调换外，不准再“翻烧饼”。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委1982年11月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中说，这是我“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月中旬，我带着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来贯彻执行。在贯彻中，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这就是“结论”

上说的揪“走资派”、“层层揪”、“动大手术”、“搞垮了铁路局各级组织，搞乱了干部队伍，破坏了西北铁路运输。”半年以后，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铁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所以兰州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

就在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遇到华国锋时，我还请示他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华国锋当时说：“兰州铁路局问题是今年2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纪登奎还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我再次请示华国锋、纪登奎，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纪登奎同志当着我的面问华国锋：“老冼问，这次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我回来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兰州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积极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帮”，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方面来。但结果不行，两派都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打内战。

铁路的问题，我们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并上报了几个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作答复。1976年12月15日，华国锋又把我叫到北京，第二次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说个老实话，在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一年两个政策，上半年这样搞，下半年又那样搞；今年翻过来，明年翻过去，叫谁搞谁都没有办法搞。我承认，在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省委、省革委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但我们不是决策人，而是执行人，把这个责任都归到我一人身上，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也是不公道的。

另外，铁路局在生产方面一直都是铁道部管的，如，机车车辆的大修、车皮调动、机车用煤的分配等都归铁道部直接管理。我也常听到省计委讲，铁路局反映，机车年久失修、机车用煤分配不足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铁路运输，而宋平同志应该是最清楚的，他是管工交的书记。所以，把铁路的问题全部推给省上，而省上又全部推给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在这次，河南的刘建勋同志也被同时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我

们两人同住京西宾馆。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由于心里郁闷，闲暇我俩也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刘建勋这个同志很开朗，思维敏捷、健谈，说话也很幽默。当时他讲：“铁道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到中央去解决。中央两次叫我来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前些天，铁道部把武汉搞畅通，硬往郑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来了。你们兰州也是这么回事吧？”

我讲：“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兰州铁路局也是这么回事。铁道部就是一直搞派性，谁反对省委，他就支持谁，谁跟省委，他就整谁。甘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铁路局的造反派反对汪锋，铁道部积极支持。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了，就让省委来解决。”

刘建勋同志说：“对、对、对，郑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

虽然是些牢骚话，但确实道出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和真实思想。当然，你位在省委第一书记，有些事情由不得你，上面叫你这么做，你明知是个火坑，也得去跳。跳了，出了问题，只有把你舍去，说你另搞一套。当时我对这种“权术”实在不懂，想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人说我：“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难怪被人整了！”我不赞同，如果政治就是阴谋诡计，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时甘肃省委内部分工是由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分管工交工作，因此，铁路局的工作是由宋平同志具体负责的。但由于铁路局的问题内外矛盾比较多，牵扯到上下关系也比较复杂，面对这种复杂难办的局面，宋平很不愿意过问铁路局的事情，甚至有时有意推躲，更谈不上主动去管了。有时下面向他反映铁路局的问题，他听了既不表态，也不向省委反映提出处理意见。有时需要他签字处理的文件，他不签，要秘书送到我这里，让我先签了后他再签。甚至中央领导向他问及兰州铁路局的情况，他也推说“不了解”。硬是把矛盾集中到我这里，把我推到第一线。

由于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我左右为难，思想上曾有过一些情绪。在中央开会时我曾向华国锋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当时华国锋对我说，你在甘肃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地区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干个十年没问题。当时我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我的信任。

可是没过几个月，华国锋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将他原先的指示和表态全盘矢口否认，硬将兰州铁路局问题一股脑全部砸到了我一人头上。把明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事情，说成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搞的“另搞一套”，给我戴上了一顶“跟‘四人帮’很紧”的政治大帽子。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锋、纪登奎等多次指责我在铁路问题上“压群众，捂盖子”，我当场回答：“捂盖子是你们指示的呀！”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注：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解决甘肃领导班子问题时，华国锋同志说，冼恒汉同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捂盖子、压群众，特别在铁路局问题上。我插了一句：“我是请示你们的，你们说铁路局的案不能翻嘛，我当时执行你的指示。”纪登奎发言时说：“关于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议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的，并且经过毛主席同意的，不能翻。事实上你违背了华主席的讲话，没有掌握斗争大方向，违反了四号、五号文件精神。”——摘自省委印发的记录）。

我戴上了“代理人”的帽子

1977年6月9日，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会上明确指出：“冼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摘自印发的记录）当时我就表态完全拥护，萧华、韩先楚、宋平都在座。

同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在传达中央指示的要点时也说：“遵照毛主席关于干部交流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免除冼恒汉同志在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的职务，由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决定后，我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301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这个期间，我还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跟

我一起来京的我的秘书陈文生和保卫干事华德孝也没有回去，住在招待所里为我整理检查材料，逢探视日也去医院看望我。宋平同志临离开北京前还专门带书信到医院给我，劝我放心好好养病，省里会按照中央“正常调动”的精神，不搞揭批，不搞运动。嘱我如有什么事情要办一定找他，云云。

但是，韩先楚、萧华、宋平三同志回兰州后，却没有按照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办事，而是以更加极“左”的作法，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洗家帮”、“西北帮”等活动，整掉了一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干部，仅省、军、兵团、大军区级的干部被非法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查的就有四十余人，师、地和县、团级干部有好几百人，一般干部更是一大批。

我也在事先毫不知情并且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扣上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从此，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我这个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所谓“代理人”。报纸上的文章看不到象样的、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而只是扣帽子，使人的感觉是，似乎洗恒汉比“四人帮”还要“四人帮”。

报纸上所批判的事情除了夸大其辞外，很多都是无中生有的。例如，有一出话剧叫“红河激浪”，是文革以前省委和西北局搞的，也挂到了我的头上；白银公司1964年的一起“三人反革命”冤案，也跟我联系了起来；甘肃那年气候反常，也说成是我做的怪；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军区“四大”，我和张达志被夺权挨整，可现在却倒打一耙，说我在“四大”中“乱军反党”！我想，如果这样的帽子扣到我头上能成立的话，那天下就没有真理而言了。总之，我对他们这种既不按中央政策精神办，又不符合事实，而硬把我往敌人那里推的搞法实在想不通。

再往后，我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查，听说对他大搞逼、供、信，强迫他揭发我的“罪行”。这个同志后来被复员处理，分配到火葬场干活。我的保卫干事华德孝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文化，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后来被处理到砖瓦厂……

运动是越搞越离谱了，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象是一纸空头支票，一直没有兑现，而“‘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现在，不知是不是还要戴到

马克思那里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拥护。这是党在历史转变关头的一次伟大的会议，不仅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而且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几十年来，我无论在兰州军区工作和在甘肃地方工作期间，都是按毛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的，重大问题都经常委讨论。我这个人直来直去的，不搞阴谋，我从没有给林彪、“四人帮”单独干过任何坏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根子在方针、路线、方法都错了嘛。全国性的灾难，甘肃能避免？冼恒汉能没有错误？中央1981年曾发了一个(81)22号文件，还专门讲了“过去历史上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不要层层去追究责任”。所以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总前提来看。

我从1977年6月开始，一直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这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过有关我的工作分配或调整的问题。

1982年11月，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决定下达五年多后，也就是萧华知道了他要从兰州军区调到全国政协去的消息后，为把这个冤假错案搞成既成事实，经过一番不正常的活动，突然决定让我回兰州最后解决我的问题。

回兰州之前，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对我是十分了解的，更何况他是当时的总政主任，由于我没有看到让我回兰州的军委、总政批件，因此想找他问个究竟。

见面后，我问萧华让我回兰州的事情中央、军委是否知道？让我回去干什么？余秋里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同意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他们还希望我回去后尽快解决问题，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为四个现代化再贡献一份力量。我非常感激。

当时，兰州军区还派了一名干部接我回兰州，讲得很好，说是萧华同志请我回去最后解决问题，等问题解决了，还可以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几年。我在北京已

等了六年了，从六十几岁等到了七十几岁。说个心里话，我非常想尽快解决问题，早日洗刷掉强加于我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摘掉硬扣在我头上的“代理人”帽子，因此，表示愿意回去，配合组织尽早把问题搞清楚。

然而等待着我的，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我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许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他们把我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里，光看守我的战士就住了一个排，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就连我的孩子们来看我都要严格盘问、规定时间。

第二天，萧华派人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起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看起来，他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不顾历史事实，硬要给我定个什么罪才肯罢休，否则他就下不了这个台。

对此，我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给予义正词严地斥责。我当即表示要见萧华、韩先楚、宋平等军区和省委领导，当面问问清楚：1977年6月在解决甘肃问题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我的问题的性质和处理原则是怎样的？为什么军区、省委领导回来后不按中央指示办，而是另搞一套，并株连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是否“中央”另有“精神”？可是萧华、韩先楚、宋平等人却回避不见，只派了一个军区副政委张如三出面回答说：“首长没有时间，所以不见！”以后我又几次提出要见他们当面谈，但他们根本置之不理、躲避不见，一直到他们先后调离兰州，始终没有见过一面！

由于我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这么干，把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执行工作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并欲加治罪，又加上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一大群专案人员对我进行严厉审讯、逼供，而根本不给我一丝解释和辩白的机会，这使我愤怒之中深感痛心。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完全是把我当作罪犯来对待，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折磨终于使我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差点要了命。

经过一年的治疗，到1983年11月，就在我将要出院的前一天，突然，军区纪委给我送来一份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所谓《免于起诉书》和兰州军区党委、甘肃省委1982年11月15日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让我看后提意见。我出院后的第三天，又给我送来总政治部1982年12月5日关于让我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由于这接二连三的刺激，我心脏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

这一系列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事先我并不知道，这等于说，不容我提任何意见，就定性处理了。按党章第四条（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并将申辩意见连同报告一并上报中央。”既然他们如此践踏党纪国法，我当时只在那个“结论”报告上写了：“这个审查结论很多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不同意。”

随之而来是对我生活上相应的制裁：200元生活费、限期搬家，否则便停水、停电、停暖气。由于无处可搬，只得听凭制裁。水停了，孩子们爬下水管道又接上；电停了，再自己拉一根线过来。只有暖气无法解决，冬天到了，西北风呼呼刮着，偌大的房子只有生几个大炉子取暖。由于室内充满了一氧化碳，搞得我经常煤气中毒，实在没办法，只好每年冬天到医院里去过冬。

上述这些极不正常的作法，都是完全违背党的《准则》的。

根据后来郑维山、谭友林时期的兰州军区党委整党总结说：“上届党委（指萧华时期的党委）常委集体领导发挥得不好，个人说了算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比较突出。有些经过常委讨论过的问题，未经复议，就被个人否定了。这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愿意说，有的不敢说。”（上届党委）“个别领导干部，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对我的所谓“结论”和处理意见以及一系列人身迫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央、军委对我先后几次的“组织处理”，也使我感到不同寻常并深感困惑。

第一次是1982年12月，也就是骗我回兰州所谓解决问题的时候，当时是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的，大意是：中央决定，洗恒汉按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移交地方安置。除此以外，“通知”里一字未提我到底犯了那些错误，也未提及什么“代理人”之说。由于我当时重病住院抢救，故这个“通知”并未通知我本人，也算是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吧。一直到1983年10月我出院回到家，军区才派几个工作人员将这个打印的总政电话“通知”拿给了我。从此取消了一切原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

1984年6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洗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这两次“通知”也都没提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以及为什么改变原先

的决定，又依据什么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对一个党员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必须严格按干部管理权限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并将“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党章还特别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予撤销党的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本人所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追认”。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党的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又是兰州军区党委的委员、常委、第一书记，但对我的处理却如此草率，只是由总政的三次电话“通知”。一直到现在，我的问题已经拖了十几年了，始终也没有见到中央的一个正式的“结论”，更没有由中央或军区党委正式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我百思不得其解，写了无数的申诉，但都如石沉大海，难道我的疑问和费解还要带到棺材里面去吗？

第二章：军内“四大”

不理解也得理解：这就是“文革”？

1966年初，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到天水县农村刘家庄大队参加社教。我搞社教的那个地方很苦，干旱、缺水，老百姓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养牲口没有草，烧锅烧炕没有柴，我们和土改时一样，住在农民家里，吃轮流“派饭”。群众多数情况下只能吃玉米面糊糊（当地叫散饭）和窝头，我们也吃这些。老乡们没有水喝，哪里还谈得上洗碗，我每天吃完饭都是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用舌头把碗舔干净。

老百姓生活苦，又加上文化低，全村几百口人和牲畜饮用水只靠一个“泉眼”，既不卫生也不方便，我到天水驻军要了些钢管，叫人把泉水引到便于群众接水的地方，又将人、畜用水分开，老乡们也觉这样很好。

由于陇海线穿越我住的村头，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火车经过。1966年8月间，过往的火车车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幅标语，记得有“打倒裴孟飞！”“打倒马继孔！”还有什么“火烧”“油炸”等。由于裴孟飞同志和马继孔同志当时都是省委书记，而过去又从未见到过这种斗争方式，因此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们的消息并不灵通，报纸是一个星期由通信员送来一次，又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兰州铁路局职工到省委门前静坐，北京来了红卫兵，省委瘫痪了……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红卫兵。那天，火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在离村不远处缓缓停下。也许是想下车活动活动身体，从车上下下来了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娃娃。他们围坐在一起，象是开个临时会议。当时正值8月下旬，甘肃已经见凉了，可这些孩子们却还都穿着短裤短衣，很有纪律的样子。我已经从文件中和报纸上知道了北京红卫兵，这趟车恰巧又是从北京过来的，因此心想，这大概就是红卫兵了？

有些老乡围了上去看稀罕，我也快步走了过去。看见他们果真在开会，是在讨论去新疆揪斗王恩茂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娃娃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

看见一个年龄稍大些的，象是他们的头，我把他叫了出来。我对他说：“你们可不能乱来呀，王恩茂可不能打倒，他是好人。”他看我穿着便衣，以为是个农村干部，觉得解释多了我也理解不了，便说：“大伯，您不懂，这是文化革命！”

这就是文化革命？我心里充满疑惑。

由于要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10月初我结束了社教，回到兰州。

回来以后我才了解到，早在6、7月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于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先是逼死该校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尔后，在1966年8月1日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为了平息铁路局事件，当时汪锋同志就把责任推到裴、马身上，撤了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但愤怒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各地政府机关几乎都是焦头烂额，工作陷于瘫痪。当时汪锋同志被红卫兵揪住不放，追得无处藏身，还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我回来以后，对地方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领导干部人人自危的情况感到十分忧虑并很不理解，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事实，又说明了毛主席是有意识地支持红卫兵，运用红卫兵的力量去冲开“阻力”并全面展开“文革”的。作为军人，服从是天职。虽然弄不懂中央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好在军队当时并没有乱，对于地方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是时刻在关注，而并没有参与和干涉的任务。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要把“文化大革命”坚决推向高潮。

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萧华找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同志到西山去，向我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我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同志传达，要我们搞好思想转弯。我听后感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萧华没有

理睬我，只是叫我们转好思想弯子。我回来后如实向张达志同志作了传达。

当时，西北的部队虽已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架子基本还是贺龙部的老底子，军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对贺老总的感情是很深的，对于要打倒贺龙这件事，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和张达志同志统一思想后，我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会后，大约是 11 月上旬，军委又把军队干部留下参加座谈会。会上，当时的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萧华指示，要在全军的机关、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开展“四大”，大闹三个月，把军队的问题好好揭一揭。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为什么要把军队搞乱？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此回来后，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萧华的指示，并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11 月 14 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拉起大喇叭广播的“常委会”

由于地方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已经几个月了，因此对于将要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也是有些思想准备的。虽然自我感觉比较自信：一、历史清楚；二、历次运动无问题；三、工作几十年从未犯过错误。但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还是不能丢掉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不能放松的，群众运动嘛，一定要正确对待。尽管做了这些思想准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机关“四大”一开始，政治部副主任张 XX 就带头贴出大字报，给军区部分常委画了像，定了性。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我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声称他有“重磅炸弹”，还要陆续不断地出大字报。这实际上是要把军区“四大”纳入他的这个框框进行。

他的大字报出来后，就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 XX 同志站出来了。在我们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 XX 同志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我们作了无原则让步，由张 XX 接替李虎同志担任文

办主任，接着王 XX 又接替高维嵩同志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王、张的一再威逼下，11月25日、26日召开了所谓的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但会议实际上无法正常召开，因为会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众就挤在会议室外面，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我主持，实际上是王 XX、张 XX 把持了会议。整个会议开成了由他们发问，我们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的是王 XX，接着是张 XX、杨嘉瑞、康健民、徐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我和张达志。这个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扩大会议，我看也算是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一大发明创作了！

这个会散了以后，王 XX、张 XX 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所谓革命群众的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我的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窃听张达志和我的电话，又宣布要限制我们的兵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一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张达志和我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就连徐国珍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办也派权洪（原任军区老干部办公室主任）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跟着。

对我和张达志则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逼着要我交待同贺龙同志的关系问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我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我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

以后，有的群众组织又到山西学习夺权经验，在军区机关起草了所谓“联合夺权通告”。到了1月份，一派拥护王、张的要夺权，一派反对王、张的不同意夺权，两派就闹到北京去了。这样，从军区机关“四大”又发展到北京参加全军“四大”去了。后来，还发生了大军区的造反派去甘肃省军区静坐，“四大”停了以后，又企图冲击军区办公大楼等。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就完全瘫痪了。

1977年6月被免职后，当时的兰州军区党委在1978年发了一个“四号”文件，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这完全颠倒是

非。我和张达志同志当时毫无自由，我身为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一直被残酷斗争，我怎样去夺权？我要夺谁的权呢？我总不能自己夺自己的权吧！所以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就在机关“四大”正进行期间，全军文革小组还给各大军区发来电报，征求连队可否也一样搞“四大”（大意），要我们提意见。常委们专门讨论了这个电报，除王 XX 外，其余人都不同意，党委给全军文革小组回了一个“不同意连队搞‘四大’”的电报。这些都有案可查，所以究竟是谁要“乱军”嘛。

1968 年 7、8 月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五 0 四厂对空防御的兰州军区空军高炮一师一名副参谋长叫潘继祖的，一天夜里，背着该师师长、政委，假借奉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调动三个团的兵力，八十二辆大卡车，要攻打兰州军区，扬言抓到张达志、冼恒汉可以不请示报告，就地枪决。当潘给部队动员讲话时，有两个团的政委质问潘：“这样大的事，师长、政委怎么不来？”潘不回答。他们立即跑步前去告诉师长阎福增，这样才把潘当场逮捕，事件才没有发生。

这个事件的主谋者潘继祖，第二天就被林彪反党集团的吴法宪用专机押回北京，包庇下来了，审讯结果怎样，从不告诉兰州军区。“9.13”以后，1972 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我在小组发言时又一次严肃地提出此事，并登了简报，要求中央派人审查，并将情况告诉兰州军区，以解开压在我们心中的疙瘩，可后来也没有任何下文。

1967 年 2 月 12 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停不下来，张达志和我说话没有人听。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派群众组织拿出了红卫兵转来的王 XX1933 年在山西反省院写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要求军区党委处理。

当时，我召集部分常委开了个会，要高维嵩同志去北京汇报，请求中央军委派人解决兰州军区的问题，并报送王 XX 自首变节的材料。高维嵩同志到北京后，当时萧华接见了他和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刘凯。萧华没有让他们汇报军区的情况，就说：“你们军区党委的报告我看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王 XX 这个材料是个高质量的叛徒（他连说了三声叛徒）。现在你们简单谈一下，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最后他答应军委派人到兰州军区解决问题。

在这次接见中，萧华还指示兰州军区查一查王 XX 与黄克诚、薄一波的关系

(据萧华讲王当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是黄克诚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牺盟会出来的干部,因此萧华要把王 XX 与黄克诚与薄一波挂上勾。幸亏我们没有查,否则又是一大罪状)。

过了两天,萧华又找高维嵩同志谈,大意是,军委不派人去了,你们自己解决,办法是整顿机关,有问题的部就停止工作整顿,有问题的人就停职检查,把张、洗、王、张都调到北京来,让群众在整顿机关中背靠背的揭发。揭发一段后,如果需要他们回去就让他们再回去。并说,张、洗来了住京西宾馆,王、张来了住海运仓。对你们的问题,军委还要开会研究,然后再正式批示。对王、张的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有所区别。王 XX 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张 XX 没有历史问题,停职审查。

高维嵩同志电话传达这些指示后,他们于 3 月 15 日由北京返兰,我们四人于次日从兰州一起乘专机去北京。一下飞机,军委派来接机的两辆车已经在等待,其中一辆车将我和张达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宾馆,另一辆车将王 XX 和张 XX 拉到海运仓。

1967 年 4 月 4 日,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问题,专门发了个电报指示说:要整顿军区机关,在整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左派,打击右派……

由于在兰州军区机关“四大”期间,我是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四大”停止以后,我又被暂时调到北京,让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所以军区机关搞“四大”、王 XX 的定性为叛徒、搞整顿机关,都是当时的总政主任萧华一手定的。特别是整顿机关,怎么定的、怎么搞的,具体问题我没有过问,也不便插手。

可是在 1977 年 6 月以后,萧华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领导大抓所谓“洗家帮”时,却把王 XX 定叛徒和军区“四大”以后进行机关整顿统统推到我的头上,说成是洗恒汉和高维嵩一手制造的大冤案。高维嵩同志想不通,在 1979 年,有一次碰上萧华,就当面问他当时代表军委接见时是怎样指示的,又是怎样亲口交代的,而且有军委的正式批复等,现在怎能说是我和洗恒汉一手制造的呢?请你再回想一下,说句公道话。萧华则矢口否认说:“我没有听过你的什么汇报,也没有看到你们的什么报告,更没有说过定王 XX 叛徒和要你们机关进行整顿的话!”说完拂袖而去。

1967 年 5 月,军委让我回到兰州,紧接着我便奉命调出参加地方“支左”,

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一直到8月5日我才又回到兰州，从此以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由于当时的分工，我主管西北四省（区）地方的“支左”工作，因此军队的事情，包括整顿机关以及王、张案子的具体审查，我都没有具体过问。

1967年军区常委在讨论所谓王、张的案子时，我参加过两次会议。作为兰州军区党委书记，对将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我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定案会上，我讲了一些错话，对因此案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我再次向他们赔情道歉。

这个案子的平反我是同意的，但兰州军区党委1978年第4号文件中，给王XX摘掉了帽子，又把“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帽子扣到了我的头上，这样的帽子我能接受吗？要实事求是嘛！我是军区政委，反谁的军、乱谁的军呀？我是军区党委书记，篡谁的党、夺谁的权呀？合乎逻辑吗？

机关“四大”停止以后，由于要落实“支左”任务，我们成立了军区“支左”办公室，当时军区派出了杨嘉瑞同志担任“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跟随我一起参加对甘肃地区的“支左”工作，这也就是兰州大街上出现“打倒张、洗、杨，解放大西北！”大标语的那个时候。

“支左”办公室成立不久，大约是5月间，我和张达志同志在参加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萧华、杨成武同志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一个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是在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还要我们回来后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治部派人（据说是军区干部部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查杨嘉瑞同志的具体指示，杨嘉瑞同志的审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与此同时，地方上又转来一个材料，陕西关中地区有人揭发他在彬县当国民党保安中队长期间，杀害三名要投奔红军的人。经过反复调查，据说有人证明有这件事情，而杨本人却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曾请示我怎么办？我当时说：“算了，再不要调查了，就是有个事情也是个历史问题。杨已年过七十了，你们给他谈清楚就行了。”审查人员把我这些话如实地向杨讲了，杨还专门给我写了信，表示感谢。

70年底，林彪搞了一个一号战备命令，各大城市都搞人口疏散，当时把他

也疏散到他的原籍陕西省兴平县，没有房子住，我知道后，叫军区政治部把他安排到西安兴庆公园军区干休所。

在审查杨嘉瑞同志这个问题上，我执行了上面的指示，是有错误的。我愿意再次向杨嘉瑞同志赔情道歉。

说个老实话，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有许多事情是由不得你的。不做，当时犯错误；做了，过后犯错误。军区“四大”，我挨整遭批斗，是受害者；“四大”过后，我也审查过别人，同样，别人也挨了整。这个现象在“文革”过程中和“文革”后期，应该说是很普遍的。

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城市烧到乡村，从军外烧进军内。

奉军委命令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最先闹起来的是文工团和体工队。之后不久，军内军外的“造反派”开始相互串联，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军区大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张、洗！”的大幅标语象一幅幅巨型挽联从办公大楼上垂悬而下，我们住的宿舍干脆被大字报和大标语糊了起来，只留下一个门洞进出，门上还贴着白纸黑字的大对联，怪渗人的。记得运动开始后不久，我广西老家来亲戚看我，这些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的纯朴农民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当时就吓得浑身哆嗦，第二天一早吴杰便买车票打发他们走了。

“四大”开始初期，我和张达志及其他常委同志都还是抱着欢迎群众监督的态度，认真接受群众批评的。但事态的发展却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造反派对我们搞起了人身攻击和逼迫审讯。

这些耻辱对于我们这些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尤其年龄已五、六十岁的人来讲，实在是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但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电报却一封接一封不断，要我们满腔热忱地支持革命群众运动，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运动开始以后，我的公务员以及保姆、大师傅都被造反派赶走了，家里的大孩子们也都出去串联了，老伴吴杰是省委档案馆馆长，为保护档案，经常在馆里顾不得回家。

我和张达志同志的宿舍紧挨着，我的小儿子当时十二岁，我们挨斗的时候，

他便和张达志同志六岁的小女儿圆圆一同去送饭。饭是他们自己做的，常常是煮一锅糊米饭，下面还埋着鸡蛋和未熟的绿豆。两个孩子一路走还沿途捡些散落的传单，准备留给我们回家看。

那时候造反派经常去家里胡闹，有时候刚参加完批斗会回家睡下没几分钟，另一派的又来揪斗。为多睡会儿觉，我和张达志常常各自站在自家后窗树底下等造反派走了后再进屋。有一次，站着站着就在树底下睡着了……

当时，全国军队（机关）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造反派无法无天，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很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纷纷跑到北京回避，住在京西宾馆“避难”，还有些住进了医院，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更是带枪上了山。

后来，军区“四大”结束后，我们在北京开会碰到一起，许司令还对我嚷嚷：“谁象你们一样，还老老实实等着人家斗？”吃饭时大家聚在一桌，七嘴八舌都说我和张达志是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由于各大军区“四大”期间都是文艺团体闹得最凶，因此，“四大”结束后，由南京军区带头先解散了这些造反派的发源地。我们也步南京军区后尘，解散了军区战斗文工团和军乐队、体工队。这些人后来听说有的转了业到地方工作，有的回了家乡另谋出路。当年他们造反的时候还都很年轻，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们，他们也是受害者。

毛主席说“张、冼是老实人”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些会议。有时候是中央叫去听汇报，有时候又是全国会议的西北组召集人，因此，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触机会也就相对多一些。

那个时候经常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打来，紧接着随后专机也就到了。中央和军委召集的会议一般都在京西宾馆，会议都很保密，尤其是党的全会，基本都是会议开完后才见报见广播，在整个会议期间媒体是决不做报道的，只有“美国之音”才在夜深人静时作一些猜测。

住在京西宾馆开会，尤其是全国性的会议，低头抬头吃饭走路遇到的都是“各路诸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子女和亲戚在北京，由于会议一般都保密，因此有的时候子女和亲戚来访，就安排在专门的房间里，个别时候安排不下就两家进

一个房间，我就遇到过一次，和皮定均同志同在一个房间里接见女儿。过后，大家都大发牢骚，对此种故作神秘和不信任人的做法很反感。

住在京西宾馆，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十个人一桌，各自掏各自的饭票。那个时候我们是吃一块三一天的伙食，工作人员是八毛钱一天。经常看见陈永贵、吴桂贤、尉凤英等人和工作人员一道去吃八毛钱一天的伙食。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同志工资并没有增加，国家给一些补贴也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很节俭。在我们省上开会时也一样，有些基层的干部还自带干粮呢。

军队“四大”结束以后，毛主席决定让解放军出来“支左”。5月，毛主席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我和张达志也参加了接见。刚刚经历过“四大”的批斗，被毛主席接见就是得到党中央的信任和首肯，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和兴奋。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与我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我和张达志同志引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我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同志说：“张、洗是老实人！”主席的一句话，说得我心头一热，顿时百感交集，觉得自己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理解，什么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在后来的一些接触中，主席又几次讲过“洗恒汉是个老实人”的话，使我终生难忘。

1971年“9.13”时，总理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已吃了安眠药，脑子昏昏的，一听是总理的电话，便立即强迫自己清醒过来。总理说：“那个经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第二天，总理又亲自打来电话落实战备情况，在询问完毕后，听得出总理心情很沉重，他说：“洗恒汉同志，西北地区你要做牵头人呀。”我当即表态：“总理，我不行，还有李瑞山同志他们呢……”总理说：“你要当仁不让嘛！洗恒汉，你不要太世故呢！”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当时的西北局已名、实俱亡，各地省自为战，总理为了便于管理，便指定我作为西北组的召集人。说句实在话，由于我在军队工作几十年，对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了，因此我一再向总理推荐李瑞山、胡继宗这些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同志，但总理和主席主意已定，我不好多说什么，一方面觉得不能辜负主席和总理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想为西北人民做些事情，便硬是咬咬牙挑起了这付担子。

第三章：十年“支左”

奉命“支左”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毛主席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

进入夺权阶段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普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地方上乱揪斗、乱冲闯有看法，比较反感，军队也时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冲击。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规定军队是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的管辖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当时地方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一派群众夺了“走资派”的权，另一派群众又来夺这一派的权，各派都说自己是“左派”，指责别人是“保守派”。到处都是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机关、抢夺“走资派”，随之而起各地出现了武斗、流血事件……这种局势眼看着愈演愈烈。

为收拾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1月23日，在毛主席指示下，中央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而不应该充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以后，“支左”又发展成包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在内的“三支两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立即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军区的“四大”停不下来，我们说话没有人听，“四大”的余震一直持续到4、5月份。当时，兰州军区“四大”还未完全平息，我和张达志还都来不及洗澡换衣，便被专机接到北京领受任务。

关于兰州军区“支左”的安排，具体人员分工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文件也是毛主席圈阅批示的，但布置任务是周总理亲自谈的。

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我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我们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总理对我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

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

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总理的话语重心长，我和张达志本来还憋着一肚子委屈想向总理倾诉，这一下全化为乌有了。我们看到总理一脸疲惫，眼睛里布满血丝，心情很沉重。当时国家那么乱，中央文革小组又不断找茬子，看到总理心力交瘁的样子，我们都很心疼，当即向总理表态一定努力搞好“支左”工作，争取早日稳定大西北的形势和恢复生产。

回来后，我们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并派出了精兵良将。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当时的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同志负责；宁夏自治区由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同志负责；陕西省由当时的 21 军军长胡炜同志负责；青海省由刘贤权同志负责。干部决定以后，再由他们分头负责组织各地的“支左”班子，一级一级动员、开会，把中央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左”人员。

当时，很多同志都是刚从批斗会上下来，大标语上还在继续“油炸”和“火烧”。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一道命令下来，这些受命于国家危难之中的干部，顾不得洗刷自己的委屈，连发牢骚的时间都没有，便立刻收拾行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从此，我们这些军队“支左”人员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在“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各大、中、小学校很快都进驻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当时，为了表示支持，毛主席把巴基斯坦访问团赠送给他的一些芒果送给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对大家鼓励很大。军宣队、工宣队总算使各地区、各单位有了领导，较快地结束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局面。

兰州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主要的负责人是我。我可以肯定地认为，工作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的办公室和宿舍安有专线电话，经常可以和总理办公室通话，直接请示和汇报工作，也可以及时得到总理本人的

具体指示。许多直接指导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文件，也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示圈阅的。

在我“支左”期间，我从未和“四人帮”有过直接联系，也不记得得到过他们的什么指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跟随党和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几十年斗争中风风雨雨走过来的人，我不至于糊涂到去听一些根本没有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人的瞎指挥。何况，我对这些人是有抵触的，是反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那么复杂，我就是认准了只跟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一点，我的头脑始终没有动摇过。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这似乎有些教条和僵化，但我们不可能摆脱当时历史的局限性来谈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才对。

当时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天下大乱的局势下，让解放军来收场，由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及后来的工宣队、军宣队的派驻，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设想，如果当时没有解放军的介入，局势将会怎样发展。

初识“造反派”

对于“支左”，我们的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谁是“左派”？这个问题无论是毛泽东本人或是中央当时的各种文件中都没有讲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不清楚。毛主席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清楚。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后来的具体执行中才容易产生偏差，以至给有的地区带来了严重后果。

兰州军区机关地处兰州，我们虽然对甘肃的运动情况了解得多一点，但对于甘肃各派群众组织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派，当时我们的“支左”干部虽经过一番考察和接触，但还是犹豫得很，实在很难下这个决心。

当时甘肃省造反派组织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一派组织由出身比较好、党团员比较多的群众组成，他们比较遵守纪律，造反精神不是很强，被激进的造反派称之为“保守派”，这就是“革联”。这派群众以一般干部为多；

还有一派组织是由造反最早、斗争最坚决、运动一开始便首先受到省委压制和打击的铁路工人们为中心组成的“红联”。由于一开始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此造反目的明确、态度坚决。但由于参加者人数众多，各种成分都有，难免鱼龙

混珠，各种违犯纪律和乱搞的事情时有发生；

由于“红联”存在的问题，于是从中分化出另一派组织“红三司”，这个组织大部分由学生和工人组成，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红联”一样，但组织成分较为单纯，比较守纪律并拥护军队。

三派都是群众组织，到底支谁舍谁？实在不好下这个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犹豫后，我们想摸一下中央的态度。

由于甘肃省委在运动的一开始便是得罪了群众的，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是被点了名的。因此，几派群众组织目标对准省委是比较一致的。当时，红卫兵们闹到北京去，中央以周总理为首的领导同志还接见了他们，并讲话支持了他们。后来，在北京形成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曾明确表态支持所谓红三司，这样一来，我们当然也就支持了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外的群众组织。

“三个文件”

1967年6月，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调我到北京去领受解决甘肃问题的具体任务，几天后，中央又把当时甘肃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原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同志也调去。在中央的会议上，拿出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结合胡继宗同志的指示和由中央指定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并形了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因为是8月5日从北京带回来的，因此甘肃群众称之为“八五”文件）。文件中，中央明文确定了要结合谁、怎么搞大联合、成立省革委会等一系列问题。我在甘肃“支左”，完全是遵照这三个文件办事的。

由于对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当大。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洗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洗，解放大西北”等。因此，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非常艰巨，要把全省的群众联合在三个文件的精神下，要复工、复课，成立革委会，恢复秩序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们全体“支左”人员几乎是连轴转，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去，哪里需要解决问题随叫随到。有好多次我都已经吃了安眠药，脑子已开始犯

困了，电话一来，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放下电话，马上就得走。到外面冷风一吹，睡意也就没有了。当时就是感觉责任重大，一点都马虎不得。

但是，在筹备成立省革委会的过程中，各派群众组织的意见不一致，甚至“红三司”自己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争论的很厉害，影响了大联合的进度，这样，就有一个统一认识，即促进联合的问题。

分歧的实质是成立甘肃省革委会时结合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一直到省革委会已经成立以后，有些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都很大，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胡继宗同志，提出结合裴孟飞同志。

当然作为裴孟飞同志本人，在原省委工作期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由于运动一开始便得罪了群众，有些群众组织还心存芥蒂，另外当时中央对他的问题也没有一个说法。

胡继宗同志是当时在北京解决甘肃问题时毛主席亲自点名要结合的干部。这个同志很朴实，工作也很踏实，过去和华国锋在湖南一起工作过，在湖南的口碑很好。

我当时在讨论结合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支持中央提名结合的胡继宗等领导干部，没有同意一部分群众提出的结合裴孟飞的意见，我认为这对稳定当时已经初步恢复的政治局面是有好处的，对巩固当前大联合的雏形也是非常有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胡继宗同志在省里工作的很好。他认真踏实、任劳任怨，在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个新秩序的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后来，这个同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繁重的工作，不幸心脏病发作去世。

由于各派群众组织在干部问题上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一致，造成各派争论不休，互不相让，街上的大字报一茬接着一茬的换，不是你的盖了我的，便是我的盖了你的，常为这些事引起一些事端。

在省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几派都有分歧，工作是异常的艰辛，要做每一派的工作，因为“大联合”是基础。那一段时间，我们的“支左”干部真可谓是“苦口婆心”了。

尽管我们给各派组织的头目都做了很多工作，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支持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左派”的指示，对他们尝试团结和教育，但个别造反派头头，还是从各自的派性地位出发，争权夺利，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致使我们对某些造反

组织头头深感失望。这也造成了后来革委会中军人成分为多，而群众代表则以劳模为多的普遍现象，理论上应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的革委会，最后实际上主要由军队干部组成，而红卫兵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的比例很小。

除了大张旗鼓宣传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把重点放在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工作上，我还亲自抓造反派的整风，抓兰州地区三派组织的大联合。我要求支左人员一律下到基层，狠抓三个文件的落实，促进解放干部和大联合，并以省筹备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发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等三个八条规定，要求各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禁止相互武斗，并下令收缴散落在群众中的枪支、匕首等，这些规定对稳定当时甘肃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成立以后连革委会的牌子都没有地方挂，结果挂到兰州饭店。因为当时原省委、省政府的机关及重要公共建筑物都是群众组织占据着。那一段时间解放军“支左”人员虽然在努力工作，但有的地方做通了，解决了，有的地方解放军根本进不去。

那一段时间社会上针对解放军、针对我本人以及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都很多，有反对的，有拥护的，今天你的盖了我的，明天我的盖了你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为此而努力去工作的。

复工复课“闹革命”

1967年1月23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当时我们军区的“四大”都还没有停止，我和张达志同志还在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所以，这个“支左”一直拖到了四月初，由周总理提议，经毛泽东主席批示，明确由我负责组织兰州部队参加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张达志同志负责军区工作，我和张达志到北京领受了任务。当时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的任务只有靠解放军了。但是，一堆乱麻，工作从何下手呢？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思路。现在分析起来，历史上“大乱大治”都是发生在政权更换、改朝换代的

时候。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掌握着政权，根本不需要通过“大乱”来达到“大治”，否则只能乱了自己。但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已经乱到了极点，毛泽东打出了最后的王牌：让解放军出来收场，居然在不长的时间内控制住了局面，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信，没有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后来的局面是很难设想的。

为了稳定混乱的局势，我们首先调集部队进驻刘家峡水电站、白银公司、兰化、兰炼、兰州铁路局以及中央在甘肃的几个重要国防军工企业等重点单位和地区，并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大专院校、省市机关做群众工作，制止武斗，消除派性。对公检法机关、金融系统、电台、档案机要等部门实行军管。为稳定农村局势，保证农业生产，我们的“支左”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劝说“造反派”不准到农村串联，农民也不准进城游行等。我们还以省革筹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颁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的多项条款规定，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并督促落实。

由于甘肃的战略地位（当时是反修前线），中央对建在这里的几个国家大型工矿企业以及几个重点国防军工企业非常重视，有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总理更是经常亲自过问，我也向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保证按期完成。

比如刘家峡水电站的复建。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 1964 年投资兴建的，工程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指挥生产，当时我们派出了军队得力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会上混乱局面的干扰，专心至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 1969 年提前发电投入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甘肃的电用不完。国务院指示我们要支持陕西关中、汉中地区的国防厂矿生产用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专门拿出资金，派军区“支左”干部负责指挥架设了从刘家峡到陕西关中的三十三万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保证了陕西地区国防工业生产用电。为此，水电部还发文向全国进行通报表彰，并组织人员参观学习。

再如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期间更是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

我向国务院汇报了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具体想法和建议，国务院很支持，并批示全国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重新上马建设。1971年1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我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10月1日不出铁，我俩从高炉上跳下去。我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0月1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以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这个烂摊子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此外，我们对兰州钢厂、兰州机械厂的兴建，对长庆油田的勘探和建设，对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窑街煤矿、靖远煤矿的扩建改建等工程，也尽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军队和地方得力干部去参加领导，具体组织落实。同时我要求我们省委、省革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抽时间亲临现场检查工作，就地解决困难，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这些项目都很快建成投产，为国家提供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资。1970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多，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

我们省的几个中央直属大型国防军工企业生产形势也很好，比如404、504、805以及长风、万里、新兰等厂，那几年一直在战备，这些厂子的生产任务都压得很紧，在别的省区还在武斗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企业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我每次去北京开会，周总理以及国务院几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碰到后都表示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说中央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和几个国防军工企业都很出色，保证了国家急需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为战略需要作出了贡献，为原子弹按时试爆成功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做出了贡献。

甘肃省历史上是一个工业落后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私营企业，产值非常低，轻工产品也几乎全靠外省区调拨。解放后，国家拨款建厂大力开发甘肃拥有的丰富矿产资源，使甘肃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但由于基础太差，底子太薄，工业产值在全国排名总是倒数几名。

由于军队、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197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排名前进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我们的轻工产品也上了一个台阶，当时我们的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我们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

设计生产的电视机，虽然是电子管的，体积很大，样子看起来显得很笨重，但这意味着甘肃电子工业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汽车修造厂也很不错，柬埔寨的宾努亲王访问兰州时乘坐的敞蓬汽车就是他们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适、安全，宾努亲王很感慨，说原以为甘肃是个人迹罕见的荒凉落后地区，没想到还能自己改造汽车。

不能不提到一点，当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些口号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口号，使工人返回了工厂复工，学生返回了学校复课，社会秩序安定了，人们都立足本职工作，生产和经济工作就顺利进行和发展。

脱贫之水黄河来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历年来干旱少雨，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历史上就是一个长期贫困和缺粮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饭，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不少地方群众一年几乎有半年以上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讨饭度日。解放以后，每年需要国家支持，从外省区调拨大批粮食接济才能勉强度过贫困生活。所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摆在刚刚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会面前的第一个大难题。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的方针，我们把抓好农业生产，争取多打粮食摆在省委、省革委会工作的第一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省革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在全省占很大面积，常年雨量稀少，蒸发量大，有的地方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老百姓吃水都是靠修水窖积聚雨水和雪水，条件十分艰苦。加之多年来缺少治理资金，农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历届省委都下了大力，但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想把粮食一下子搞上去困难比较多。但是甘肃的干部很好，能吃苦、老实、厚道，这是有利条件。

我们部队参加“支左”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有些同志对改变甘肃的贫困面貌信心不足。我对他们讲，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吃的是甘肃人民种的粮，喝的是黄河的水，也算是甘肃的半个儿子了吧？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的条件还这么差，老百姓还这么苦，我们作为

共产党，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党要我们来做这里的工作，我们一起为甘肃人民做些事情吧。

甘肃发展农业，关键是水。有水就有粮，有粮老百姓就有饭吃。因此，我们提出要改变干旱面貌，必须以“水”为大，下大力气解决水的问题和控制水土流失问题。省委、省革委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抓好“两西”（河西、定西）建设的设想规划。要利用祁连山的水力资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要下大力改变定西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修造梯田，打坝填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此，我们专门组建了“两西”建设指挥部，选配了懂业务、有干劲的干部具体负责。

这个设想计划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认为很好，又把甘肃的“两西”扩大为包括宁夏“西海固”地区，合称为“三西”治理干旱的建设工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加大投资，统一实施。几年后确实见了效，也取得了治理干旱的实际经验。

在那几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会的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们每年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查研究，我们分别深入各地农村蹲点（我在最穷的通渭蹲点），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察民情，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治山、治水、如何解决人畜饮水、农田灌溉防渗漏、压砂保墒、如何解决种树成活率等许多实际问题，为我们决策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加治水经费，我多次找国家计委做工作，使计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万元，用于打机井和建设水利设施。几年中我们全省共打机井六万多眼，使八十多万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达到旱涝保收。

为了充分利用黄河流经甘肃境内的地理优势，在续建好刘家峡大型水力发电站的基础上，我们又先后兴建了兰州郊区的八盘峡水电站和地处陇南的白龙江上的文县碧口水力发电站。

为了解决严重干旱问题，我们请专家研讨论证指挥设计并率领群众修建了景泰一条山、靖远、会宁、榆中桑园峡、三角城等黄河提灌工程，使几十万亩旱地变为稳产高产的绿洲。当时，兰州几个大的中央厂矿企业都把农场建在景泰一条山一带，有了水，那里变成了江南，这些企业也都纷纷解决了一部分农业户口的

家属的安置问题，这些家属都有种田的经验，把个一条山农场经营的有声有色，坐在火车上经过这一带时可以观赏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为了彻底改变兰州以北地区的干旱状况，我几次向周总理请示、向国务院报告，建议拨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浇灌秦王川百万亩旱地的浩大工程。为了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我几次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徒步到实地勘察，遗憾的是，当时因为经费、技术条件所限，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资源，我建议兰州发电机厂和水力涡轮厂生产中小型为主的发电机产品。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多生产中小型机，以满足陇南、陇东和河西地区的中小型发电提灌的需要，你们自己也解决了销路。后来，河西民乐县的两个中型水库，安装了几台中小型发电机组，解决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用电，群众很满意。

经过全省干部群众几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前，全省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到1970年达七十三亿斤，1975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大部分地区吃粮达到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我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年期间，我认为，我们甘肃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以及我们绝大多数的“支左”干部，工作是认真踏实的，态度是积极努力的，并且能吃苦、廉洁自律，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甘肃能做到油井出油，煤矿出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干部们是在努力地为人民工作吗？就连后来的省委书记宋平在1978年省党代会上也不得不承认：“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按照萧、韩时期兰州军区党委对我的“结论”的说法，十年来我们是在搞破坏，这就全盘否定和抹煞了我们甘肃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辛勤工作，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几年报纸广播大会小会狂轰滥炸，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甘肃省委也好，兰州军区也好，不工作的人没错，泡病号的人正确（说是抵制错误路线），而大多数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却错了。我想，我们党的事业、社会的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勤奋敬业、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实现。因此，我

们还是要讲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在任何时候，看任何事物，都要坚持这一原则。

甘肃中西部地区生活艰苦，风沙大，沙暴一起来人和车就被裹在沙涡中，稍一站不稳就会被刮倒，满脸满头满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张嘴就是一口沙，能见度往往只有五、六米。一个生产队与另一个生产队之间是大片的荒山秃岭，中午太阳烤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连草都没有一棵，人走过时只有被惊动的蜥蜴在戈壁上飞快地爬行。当时英国有个华裔女作家叫韩素音的，到我们中西部地区去搜集素材，来过好几次。她对我讲过，她第一次来时一下飞机就发出惊呼：“这里还能生存吗？”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省里和县里的干部要顶风冒沙，不顾酷暑严寒坚持深入基层，每年不少于四个月。那时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奖金，更不可能提高工资待遇，甚至有的基层干部为了省钱都自带干粮（有些带点土豆找锅煮煮当饭吃），没有人说过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要调动。

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人，他们是解放大西北时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几十年了，找了甘肃的老婆成了家，生了娃娃，算扎下了根，就象电影上说的，成了昆仑山上一棵草，风吹不倒，日晒不枯。这些资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还坚持在基层，很令人感动。

当干部的不但捞不到半点油水，有些需要应酬的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还有些县里的基层干部进城开会，为了节省开支自己背干粮吃。那时候当干部不长工资，但事情要办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席语录解决问题，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许多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当然有些少数败类除外）。这说明我们文革时期长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基层干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发扬了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我们军区派出的“三支两军”干部也大都象地方干部一样，他们无论是来自什么岗位（有些还是从原子弹发射基地来的，还有各个岗位上来的），对自己将要执行的任务都尽职尽责。“支左”人员刚一进点时，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坚决按照中央文件办事，想方设法制止武斗，苦口婆心将几派群众联合到一起，又以身作则搞“抓革命、促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学校，还是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油田、矿井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

我常常在想，这些干部好哇，真的是很朴实，很能吃苦。

1975年甘肃是最平静的一年，农村干劲十足，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销粮、第一次摘掉要回销粮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结论”上讲的，我们是在搞破坏，是在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哪里来的这个成绩呢？“结论”显然是把问题扩大化了。

在治理甘肃农业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没有向中央、国务院要过多少救济粮。当时我们的出发点是“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想方设法自己省内调济解决，现在反思起来，当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甘肃的农业问题是个历史难题，我们苦干了十年，问题解决了一些，粮食产量上去了一些，但这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也需要休养生息，因此适当向中央要求一些救济是必要的。

放不下的牵挂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乍一免职时，什么事都没有了，后来连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个局外人，猛然间谁都不需要你了，说个心里话，真还有点不适应。

人不工作了，心还是放不下，毕竟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还真割舍不下。天下雨了，我就高兴，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了。天旱的厉害，我就着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来讨饭了。天天关心天气预报，天天记在台历上，这已经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连我的儿女都说我，你又不工作了，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我说，习惯了。甘肃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讲，还得靠天吃饭，你不关心天气预报怎么能行呢？

从兰州到中川机场的几十里公路上，沿途都是盐碱地，我们沿公路两旁种上了树，但成活率很低，树死了，我们就组织人再种，一连种了三年。前两次我都亲自去看过，不知这第三次树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条山黄河提灌工程我们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戈壁上了水，有了树，有了草，有了庄稼，坐火车从北线走可以看见这一片沙漠绿洲。我免职前，省里已搞了个二期工程方案，已报请国务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级，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如果工程实现预期效果，那么腾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几十万

亩的旱涝保收稳产田了。可惜我没能亲自参加这一为甘肃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设，所幸的是，下一届省委圆满地将这个蓝图实现了，这也足以让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来我们曾组织人勘察过，我本人也多次去看过，我们还搞过一个方案报国务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开始抓了，但因为没有资金无法搞。现在从报纸上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抓了，这说明我们国家经济有了实力，有能力为老百姓办些事实了。这个工程将来完工后，肯定会为老百姓造福，是个子孙后代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还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转，就是我们修了不少水库，但水的利用率还有问题。你比如说修渠，甘肃的土地沙化的厉害，渠道的衬里就要有讲究，砌得不好，水流经渠道，有相当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发了，那就很可惜。

还有，最近我看电视，那个以色列的自然条件就和甘肃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好。他们浇地搞喷灌，我看这个很适合我们甘肃的情况，我们甘肃一个是缺水，一个是土地质量不好，水浇多了还容易盐碱化，因此，应该借鉴国外的喷灌方法，搞些长臂式的大型喷灌机，既节约了用水，又解决了土地盐碱化问题。

甘肃的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技术底子薄，技术人员缺乏。我们有一所农业大学，还有一些培养农业技术员的中专，但没有经济实力解决技术人员的待遇、房子等具体困难，致使一部分技术人材转业、流失。要想以科技治农，就要留住农业技术专家，改善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肃农业的工作中去。科技治农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人员就是实现这个途径的宝，所以要设法培养并能留住。

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秃岭，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建国以后，七任县委书记都认为“通渭没治”。

1976年，我曾去那里蹲点几个月，亲眼看到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基层干部与群众一起商量改变贫穷的具体措施。针对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无雨无收成，有雨冲成沟的特点，当时我们提出了植树种草、兴修水利，发展养殖业等十项措施，发动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为了调动广大农民治理荒山的积极性，我们还提出谁栽树谁受益的政策。为帮助通渭县尽快脱贫，我们还组织省委、省政府各部门派出工作组，结合自身业务进行具体帮助，对口支援。

说句心里话，解放那么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上，心中实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责：作为党的干部怎么向当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脱离贫困，和全省广大农民一起逐步过上好日子。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离开了领导岗位，事情来的很突然，对通渭的许诺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一些具体帮助也没有来得及落实，更无法亲自继续带领大家实现“治理通渭”的心愿，对不起通渭的广大父老乡亲。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会从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看到通渭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时，我会把酒遥祝那一方质朴、敦厚的农民兄弟们的！

甘肃的优势是重工业，能源充足，资源丰富，但交通困难，能源优势发挥不了。另外原料与加工能力不协调，国家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经常发生原料供应不足的情况，1974年我们搞过企业挖潜改造，兰化的产量翻了一番，当时康世恩同志还在兰化、兰炼开过现场会，推广过“两兰”挖潜改造经验。但是要彻底解决问题，除了搞企业挖潜外，兰化和兰炼以及西固热电厂应该尝试搞联合，可是这几个厂子上级主管单位不同，归几个部管，具体问题很多，一时半时联合不起来，寄希望于以后体制改革。

最近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一些工程相继完成了，有的是我们当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有的是后来的同志们新搞的项目，总之，都是造福甘肃人民的好事情。这些工程完成后，对甘肃的工业、农业以及人民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西北蕴藏着巨大的潜质，但她的开发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从解放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西北的开发还只是开了个头，路还要靠后来人一步一步地接着走，寄希望于后人。

近十来年都没有出门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总想到甘肃各地再走走，看看工厂又搞了些什么改造项目，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看看水渠还漏不漏水，看看树木成活了多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牵肠挂肚的，比自己的孩子还操心。老伴儿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讲，远的去不了，就到近处看看吧。她找车陪我上皋兰山看了看即将完工的兰山提灌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

“支左”十年，心系甘肃十年，我对甘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一份割舍不掉的牵挂，因为这里毕竟融入了我的心血，留下了我

的足迹。还记得 1974 年去酒钢解决问题，路上突遇暴雨，山洪引起泥石流，沿途社、队干部群众拦车劝阻不让再行，使我非常感动。因为酒钢的问题很急，所以当时我们也顾不上什么危险，在当地老百姓的带领下和护送下，和随行的几个同志硬是趟过洪水，赶往酒钢。1975 年我去天水视察，在翻越华家岭时，因公路积雪结冰，汽车打滑，随时有翻下深沟的危险。在险要地段，我和随行人员都下来推车，路过的老百姓都主动过来帮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但看到我们穿军装，推得是军车，知道是军队的干部。他们说，他们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军是帮助他们的，所以他们见解放军遇到困难也过来帮忙，这使我很受感动，好象又回到了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中。我当时想，解放那么多年了，甘肃的老百姓还生活的那么苦，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还是没有把他们从贫困中彻底解救出来，可他们见到我们这些干部摸样的遇到困难却能不顾严寒和危险主动前来帮忙，这说明了人民对党的干部是信任的，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为工作呢？

十年“支左”聊以自慰的是，我对这一片土地尽了责任，作了努力。尽管现在这里还很贫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但我会在这有生之年时刻关心着她，祝福着她，愿这片土地上人民安康、省富县强。

第四章：须要说清的一些问题

“油沙豆”及其他

导致我被免职的导火索是铁路问题，但 1977 年 6 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并没有把我和“四人帮”拉到一起，可后来事情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是萧华、韩先楚、宋平回到兰州后，便立即掀起了一场围剿洗恒汉的所谓“人民战争”。为了把我搞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他们完全不顾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而是采取了先扣帽子定性，后根据需要补充搜集材料，编织罪名。

当时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么揭发什么，哪怕是道听途说”，动员人们“翻箱倒柜”。在这样一种人为煽动、一哄而起的氛围下，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联合专案组给我罗列了一大堆所谓“洗恒汉投靠林彪、‘四人帮’，积极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证据”，并且在没有和我本人见面核对及签字的情况下上报中央，据此定罪。而正是凭着这些不实之词，给我拷上了“四人帮”代理人的枷锁。对此，除了让人深感痛心之外，还感到迷惑：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草菅人政治生命的做法居然还能畅通无阻？！

为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同时也对我自己几十年革命历史负责，对这些将我置于死地的所谓“罪证”，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

一、关于江青给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的问题。

1972 年 5、6 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了西北组的讨论。有一天她发言时，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几段。她发言后，大家建议，把毛主席这篇文章印发到会的同志，以便学习。她说：“我这份是政治局发的，将来还要收回去，印发恐怕不可能，你们要我可以让护士抄一份，你们传看。”第二天她来开会时，将抄件交给我（我是会议召集人），我就将这份抄件先给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出），而后一省一省的传阅，最后交我。会议结束后，江青也没有收回。因为不是大会秘书处发的文件，收文件的单子上没有提到这个手抄件，所以也没有交，秘书带回来了。回兰州后我告诉秘书交党办保存。这是作为公文处理的，并非是私人活动。

二、关于“四届人大时，江青送油沙豆”的问题。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快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各省到秘书处领取油沙豆种，说此豆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经济价值也很高。我的秘书陈文生也去领了，根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给我的。我们带回去后，交给农办要农科院试种。我还交代说，甘肃的传统油料胡麻油不能废弃。

三、同米士奇接触的问题。

1976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时，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来看我的秘书陈文生。我事先并不知道他来，他也未去我的房间。我只是有事到陈文生房间看见了他，寒暄了几句就走了。事后我问陈文生米士奇来干什么，陈说：“他要我给他代买一些中草药。”

四、“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乱点乱问”的情况。

1976年3月，中央“反右”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甘肃省也在其内。江青在会议上问到我，她先是问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哇。”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嘴巴没动，后来她补问：“冼恒汉，‘反右’好不好？”我说：“好嘛。”第二句问：“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我答：“有。有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大师傅。”第三句问：“甘肃形势怎样？”答：“还可以。”十二省（区）的同志都在场，都知道，可以查问。至于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我在省常委会也好，在其他会议也好，根本就没有传达过。

五、同胡炜的关系。

胡炜原是21军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由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指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室主任。我同胡炜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和礼节性的关系。文革期间我们每年都有几次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每次胡炜都来看望陕西的同志，同时也来看看我。我们在一起谈话主要是谈地方的事情，偶尔也说一些怪话。

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但他从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几次电话的内容是：

一次讲皮定均同志飞机失事遇难；

一次问军委工作组向仲华、徐立清何日动身来兰州；

一次毛主席逝世，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问韩先楚怎么还不回来；

还有一次是“四人帮”粉碎后，中央打招呼会议后，韩先楚回兰州才半个月，就又回北京了。韩说“301”让他回去，我说，我们都很忙，实在分不开身，他身体也不算太坏嘛，怎么又走了呢？是“301”真的追他回去？

我回忆就是这几次电话。

以上接触我认为完全是工作中的正常接触和礼节性的问题，如果把同志之间正常工作接触和纯属礼节性的来往也看成是政治问题，党内就没有正常生活了嘛。

至于胡炜是不是“四人帮”死党，从未见过中央的正式结论，但韩、萧在给 我的“结论”中却定性说：“冼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 1977 年 6 月 9 日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锋曾经问我：“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这个“另有渠道”的问题，象一块千斤巨石压在我的身上，使我苦恼了好几年，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

我在 1976 年 10 月 6 日甘肃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了二十几个“按既定方针办。”但那时我认为这个指示是真的，因此，就进行了宣传。根据是：

1976 年 8 月中旬，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两条指示，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有一条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茅林同志（省委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讲话精神时，还特意印发了一个书面汇报提纲，提纲中也写了“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这两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国内问题要注意”一条后面加：（现在只传达到这个范围，暂不向下传达。在这之前中央也发过电报，规定只传达到军）。这个汇报提纲当时常委每人发一份，原始稿、省委常委会会议纪要，可能还在，可以查，也可以向茅林调查。

此外，主席逝世后，《人民日报》9 月 16 日的社论，以及 9 月 18 日至 27 日共六期《国内内参》上大量报道这方面内容，要讲渠道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是我讲话的依据。

恰好我住在北京海运仓等待解决问题时，偶然看到中央办公厅 1981 年 31 号文件，内容是批华国锋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赵 Z 阳同志说：“我问我的秘书，

‘按既定方针办’怎样来的？”秘书说抄来的。华接着说：“是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需要。”当我看到这一段话时，我的心情骤然轻松下来，所谓“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交代”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

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这个历来以忠厚、老实著称的人，其实也会说假话，并以假话陷害人。我不禁想问一声，不顾党性原则，以权压人，这是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吗？另外，托辞用这句话同“四人帮”作斗争，你不觉得是自己底气不足吗？

七、1976年10月8日晚，孙殿甲同志告诉我，接北京给解放军报记者打来电话说“四人帮”已抓起来了。我第二天（9日）上午派陈文生到总院找高副政委来（因韩先楚不在，高是党委管党委常务工作的），说有个事要告诉他。高来后，我照孙殿甲同我谈的内容告诉高，我又说，如果是真的，中央总要开个会吧，不然总要发个文件吧。我们又扯了一下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分析，除上海、清华、北大可能要出一点事外，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军队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市场。后来有人揭发说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是什么宫廷政变，纯属造谣。

八、关于所谓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起哄”的问题。这个帽子是韩先楚强加到我的头上，还不如再拿回去戴到他自己头上更合适。

要说在庐山小组会议上起哄，在毛主席指出陈伯达错误之前，确实是有不少的同志。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下面工作，又不善钻营的人来讲，上层斗争的内幕，我们是不清楚的。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任国家主席，哪个不表个态拥护毛主席？韩先楚在华东组跳得更高，“哄”起得更凶。当时毛主席还不无惋惜地指出：多数中央委员都不懂一点唯物主义，而轻易就相信一些骗子的天才论。并指出要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委员中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人所共知的。

至于说我在西北组“起哄”，邓颖超同志和董必武同志都在西北组，这件事情他们最清楚，是当时最好的见证人。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下午我刚到会场，毛主席就叫我到他的住处开会。会上毛主席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三条：1、会议暂停；2、不提揪斗；3、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我回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留下。邓大姐、董老要走，我请他们留下，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冼恒汉带头起哄的问题。“9.13”之后

发的材料，林彪反党集团说“西北组温度不高”，这又如何解释呢？邓大姐还健在，可以请她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嘛。

九、1976年1月17日至2月17日，我在北京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2月18日回兰州，当天下午在省委常委（还有铁路局党委常委参加）的会上传达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精神时，是点了邓小平的名，这是事实，但这是经过解决郑州、兰州铁路问题的中央领导华国锋同意的。因为郑州和兰州参加会议的同志都问，回去传达时，如果有人问，右倾翻案是谁搞的，我们怎样回答？华国锋说，你们可以点名，这个事不久就要公开点名了。

十、给我罗列的所谓“罪名”里有一条是：据郭玉峰交代，王洪文向郭玉峰指名要冼恒汉到中央工作。还有马天水、王玉珍、徐景贤和刘湘屏等交代，说王洪文给他们讲冼恒汉如何好，工作如何踏实肯干等。这些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呢？这怎么能作为证据给人定罪呢？王洪文要调我到中央工作，中央谁也没有给我说过这个事，这是中央的事。就算是有这个事，也只是议论了一下，又没有真正调去，也算一条罪？那么已经去中央工作的人呢？该怎样说呢？另外中央还有不少老同志也说我的好话，这又怎样解释呢？

把这些我并不知道的事写到我的材料中，这是不公正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看问题嘛。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只承认事实，不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另外，什么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刘湘屏之流，我同这些人并不熟悉，有的还不认识，至于王洪文给他们散布冼恒汉的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情，由他们自己负责，同我毫无关系，更不应该写到我的材料上，作为给我定罪的依据。

讲到与“四人帮”勾结，什么叫勾结？勾结应该是指拉拉扯扯，搞非组织活动，你来我往，信来信往，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嘛。这些方面我都没有，怎么叫勾结呢？至于勾结起来进行反党活动，有什么事实呢？什么叫反党活动呢？拿《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能够上哪一条呢？“结论”上没有举出一个象样的事实来。

十几年来我反反复复地讲，我同“四人帮”并没有你来我往，信来信往，拉拉扯扯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他们并不熟悉，仅有的两次接触，一次是和王洪文吃饭，一次是庄则栋去甘肃，这也都是偶然发生的，这些我都不厌其烦地多次向

中央讲清楚了，何以叫“关系密切”呢？得到“四人帮”的“赏识和信任”，有什么事实呢？他们给了我什么呢？所以说，赏识和信任我的是党，有党的信任和支持，我才在兰州军区当了二十多年的政委。我当兰州军区政委时“四人帮”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至于当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也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的指示批准的。当时到北京研究班子时，我曾提议叫胡继宗搞，总理坚持要我搞，他说，大军区所在省，要一名同志挂帅。所以，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呢。

十一、“结论”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紧跟林彪、康生制造多起冤、假、错案”的问题。我首先要问，所谓“初期”是从何时算起？又到何时为止呢？如果“初期”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算起的话，那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还在甘肃农村蹲点搞社教呢！社教搞到10月，然后去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会议。北京回来后，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开始，一直到次年4月，这期间我失去人身自由，进入了挨批斗的角色。受迫害的应该是我，我又如何能去制造什么冤、假、错案呢？！

到是1966年9月3日，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汪锋被群众揪到七里河体育场批斗（当时我在天水农村社教），后到军区总医院治疗。萧华知道后，专门给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同志打电话说：“赶快要汪锋出来，他不能住在军队医院。”张达志同志打电话与我商量，我们都觉得不好给汪锋直接说，便拐了一个弯，通过地方的同志给汪锋说，后汪锋搬到七局医院。

十二、“结论”不但给我扣上“四人帮”亲信的帽子，而且还把我和“林彪反党集团”扯到一起，那就更不实事求是了。林彪反党集团以及黄、吴、李、邱等从来就不信任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曾从林彪同其死党的谈话记录中查出，林彪说：“兰州军区连一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要派一个人去。”结果派了XX任副司令员。这件事是纪登奎当面同高维嵩同志讲的，后中央召开的西北四省（区）和兰州军区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纪登奎也同我说起此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凡属比较重大的问题，都是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周总理曾当面同我们说过，各大军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兰州军区算是比较多的。我们从来就认为，除向毛主席、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报告情况外，不能也不应该向任何个人“通风报信”。

另外，前面讲过的潘继祖事件也足以说明问题。这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因为，对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毛主席、周总理是有态度的，是肯定的。因此，他们想公开的撤掉张、冼不可能，所以就通过潘继祖这样的人来制造突然事件，干掉张、冼，安插自己的亲信。当然，牺牲一个潘继祖，他（她）们是干得出来的。

高炮一师是属空军建制，归兰空领导和指挥，同大军区没有关系，更没有矛盾。潘继祖这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但他要下这样的毒手，干掉张、冼。吴法宪对潘继祖的所谓数年审讯，从来不给兰州军区透一点气。从这些情况看，不能不使人怀疑潘继祖的后台就是林彪、吴法宪。而“结论”却不顾这些事实，一味将我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人，这不符合事实，也难以让人信服！

十三、“结论”说甘肃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电中有“向江青同志表示慰问”的词句，从而“证明冼恒汉坚决效忠江青”。

唁电是省委发的，并不是冼恒汉发的，是宣传部起草，常委讨论同意的，怎能把这样的事挂到一个人身上呢？同时不少省（区）和大军区的唁电中也有这样的词句，这又如何解释呢？上海倒没有，能不能说上海同江青划清界限了呢？唁电中是把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家属来慰问的，怎么能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向江青表示效忠”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十四、所谓“在党的‘九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冼恒汉在西北组说：‘上面有个精神，对那些老右倾，既要选上又不能得票过多。’”的问题。

根据我的回忆，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代表不是编在西北组，而是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以及海军的代表编为一个代表团，曾思玉同志是代表团的召集人。有一天晚上，吴法宪、郭玉峰等人确实召集了由各代表团派出的代表开了一个会，甘肃省是胡继宗同志，兰州军区是高维嵩同志参加的。他们回来后，传达了“‘老右’既要选上，但又不能得票过多”的话，我听后说：“我要投全票，其他代表自己决定。”

庄则栋河西行

庄则栋这个人我并不熟悉，只是在北京开会时见过面，也没有说过话。晓得

他打乒乓球，是个世界冠军，名气很大。他来甘肃是宋平接待的。庄则栋当时是国家体委主任，因为甘肃的临泽县是个体育先进县，据说受陈锡联副总理指示，来甘肃调查研究体育工作并视察临泽这个体育先进县的。

庄则栋到兰州时，我并不在家，而是在河西走廊视察工作，是宋平当时接待的他。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视察体育工作，我在张掖，不见不好，让我接见他一下。

由于临泽是张掖地区的一个县，庄则栋看完临泽后就到张掖，我们安排在19军军部见了一面。当时庄则栋见了我就对我讲，是受陈锡联副总理的指示来视察体育工作的。我们在一起谈了我省体育工作方面的情况，我提出要他帮助我们在兰州修建一个体育馆，他没有答应，说现在体育要下放，不是在城市搞，而是要到农村去。

寒暄了一番后，庄说他到宁夏时听到些反映，说康健民同志派性大，班子不团结，要我出面帮助解决。我说：“我不能解决，因为他是宁夏第一书记，我是甘肃第一书记，他怎么能听我的呢？”庄说：“你是军区政委，康是副司令，怎么他不听呢？”我说：“那是两码事。”由于谈不拢，就不谈了，我们都出来看他打球。因为大家都慕其打乒乓球的盛名，所以安排打了一场球，吃了个中午饭，他就回临泽了。当时陪同和在场的有关同志很多。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次纯礼节性的交往，并且这次见面又是宋平交待办公厅给我的秘书打电话安排的，他不打电话，我是不会接见庄则栋的。现在宋平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却对我无限上纲上线，说什么“密谈”，什么给“四人帮”的心腹提供“炮弹”等等，可见这个人的品质。

我和庄则栋的这次会见，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另外庄则栋并不只是到了甘肃，他内蒙、宁夏、青海都去了，这件事在其他省（区）都不成为问题，唯独对冼恒汉就是问题，这是不公正的。

王洪文到房间来看我

和王洪文吃过一次饭的问题，是当年做为把我定成“四人帮”亲信的“重磅炸弹”。尽管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而且运动中我也向中央做了说明，但我还是要将当时的情况讲一下。

1974年中央开会时，当时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在看望了几个省的代表后路过我的房间，就顺便也进来看了看我。我和王洪文并不熟，可以说连工作关系都很少发生过，当年是总理做工作我们投了他的票，因此对这个人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并没有太多主观上的认可和信任。

王洪文来的时候，事先并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正要去食堂吃饭了。他进来后，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说：“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当时开会都是凭餐券吃饭，因为当时年继荣也在我房间，王洪文便叫服务员将三份饭送到我的房间，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说了几句话。饭是普通的会议份饭，很简单，吃完后我们各自向服务员交了自己的餐券。王洪文吃过饭后就走了，继续看望其他省（区）的代表。

至于我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我记忆不深，无非是些客套话，内容也没有出格，决不是象“结论”上强加的那样是“密谋”。当时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服务员自始至终都在旁边，这些都是可以调查清楚的。

王洪文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是中央领导，不能说谁与他一有接触就是参与了什么阴谋。再说我与王洪文平时工作中并没有什么来往，互相之间并不了解，他就是有什么“企图”也不会贸然跟我这个不摸底细的人“密谋”呀！况且我当时并看不上他这个年轻人，觉得他的能力不足以承担中央副主席的重任，对于王洪文担任中央副主席，除了周总理亲自做我们的工作外，叶剑英还有个公开的讲话，说什么王洪文当过兵、做过工、过过江、打过仗，是最理想的接班人，这个讲话是以中央正式文件转发的。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脱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看问题。

另外，对“四人帮”这几个人，我还是有戒备心的。我向中央反映我和韩先楚关系不好的问题时，我是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当时我是有意把王洪文排斥在外的。

以上的这几件事情，都是在工作中发生的很平常的正常接触，但韩先楚、萧华却硬把它作为我和“四人帮”关系的重要依据写进所谓“结论”中并据此定罪，我认为这是手段低劣的政治陷害。如果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我的炮弹将会多的多。

例如，1973年毛主席召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期间，江青曾把韩先楚

请到钓鱼台的住处一起喝酒、吃饭，并一同照了像。粉碎“四人帮”之后，韩先楚并没有向中央讲清楚。后来，中央查抄了江青的住所，韩先楚得知后怕他同江青的合影被抄出来对他不利，很着急，便在回兰州的飞机上，向我讲了这件事。我当时对韩讲：“你在北京开会时，这样的事为什么不给中央直接说？现在你给我说了，让我怎么办？”韩先楚说：“你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我向你说了，不也就是向党说了吗？”

还有韩先楚长期称病住在北京期间，曾几次陪王洪文去西山打猎，有时天黑了还出去打猎。为了方便王洪文晚上出猎，韩特意找人给王洪文打猎的汽车安装上了探照灯。这件事韩先楚在党的会议上也从未讲过。还是当时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在看到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的罪行材料的照片上，有王洪文打猎的汽车探照灯，便当作笑料对我讲：“那个探照灯是你们的司令员送给王洪文打兔子的礼品”，并诙谐地说：“有功劳啊！”

1976年冬，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时，李先念同志对我讲，韩先楚在武汉给他打电话，要求通过他给福建说一说，把已被福建抓起来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放了，被他顶了回去。韩先楚已经离开福建多年，还插手福建清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事情，那么韩先楚同志同“四人帮”的关系又作如何解释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把这些问题都算作是工作和生活中的正常交往，而把我那几件带偶然性和礼节性的接触都算作是“参与阴谋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党内生活还有什么实事求是？还有什么公正而言？我们判断是非的依据又是什么？难道原则可以随便因人而异吗？法在哪里？理又在哪里？

“结论”还说我：“冼恒汉免职受审查以来，对立情绪很大。”那么我反问一句，十几年来把我当成敌人来整，申诉无人管，辩白无人理，还要我不带一点情绪？如果这样搞的话，岂不是又回到王明路线统治全党时期的“肃反”了吗？

赵永夫事件

1967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群众”的号召。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

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24日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混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同时，省军区机关造反派也借势上街闹事，并在机关内部擅自将刘贤权软禁起来，不许他与外界接触，这实质上也就是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

刘贤权深感问题的严重，心急如焚，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来无法向中央军委交代。于是，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情况。但机要员将电报稿退回，称：“赵副司令不同意发”。

1月25日，兰州军区指示，不同意由军队接管“青海日报”社。省军区机关造反派认为是刘贤权报告的，于是以此为借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实际是将他关押起来。

1967年2月5日，赵永夫召集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出舆论说，“八一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枪，并以自己划线，将省军区领导都划成了“敌人”。

此时的赵永夫利令智昏，将自己封为青海省军区第一把手。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上由他宣布撤消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正式关押。他的这一切活动，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

这里还要说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第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现在，省军区的机关造反派也加入了进去，致使局面更加复杂混乱。杨植霖、王昭看到形势严重，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便先后借故离开了西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赵永夫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又改变

了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不满，每天都开着宣传车到省军区大院门口叫骂，赵永夫对此十分恼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社有林彪漫画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要军事接管报社。

由于赵永夫请示兰州军区遭拒绝，便擅自派出部队强行进入报社进行接管，激化了“八一八”群众的对立情绪，相互形成对峙。赵永夫再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赵永夫十分不满，派出副司令刘 XX 率领十几名机关造反派，连夜到兰州军区办公楼绝食静坐，胁迫还困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张达志撤消不同意他们军事接管报社的批示。

尽管当时我和张达志同志自身处境还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坚决表态：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更不能强行进入报社，并且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 XX 等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返回青海，向赵永夫汇报。赵永夫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 2 月 23 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23 日下午 1 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 1967 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将赵永夫、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在西宁，赵永夫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见一支枪。

赵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组织，在西宁市进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宁，到兰州和北京反映真实情况。

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付武装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3月29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下：

- 1、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
- 2、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 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查，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
- 4、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周总理同我、康健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同志一一握手。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研究安排了青海省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同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们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此事不了了之。

1976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江霖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帅的尊严。在1977年6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话”，“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萧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叹

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下一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州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

青铜峡事件

关于青铜峡事件的问题，因为事情牵涉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一直不愿意在其他场合讲。既然“结论”一再把我和康生挂在一起，我也不得不把事情真相讲清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这是我回忆他们报告的大意，在此之前，徐洪学同志曾电话讲过上述内容，我让他正式报告军区）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军区的工作由张达志同志主管，支左工作由我主管。

后来查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接到六十二师的详细报告，我们对此情况还并不是十分清楚。

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这样，我又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会开会，由于是夜里，就通知大家到我家里集中。会上大家分析了情况，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大意）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呈上启下是军区的责任，至于以后部队是怎样执行的，因为有别的领导同志专门负责，我主要精力放在甘肃地方上，没有再具体过问。

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结论”上说，我还通过秘书和值班参谋指示六十二师前指具体怎么打，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历来不管这些具体事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是通过司令员、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去办，或他们找我商量去办，我怎么可能会让秘书、参谋去指挥部队呢？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汇报甘肃问题时，周总理主持“碰头会议”正在接见宁夏代表团。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叫我去参加，我去的时候，接见快结束了，总理正在讲话，我向总理报告说我来了，总理指了个座位叫我坐下。

总理讲话后，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最后总理指示让我讲话，我推托说，总理已经作了重要指示，我没有啥讲的。总理第二次又让我讲，我看不好再推托，即按总理指示的精神说了几句，具体讲的啥我也记不清了。好在这次会上所有人讲的话都录了音，凡是我讲的，我都认帐。在那个情况下，我肯定会讲错话的。

“结论”上说我是陪同康生接见宁夏代表团，这完全不是事实。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早已作了调查并平了反，平反文件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 001565》）

上述情况，我是在总理指示下，按正常工作程序办的，“结论”说我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康生当时只是代表中央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们中央同意兰州军区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如果这就叫勾结，那也太简单化了吧。

钱信莎事件

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1968年毕业分配来兰州军区驻青海西宁市第四医院工作。

分配来不久，总后勤部有一个叫陈昌洪的干部率领两个人，持有当时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亲笔批示的介绍信来兰州军区，说有重要问题要向军区主要领导当面直接汇报。因我当时地方上“支左”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就由张达志司令员和政治部副主任李樾接待，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陈昌洪在汇报中说，第四医院的钱信莎有重大问题，要求兰州军区派人派车协助他们把钱信莎从青海抓来兰州关押。并说，案情的审查完全由他们负责，兰州军区只负责派人看管，不能让死了、跑了，也不准问及案情。

按照他们的要求，军区在招待所安排了他们的住宿，并立即派人派车协助他们连夜到西宁四医院把钱信莎押解来兰州，关押在军区看守所，并抽派女同志专事看管，由陈昌洪他们开始对钱的审讯。

由于陈昌洪一行人在审讯过程中搞了不少逼供行为，并明显有打骂、虐待等发生，致使钱信莎对立和抵触情绪很大。对此，看管人员向军区有关领导作了反映，有关领导对陈昌洪等人的做法也提出过意见，请他们注意政策。但因为他们是上面派来的，对军区领导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还认为是“同情反革命”。

经过半年多审讯，陈昌洪一行回北京向军委办事组汇报。

1970年初，专案人员又带着黄永胜等人的亲笔批示从北京来到兰州，要把钱信莎案交给兰州军区负责审理，理由是“钱信莎是兰州军区的人”，但又说“钱

案”中有涉及中央领导的材料，为了保密，案情和档案材料全部带回北京，不移交兰州军区。我们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对他们这种作法感到困惑不解，表示不愿接受这个案件，理由是，事情发生在二医大，前段由总后专案组审查，兰州军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请他们向军委办事组反映这个意见。于是，他们返回北京汇报。

再次来兰州时，他们带来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批示件，坚决将此案移交兰州军区，除一般性材料留下外，“核心”材料仍不移交，并且不准留下军委办事组的所有批件。对此，军区有关负责同志产生了怀疑，觉得军委办事组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怕将来一旦出事说不清楚，便坚决要求他们将详细案情移交清楚，并将军委办事组的批件留下，否则，军区坚决不接收。

陈昌洪等专案人员见军区态度如此坚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将案件作了一般性介绍，并将所介绍内容的有关档案材料留下，至于军委办事组批示件只同意给留下复印件，原件仍要带回北京。

经过反复争论和协商，军区只接受对他们所移交案情材料有关内容进行核查，其它问题军区一概不加过问，最后的定案处理由军委办事组审查决定。就这样，在以军委办事组名义的高压下，兰州军区不得不将“钱信莎案件”接收下来，组成了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成克仁为组长的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对移交的材料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作了调查核实，但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更没有涉及到什么有关“军委领导”的问题。在讯问中军区专案组没有发生逼供现象，这一点钱信莎本人也承认。

几个月后，军委办事组多次催要军区上报材料，并几次电话说明军委办事组领导同志的意见，要我们以军区党委名义，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报军委办事组。军区党委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根本不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她虽有些错误，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极左”的过火行为，构不成“反革命”罪，更不能以兰州军区党委名义向上写这样的定性报告。

军区专案组电话向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讲明兰州军区党委的意见后，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答复：军委办事组领导不同意，坚持要按“现行反革命”定罪，并以军区党委名义书面正式上报。在此压力下，我们无奈，只得写报告，但在报告开头明确写上了：“按照军委办事组首长指示，将钱信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军委办事组，是否适当，请审定批示”。这个报告送上去后，一直没有批复。

1971年“9.13”前几天，陈昌洪等人又突然来兰州，对军区的报告只字未提，只说要将“钱案”收回，由他们自己负责审查，并要组成“联合审查组”，由总政、总后、二医大、兰州军区派人参加，由总后负责。军区对他们收回“钱案”表示欢迎，觉得松了一口气。并提出不派人参加“联合审查组”，因为不了解情况，参加了也不起什么作用，总之是想尽快摆脱此事。

正在同总后来人协商之际，还未正式办理“钱案”移交手续，“9.13”事件发生，黄永胜等人也被抓起来了，北京来人匆忙返回，从此，“钱案”再无人过问。

“9.13”后，我们军区几个常委在一起讨论，都觉得“钱信莎案件”从始至终都是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军委办事组名义一手操纵审查的，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阴谋，但背景到底是什么不清楚。现在黄永胜既然倒台了，就立即向军委写报告，建议解除对钱信莎的关押。

报告送上去后还未等批复，军区就先将钱信莎释放，改为办“学习班”，并向她传达了林彪事件和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的情况，让她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军委的批示。但不知什么原因，军委一直没有批复。这样，一直等到11月初，军区见上边迟迟没有动静，便自行决定完全恢复了钱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医院工作。

“钱信莎事件”是“结论”硬强加给我的所谓“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恶毒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的依据。那么，一个二医大学生的事件和以上罪名又有什么联系呢？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叶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

利用“钱信莎事件”硬强加于我一个“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既叶剑英同志的罪名，这未免有些太牵强并太不实事求是了吧。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钱案”是兰州军区被迫接受的，并且只负责审查其中的“一般案情”部分。至于黄永胜等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要通过钱信莎整谁？他们始终未向兰州军区透的底。

对于“钱案”，我和张达志同志以及军区其他有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并千方百计进行抵制，但无济于事，因为，作为下级的兰州军区来讲，毕竟顶不住上级用军委名义强压下来的指示，我想，兰州军区党办和军委有关机要部门应该还保留有当时的多次往来电话记录以及有关的上报材料和备忘录，这些都是有

据可查的；第二，我们确实谁都不知道钱信莎是叶帅亲戚这一背景，那么，被迫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把矛头指向叶剑英元帅，这个结论未免下的太武断了吧！

曾作过总政主任的萧华应该很清楚，我们党内斗争各种不同时期都有中央的犯人押解到基层看管，兰州军区条件艰苦，地处边疆，更是如此。这些上面来的犯人，我们只有配合派人看管的义务，根本没有过问的权力，有很多人从来到走，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萧华做总政主任时期我们这里也来过总政的犯人，难道这也要由我们负责？都要记到我们帐上？

“钱信莎事件”是“文革”中无数个案件之一，但这并不是我造成的，也没有兰州军区的责任。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韩先楚和萧华，说话办事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既然“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思想已经得到统一，我们党也结束了“文革”，那么，利用混乱年代所造成的混乱事端又来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那岂不更是错上加错吗？

“钱信莎事件”，不把罪责挂到林彪反党集团头上，反而挂到兰州军区和我的头上，这岂不是本末倒置、是非颠倒了了吗？这岂不是告诉大家，林彪反党集团抓人无罪，而我们释放了人倒有罪了？这不是等于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立场上，帮助黄、吴、李、邱开脱罪责吗？

“钱信莎案”，实际上是邱会作搞的打击报复，但是萧华、韩先楚却将“钱案”作为所谓“冼家帮”要“阴谋陷害敬爱的叶副主席”的主要罪证写在“结论”里，以此来挑唆激怒叶剑英元帅对我的不满。

是否有一个“冼家帮”？

所谓“以冼恒汉为首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即“冼家帮”纯属是萧华、韩先楚凭空捏造出来的，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还曾被冠以一个副词：“壳壳很硬”。由于这个杜撰的“冼家帮”，使得兰州军区和西北地区有成千上万的干部被结束了政治生命，长期不分配工作，普遍得不到信任，在年富力强的年华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我多年来曾给中央及有关领导写了无数封信和申诉材料，但都没有回音，因此，在这里我要谈谈这个问题。

兰州军区的干部大都是解放大西北时第一野战军的指战员，这些同志中有参

加长征从祖国的南方到祖国的大西北的老红军；有来自陕甘宁的刘志丹部陕北红军；有晋察冀的抗日战士；还有大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和各路知识青年。

这些同志随一野的各个兵团在解放大西北的炮火声中撒遍了浩瀚大西北的各个城市、乡村、草原、荒漠、戈壁。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或继续留在部队镇守边疆，或转业地方参加建设大西北的工作，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喜欢吃大米的、喜欢吃馒头的，统统都毫无怨言“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不仅能征善战，在建设时期也同样能吃苦耐劳，衷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在这片黄土高原上。他们都找了西北的婆姨，在西北生孩子、过日子，几十年了，把自己的青年、壮年、老年以及子孙都无私奉献给了大西北。这些同志，构成了我们兰州军区机关和部队以及西北地区各地方早期干部的基本队伍。

还有比例不小的干部是解放后几十年来从全国各个地区陆续调来的同志，他们为了党的事业，服从组织调动，来到祖国大西北这个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作出了巨大成绩。

无论是什么时期、什么地区来的干部，大家都团结一致努力为党工作着。我们对这些干部也从不分彼此厚薄，在推荐选拔使用任命上一视同仁，搞五湖四海。

在我们军区领导中就有不少从其他各军区调来的干部，例如孔 XX、张 XX、张 X、卜 XX 等，我们按照总政的意见对他们均委以重任，都交给了很重要的工作，并没有薄待他们。

不仅是军区机关、部队，地方也如此。例如宋平同志原来在陕西长期靠边站，不被任用，我专程到西安将他要到甘肃并重用他全面负责省生产指挥部的工作，以后又是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省委书记等。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我们的干部是做什么工作，都是经组织部门严格考察报审和党委集体讨论研究的，很多干部过去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熟悉他们，是革命需要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干部队伍没有什么“山头、宗派、圈圈、摊摊”等，我们是秉公办事，五湖四海。

根据工作的分工，无论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下级，和有的同志接触可能多一些，但我们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这个人办事较原则，平时很少私人交往，不熟悉我的人都说我生性孤僻，有些“怕”我。我在工作范围内没有“山头”，

生活圈子里不搞“裙带”，因此，更没有什么“帮派活动”和“私下交易”，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党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是会议一完当天就走，从不逗留，更不到任何上级和朋友家串门、应酬。我解放以后几十年一直在西北地区工作，对中央上层斗争内幕以及党内各种矛盾消息闭塞，信息知之甚少，加之我是一个军人，从不思钻营，工作中信奉的是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以及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们的无限信任和敬仰。我作官为人，对上不给自己找靠山，对下不给自己拉山头。在我任职期间，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封过官许过愿，也不记得有什么干部找我要过官和权。我一生鄙视不正之风，一生对党问心无愧。既然不谋私利，何来“帮派”而言？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是到马克思那里去，也是可以拍胸脯的。

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单位，总是有一些干部到的早一些，有一些干部到的晚一些，有的呆得时间长一些，有的呆得时间短一些，这是客观存在，也是历史形成的嘛。哪个单位都是这种情况，今后也还是这样的。所以不能主观的没有根据的认为，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长的，就一定是要搞山头，搞宗派，搞帮派体系。我们一贯认为，不管那里来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应该有彼此之分。我在兰州军区任政委二十二年，我认为军区党委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五湖四海的，军区干部队伍总的来说是团结统一的，没有什么山头，没有什么宗派，没有亲疏之分，也不存在什么排外问题。

在“结论”中给我强行划定的所谓“冼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关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加“支左”的人员。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冼家帮”而受到批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这些同志和我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其中的绝大部分我根本就不认识，更没有直接的工作交往。他们被定为“冼家帮”亲信、骨干后，统统被关押审查，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官”，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

例如，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

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边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同志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政委宋长庚“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对于蔺进生同志和曾给我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则更是不放过，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换班。

对于划入所谓“洗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同志，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出过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洗家帮”的运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1985年含冤过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同志，军区副司令员，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我们党的优秀儿子，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就因为萧华、韩先楚人为制造的“洗家帮”冤狱，使他们被打入另册，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这些同志都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战友、部下，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私利的交易，更没有不正常的非组织结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是经得起组织任何考查的。如果一定要说“帮派”的话，那我们都属于共产党、毛泽东这个“帮派”，

除此而外，别无他属！

对于“结论”中几个强加于我的所谓搞“冼家帮”的“罪证”，我有必要说清楚，还事物以本来面貌。

一、所谓 1974 年 9 月背着党委诬告韩先楚的问题。1974 年 8 月中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会议主要听取那些上林彪贼船的人的检讨，韩先楚是其中之一。会议完后，我们遵照中央规定，召集军区常委及各省（区）第一书记（或组织工作的书记）传达。讨论时张 X 首先发言，说韩检讨不好，到会同志也都有这个感觉。会议完后，党办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电报，我签发了这个报告。因为我主要是主持地方工作，报告送来我也没有问其他常委们是否都看了，只是看报告是反映会议情况，而且是符合会议精神的，我就签发了，怎么叫诬告呢？我第一书记不能签发报告？可以把电报同会议记录对照对照嘛。

二、所谓背着党委在西安召集 21、47 军领导传达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精神的问题。

一个政委不能在下面找一些同志谈话，一找谈话就扣上“背着党委”的大帽子，我军从来也没有这样搞过。

我在西安找 21、47 军的同志来谈一谈，并不是开会。找他们来谈是出于这样的愿望的，即在十次路线斗争中，21 军刘江亭、47 军刘凌等是有错误的，据反映两军都对他们老是揪住不放，同时 47 军对广州军区有很大意见，批林批孔时，据说他们准备给广州送大字报。为此，我给他们谈这次中央召开的会议，对犯错误的同志如何宽大，以及毛主席指示中对广州有一段话，这样纠正他们对犯错误同志的做法，不要总揪住不放，另外，缓和 47 军和广州军区的紧张关系。我的动机就是这样一个目的，而没有别的什么。

三、1975 年 8 月，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韩先楚和张 X 在各组大讲特讲兰州军区有宗派、山头、排外，等等。他们都是党委书记和常委，但他们又不在常委会上提出来，而是到下面大肆地讲，并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会内会外（军区机关）反映强烈，对团结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逼着我在作总结之后，不能不讲一点个人意见。我个人的发言，我认为是正确的，从头至尾都是讲一个团结问题。

四、“批林批孔”，说我把矛头指向老干部，指向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就

是老干部，老干部就是韩先楚，我们就不算老干部？有人贴了几张大字报，就叫矛头指向韩？我的大字报比他多得多，怎样解释呢？在福建省、福州军区，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还上福州军区小报，那又怎样说呢？很多大字报、小字报转到兰州，我都指示扣下，不予理睬，兰州不管福州的事情，我是保他呢还是将矛头指向他呢？

第五章：矛盾由来

来了新搭档

1973年12月，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对全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与我工作上合作很好，同时也很受广大干部拥护、深孚众望的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当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则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中央的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和我们这些新搭档一起分别照了像，并语重心长嘱咐大家要团结一致，努力把工作搞好。与我和韩先楚照像时，毛主席特别指着我对韩先楚说：“冼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兰州后，可不要欺负他呀！”我们听了都哈哈一笑，认为是主席开玩笑。

12月，我奉命去福州亲自接韩先楚来兰州上任，当时的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曾私下对我说：“我把一个瘟神给你送去了，你可要当心啊！”我心想没那么严重吧？听过后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韩先楚这个人我不太熟悉，因为从来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他在战争年代是很有名气的，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一直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根据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执行了对福建省的“支左”任务。因此，他实际上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以及党委第一书记。党、政、军大权在握，集四个第一于一身的“福建王”。

兰州军区是一个条件艰苦的军区，地处西北，自然环境恶劣。干部基本上都是解放大西北时一野的同志，还有后来调入的一些干部。这些同志长期工作、生活在西北，世面见得少，还是延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显得“土”一些。我们过去的司令员张达志同志也很“抠”，尽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生怕多花国家一分钱。后来皮定均同志来了，皮司令也是这个作风。因此，到我免职的时候，我们兰州军区已给国家节约军费将近一个亿。后来的领导盖新的司令部办公大楼用的就是这笔钱。

韩先楚调来兰州军区后，只保留了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头衔，其余的三个第一都没有了。再加上西北地区比福建沿海环境要艰苦得多，战略地位也没有福州军

区重要，气候恶劣，部队又少，因此，他是带着一肚子牢骚来上任的。

初到伊始，韩先楚便嫌兰州军区“土包子”，房子不好，门前的树象烈士陵园，喝的水不卫生，宿舍里没有配备电冰箱、彩电等，弄得我们管理局的同志好一通忙乎：把树移走；专门派几个战士每天到五泉山给司令员背泉水喝；赶紧配备电冰箱。管理局的同志觉得光给司令员配冰箱不合适，于是，给我家也搬来了一台，我家里从此也第一次用上了电冰箱，我记得是沈阳出的单开门的，不知是什么牌子。管理局的同志私下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首长。”

生活上的问题好解决，工作上的分歧也随即而来了。

这里还要讲一个历史的问题。一是韩先楚在福州“支左”时，曾支持打砸抢分子陈佳忠，这个人搞武斗很凶，打倒了一大批领导干部，1974年中央还专门为此发了解决福建问题的第九号文件，特别指出和批评了韩先楚在福建工作时的错误，为此，他很不满意，曾去问过李先念，九号文件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李先念对他讲：“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参加了中央的讨论，也举手赞成了的。你怀疑是‘四人帮’搞的，恐怕没有多少根据，这是个对中央的态度问题。”把韩顶了回去。

二是韩先楚与林彪关系密切，在福建他曾支持周赤萍出版了为林彪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9.13”以后，毛主席召开中央会议，在会上亲自点过他的名，在林彪事件上犯错误的几个大军区领导进行检查，韩先楚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这些，他总觉得把他这样一位历史上有战功的上将调来这个“鬼地方”当司令员，实在是大材小用，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他不信任、不重用。因此，韩先楚调来兰州后，就以身体不适应西北地区为名，长期住在北京或外地看病休养，从来没有象张达志、皮定均那样扎扎实实抓过工作。实际上从1973年底到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之前的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兰州呆的时间还不到两年。

当然，韩先楚在兰州时，也曾下过几次部队检查工作，也亲自勘察过部队的战场设置和边防建设。军区广大的指战员也慕其过去战功显赫的名声，殷切希望他能象前两任司令员张达志、皮定均那样，对工作提出指导性宝贵意见。但韩先楚却不是这样，他走到哪里，指责到哪里，这也不对，那也错误，全盘否定兰州

军区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院的绿化，全部都不对头了，全都要改过来，甚至是中央军委定下的问题，都要改变过来，要按他的意见办才对。

说个老实话，兰州军区自 1955 年成立以来，我和张达志、皮定均两任司令员以及军区其他领导都一贯非常重视战备工作，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各总部在各个时期的作战部署和有关作战命令、指示。军委和总参每次作战会议，我们都召开专门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会上将毛主席、周总理和各位帅的有关作战理论、方针、原则和指示不走样的印发，组织与会同志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并结合本军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落实的措施，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

在兰州军区成立的二十几年中，我们无论是在五十年代平息青海、甘南藏民暴乱，还是在 59 年平息西藏达赖喇嘛叛乱，以及 1962 年解决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我们军区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表彰和嘉奖。60 年代中苏论战激烈，兰州军区的战略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大后方”一变成“反修前线”。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的防务十分重视，赋予军区的作战和战备任务十分繁重。

1966 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很不放心西北地区防御战备情况，特派周总理率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委廖汉生以及我和张达志同志一同视察了新疆、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的战备情况，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三大军区共同商定了作战部署方案，报经毛主席批准实施。在以后的设防重点、部队部署、战场设置以及国防工程施工等方面，兰州军区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人烟稀少的戈壁滩上，经过五、六年极其艰苦的工作，有的同志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花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材，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的状态。

而韩先楚到兰州后，只是坐飞机在空中盘旋观看了一下，便武断地指责，这样的设防是“胡闹”，要改变原有的所有设防，并向总参、军委报告。总参、军委明确指示：“不能改变原方案，如需作个别调整，可报意见。”韩先楚对别人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对总参谋部的指示置之不理，未经总参同意，擅自调换设防部队。总参得知后，对军区提出批评，韩却借“治病”外出不归，把他一手制造

的矛盾甩给别人。

有些同志对我讲，韩先楚是上将，在福州是“四个第一”，来兰州后，三个“第一”没有了，又在中将的领导之下，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不服气。对于这些同志的提醒，我都告诉他们，不要随便揣测别人，韩司令员资格很老、水平很高、功劳很大，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很多地方很多。至于我在兰州军区任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以及省革委会主任等，那是中央定的，我个人并不想要这“四个第一”。

上书毛主席

韩先楚在福建长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到兰州军区来很不习惯。对于他的一些作法，军区的部分干部有看法，我个人也觉得他有些“霸气”。但作为党委第一书记，我的原则是大局为重，团结为上，首先要维护韩司令员的威信，工作中要尊重他的意见，尽量求大同、存小异，减少分歧。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韩先楚任福建省党政一把手七年多，他也积极贯彻了“文革”的那一套，给福建省造成的危害和破坏也不小。他支持全国有名的打砸抢头子陈佳忠，打击迫害了福建省和福州军区一大批干部，逼死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等，比起甘肃省和兰州军区来，他在福建的所作所为要严重得多。福建省和福州军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反映强烈，在他调走后，给兰州军区寄了不少小字报和揭发材料，还有人专程到兰州来反映和去北京上访。党办告诉我，问怎么办？我说：“一律扣住，不要散发出去。福州的事情我们不管。”有意识保护了他。

韩先楚还利用各种场合无中生有地到处散布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派”、有“圈圈”、有“摊摊”、“排挤外来干部”、“对外来干部不信任、不重用”等。他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各种场合乱讲，结果造成干部之间的不团结以至相互猜疑。由于兰州军区二十多年来领导班子一直比较安定团结，这种破坏组织原则的事情军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令人感到吃惊并且反感。还例如在有的大会上，韩先楚事先不打任何招呼便突然大谈军区存在“山头”“宗派”等，搞得许多基层的同志不知所措，纷纷问回去如何传达？我只好给大家解释，要正确理解韩司令的讲话精神，给他打圆场。

韩先楚的霸道作风还反映在日常工作中，比如，有些事情很急，军委和总政催着要报，由于他长期在外地养病不归，军区党委集体讨论通过后电话或电报征求他的意见，他又不讲，可事后却大发脾气说：“我又没有死！”等等。

在韩先楚等的干扰和发难的情况下，军区机关、部队很多正常工作难以开展和进行。军区几个原领导也将精力放在时时、事事提防韩抓辫子、找岔子和穿小鞋上，不敢全力抓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和机关的几个领导同志多次向我反映，我对此情形也十分为难和焦虑。韩先楚是司令员，对他的做法我实在不好说什么，更不便出面处理。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于1975年9月向党中央、毛主席、叶、邓副主席写信报告了韩先楚来兰州后的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军委帮助解决。

当时毛主席看了报告后，委托叶剑英副主席解决。叶帅给我打了电话：“你的报告毛主席已看了，要由军委派人去帮助处理。”

1975年12月，经毛主席批准，由军委派出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的庞大的工作组，以检查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名义来到兰州军区进行调查，协助解决。

工作组来了后，找当时的军区领导和各大部主要领导逐个进行谈话，并找了一大批二级部长和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觉得双方认识和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难消除和解决。所以，直到工作组返京，都没有同军区领导坐在一起，面对面谈问题，进行调解，更没有明确表态，指明谁是谁非。只是说回北京后向军委报告，听候军委指示。直到1977年我免职，长达近两年时间，也未见中央军委对此有任何一点指示和说法。这样兴师动众一番，最后弄了个不了了之。韩先楚自此后更加我行我素，不把军区任何领导放在眼里。

“谈心会”始末

关于谈心会的问题，我认为军区党委常委开个谈心会，完全是党内正常生活，并且是韩先楚提议召开的这个会，也是他和我共同主持召开的。

1976年7月30日，我从农村视察工作回来，晚上我去看郭鹏，郭说韩司令身体不好，我说明天去看他。第二天我去看韩时，韩先楚提出要召开常委谈心会，我当时表示，现在谈恐怕时机不成熟，谈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谈不好还会引起

新的矛盾。但韩先楚态度很坚决，坚持要立即开，我也不便坚持，只好同意。

8月4日起至11日，我们兰州军区党委召开了常委和军区顾问参加的谈心会。会上，我是本着交心通气、消除误会、寻求团结的精神，讲了自己的意见，也对韩先楚的一些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评。别的常委和顾问也都发了言，也有给我提意见的，也有对韩先楚提出意见的。但韩先楚在听了大家的批评后却很不高兴，他在会上既不交心，也不做一点自我批评，只是表示要保留意见，但会后却到处讲说我是借谈心会故意整他。结果根本谈不拢，谈心会开了个不欢而散，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众所周知，谈心会并不是我要召开的，当时我还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开会时机并不成熟，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而正是韩先楚自己的极力坚持才召开的，怎么能说是我召开谈心会有意整韩先楚呢？参加谈心会的很多同志都还在，会议的记录应该还保存在党办，这些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讲话呢？

我在会上对韩先楚提出的意见，主要是工作上的矛盾，特别是他曾经说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派、排外等。他的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下面到处讲，我对他的这些说法和搞法是不满意的（对此，我还以个人名义向毛主席、叶、邓副主席写信反映，请求中央调查解决）。

按照中央规定，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决定，把每个人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由个人审阅后上报中央军委。可会后，韩先楚又迟迟不愿意上报，但同时却又违背党的纪律，私自把党委会记录拿到北京、武汉去，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不断向军委某些领导吹风、打“小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高维嵩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反映谈心会情况。他的秘书拿给我念时，我是表示同意的。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党中央发出了一级紧急战备命令，明确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昼夜坚守工作岗位，以防不测。当时韩先楚正在北京。军区接到中央电令后，我当即指示参谋长马友里打电话向韩报告，请他尽快返回兰州坐镇指挥，部署军区部队的战备工作。可是韩先楚却在电话中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天不会塌下来。家里不是有那么多领导吗！为什么非要让我回去不可？我不回去，请别人代理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只好由当时分管作战的李书茂副司令员组织机关作了传达部署。

可是，1977年7月兰州军区党委四届六次全委会上韩先楚在总结发言中却

反咬一口说：“……尤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时，中央发出一级战备命令，他们（指冼恒汉、高维嵩、李书茂）竟延误了几个小时不传达、不部署。”并将此事作为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战备工作”的罪状。

关于我和韩先楚之间工作上的矛盾，到北京开会时，也曾向当时主管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作过汇报。当时叶帅并没有表态，只是说：“你们两个是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说怎么办？”我当即表示我愿意调走，叶剑英还给我做工作说：“你在兰州时间长，情况熟悉，身体也不错，还是不考虑调走吧。”

中央派来了萧华

1977年4月，中央军委突然任命萧华来兰州军区任政治委员。在下达任职命令之前，军委、总政没有象通常那样给我们打招呼、通气，也没有征求过意见、说明意图。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非常敏感的时期，这是很能引起人们猜测的。

我本人也弄不懂上面是什么意图？我还曾经为此打电话请示过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问中央军委调萧华来兰州军区任政委，上面有何考虑？由于他曾当过总政主任，来后位置如何摆法？得到的共同答案是：“因为你的主要精力是抓甘肃地方工作，调萧华去是为了加强军区领导力量，没有什么别的考虑。至于到兰州后的位置摆法，按先来后到，你为第一，他为第二，协助你抓好军区部队工作。”

萧华来兰州后，也多次对我讲，他是调来协助我抓好军区部队工作的，他来第一没有带什么人的指示，第二没有什么框框，是“协助冼政委工作的，”并说对此感到很高兴等。

但是萧华来了以后，却并不是象他所宣称的那样，而是象一位钦差大臣。他把架子端得很高，在并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对军区的工作多方指责，并明确表示兰州军区领导对清查“四人帮”工作很不重视，抓得很不得力。还煞有介事地说，有人在“捂盖子、保自己”。由于他曾任过总政主任，我对他比较尊重的，但是他下车伊始，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兰州军区主要领导怕联系实际，怕揭深揭透等，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给我们的清查工作定了“框框”，“要密切结合军区实际情况”，集中揭发军区主要领导与“四人帮”的关系。

1977年4月下旬，军区召开了师及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中央关于清查“四人帮”阴谋活动罪行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部署对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工作。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刚刚调来还不满半个月的萧华和韩先楚联合起来，首先转移会议方向，既不揭批“四人帮”罪行，也不研究对团以下部队如何进行正面教育问题，而是带头对我搞突然袭击，煽动大家集中揭发我与“四人帮”的关系。由于没有揭发出什么问题来，他们又要求与会的每个人亮相，表明态度。

当时会议上对他们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副司令员李书茂、杜绍三，军区顾问组长郭鹏，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孙殿甲，副主任李世祥，后勤部政委齐振兴，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青海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政委宋长庚，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等同志，在后来的清查运动中，无一例外受到打击迫害，统统被定为所谓“洗家帮”的主要核心或骨干、亲信，先免职后审查，有的则被关押。

萧华这个人原来作过总政主任，在工作上他是我的上级，我对他一直都是很尊重的，我和他的关系完全是工作上的接触，没有私人交往，更没有掺杂任何个人恩怨在里面。对于他搞“莫须有”，一定要把我整成所谓“洗家帮”并以此为借口整掉了一大批干部的行径，我考虑了十几年，都没有想明白其中的原因。

回想起我和萧华以往的工作交往，感到这个人是不那么光明磊落。关于在兰州军区“四大”中他所扮演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以及先定调支持后拒不认帐并嫁祸于人的角色，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众所周知他在罗瑞卿问题上的表现，就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

政治上投机多了，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风派”本质，因此，这也就不难解释热衷于宣传“认识英明领袖、了解英明领袖、熟悉英明领袖、忠于英明领袖”的萧华，在华国锋下台后便又立刻抢先批判华国锋了。

萧华的政治品质在我党几次党内斗争中都有所表现，例如，1957年反教条主义，他就积极追随林彪，整了刘伯承。又如，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他又跳出来揭发彭德怀“里通外国”，在访苏期间和赫鲁晓夫私下谈话反对三面红旗。彭德怀解释说，他不懂俄文，赫鲁晓夫不懂中文，又没有翻译在场，两人如何密

谈？彭德怀的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平反昭雪。1961年萧华又紧跟林彪，利用“端正政治工作方向”之名，整了总政主任谭政和副主任刘志坚、甘泗淇、傅钟等。升任总政主任后，随之又整了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后因文革时在被保护写检讨期间犯强奸女护士的生活作风错误，听说江青骂他是“花花公子”，因此，“四人帮”垮台后萧华便又成了受江青迫害的英雄。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将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等找到西山叶的住所，专门谈了贺龙的问题，说我们三人都是贺龙的老部下，给我们先打个招呼，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在谈完出去后，萧华又赶上来对我讲：“邓小平已被中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了，你是红七军出来的，要认真回忆一下，要揭发，态度要明朗。”我当时就说：“我在红七军是当兵嘛，知道什么？”后来回去后，无论是关于贺龙的问题还是邓小平的问题，我们几个都达成默契，即不理睬、不揭发。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并没有谁去翻箱倒柜搬出来刻意追究，倒是许多往事都已经淡忘了。然而萧华本人是否还因心虚而耿耿于怀，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于一个挂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桂冠的人来讲，作这样的猜测是否有些不合适？

萧华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韩先楚一起，搜集我的材料，给我罗列罪名，然后到中央、军委找关系吹风、打小报告，走政治后门，以达到置我于死地的目的。

打倒我，这是萧华到兰州军区来干的第一件也是他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事后他曾多次对人炫耀过，并且在1985年调离兰州军区的告别欢送会上作为发言总结道，他来兰州军区工作七、八年，取得的最大政绩就是“彻底摧毁了冼恒汉苦心经营了二十几年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同时，他还信誓旦旦：“将来若是有人出来翻这个案，你们就直接写信给我，我为你们做主。”

在甘肃省委，宋平、冯纪新看萧华的眼色行事，提心吊胆惟恐闪失；在军区，这么大的案子只听他一个人的，连中央具体参与此案的人都整天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想想参加革命也半个多世纪了，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也都过来了，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是，免职这么多年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找我谈一次话！所谓的“结论”

也在没有同我本人见面核对的情况下就批了！到底是可悲？还是可叹？不是说“对人的处理要慎重吗”？对干部“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吗？党的这些干部政策经过萧华们的转手处理后已经在下面变味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共产党内的悲剧。

（完成于1987年6月）